

紀念紅軍鐵甲旅創建八十周年

永恒的記憶

無盡的懷念

裝甲第十一旅



《永恒的记忆 无尽的怀念》编委会名单

顾 问	薛清池	王延生	马晓文	王晓建
	杨文岩	周义仁		
主 任	杜清华	裴晓昌		
副主任	孙恒存	张俊军	张启宏	崔 健
	赵清旭	时水利	李玉强	
委 员	魏天中	牛 强	杨 超	陶祥稳
	曲国辉	龚 虎	张应天	文建丰
编 辑	余 伟	王 彬	王 梓	杨志培
	季向涛	何 坤	岳盛杰	杨 卫

谨以此书献给
红军铁甲旅创建八十周年！

目 录

序 言

题词篇

首长题词····· (001)

电报篇

毛主席、军委等直接指挥的指示、电报····· (015)

回忆篇

浴血奋战陕甘 呕心沥血神府·····习仲勋、伍修权、马文瑞等 (031)

战斗在晋西北大地上·····贺龙(回忆录整理)(033)

黄河河防的一些回忆·····萧劲光(回忆录整理) (036)

艰苦奋斗无私无畏 百折不挠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马文瑞 (039)

回忆无定河畔六烈士·····马文瑞 (041)

神府红军独立师·····张秀山 (047)

忆战争年代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见·····王兆相 (060)

从特务连到独立师·····王兆相 (065)

难忘的会见·····乌兰夫 (068)

排除万难坚持抗战的一支劲旅·····裴周玉 (072)

红军时期的一段回忆·····贺长光 (077)

红三团、警备六团、神府支队的战争岁月·····刘维真 (079)

神府工农红军的战斗岁月·····贾如胜 (086)

警备六团在塞上的战斗片段·····韩创业 (098)

坚持雁北绥南抗日游击战的警备六团·····杨克林 (112)

祁连山下擒顽匪·····白占彪 (121)

制服匪首“清水营长”·····薛清池 (131)

父亲的黄土情结·····	王延生(136)
将军党龄八十一年·····	王晓建(140)
情系红军团 永铸国防魂·····	周义仁(143)
从神话中走出来的神府“红三团”·····	杨文岩(146)
忆红色传统 建一流铁骑·····	王德山(159)
红色传统品豪气·····	宋 波(162)
忆百岁将军王兆相·····	梅江新(167)
牢记传统扬威名·····	詹文星(171)
梦开始的地方·····	陈新文(180)
红旗,何以高擎 80 年·····	白 丹(184)
继承红色传统 立志军旅成才·····	龚鹏程(188)
神府红军血性永恒·····	杨 森(191)
让精神火炬照亮打赢之路·····	杜清华 裴晓昌(195)

序 言

济南军区红军铁甲旅是一支历史悠久、传统厚重、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和指挥下发展壮大，是我军装甲兵系统中唯一的红军部队。它以神府红军为第一源头，汇集了各个历史时期诸多武装力量，既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王兆相等创建和领导的神府红军，也有参加孟良崮战役、太原战役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师山炮连，还有参加荔北战役、扶眉战役、兰州战役的黄龙游击第三支队。在这支光荣的部队序列里，至今保留着 2 个红军营、6 个红军连、11 个荣誉连队，中国革命的红色基因在官兵的血脉中代代相传，在官兵灵魂中深深扎根、历久弥坚。

部队创建 80 年来，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直到社会主义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 140 多名英雄、功臣及模范，牺牲 3000 多名革命英烈，走出了 120 多位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在新的历史时期，部队先后出色完成了 75 豫南抗洪、98 长江抗洪抢险、“铁拳一 2004”涉外军演、全军核化生整体防护能力示范性评估观摩、赴苏丹国际维和、抗击雨雪冰冻灾害、08 汶川抗震救灾和“铁骑”系列演习等重大任务，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激励部队士气、激发官兵斗志，值此神府红军创建 80 周年之际，我们收录了几十位对红军铁甲旅创建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老前辈、老同志、老战友的传记、回忆和新一代神府红军传人对历史的感悟，同时收录了部分史籍资料，编辑出版了《永恒的记忆无尽的怀念》一书。该书记录了红军铁甲旅创建发展的光辉历程，是一本鲜活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and 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全书语言满含深情，字里行间散发着对生者的敬仰、对逝者的怀念、对继任者的激励与关怀。红军铁甲旅战斗发展的历史，

是神府红军人的光荣和骄傲。

大潮奔腾，勇者无惧。我们坚信神府精神将永远激励一代代官兵秉承优良传统，牢记首长嘱托，瞄准强军目标，投身强军实践，继续保持锐意进取、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保持攻坚克难、奋勇前进的拼搏精神，在建设全面过硬红军铁甲旅的历史征程中珍惜荣誉、勇攀高峰，谱写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篇章！

旅 长 

政治委员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八日

第一篇

题

词

發揚集體英雄主義
精神
為進一步建設人民裝甲
部隊而奮鬥

朱德

為了感謝偉大的
祖國人民對在老願
軍的熱烈支援以及
繼續的志士志士
侵略者軍隊保衛祖
國的身在！

北平志士

建立全心全
意為人民服
務的思想

以
克
託

加強裝甲兵建設，
為實現國防現代化
而奮鬥。

徐向前題
一九九〇年四月

但志第13圖

指紅軍總
指揮會權
同院

沈美子
一九九二年
七月

發揚紅軍傳統，
再創新的業績，
繼承先輩遺志，
誓做後人楷模。

為解放軍坦克第四十二團題

馬文瑞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题词：

“勇往无前”

張宗達

11.6.11

坦克十一师政治部：

来函收到。关于120师警备六团的情况，我记得这是一支建立较早的部队。1938年7月警备六团曾配合我358旅李支队进行过开辟大青山根据地的斗争；1938年12月，120师奉中央军委命令开赴冀中，我和杨平化奉命率358旅直属队、714团，并直属独立一团、独立二团和警备六团等留在晋西北地区，坚持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工作。

張宗達

一九九一年三月廿七日

继承红军传统
弘扬革命精神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黄新廷

坦克四十二團是一支有悠久光榮歷史的紅
軍部隊作戰勇敢擋一面抗日戰爭時期開
辟了雁北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戰爭參加了
著名的綏包集寧太原蘭州諸戰役是一支作
風過硬的堅強部隊希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
發揚光榮傳統讓紅軍團隊雄風永存

張達志

一九八二年七月

發揚紅軍傳統
繼承革命事業

二十軍建軍四十二周年紀念 辛未冬 賀晉李

昔日七人红军游击队
威震敌胆
如今千名英勇担克未
再展雄风

辛未年

王兆相

日

坦克第四十二团留念

昔日紅九团威震塞北
如今坦克兵建功豫南

邓家泰题赠
一九九二年元月

第二篇

电 报

毛主席、中央军委等亲自指挥 神府红军和警备六团的指示、电报稿

神府红军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成长发展壮大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就一直关注着神府革命根据地，关注着神府红军。1935年11月，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分析陕北形势时指出，神府苏区面积不大，但地位很重要，是通往抗日前线的门户，并决定把神府苏区划为特区，直属中央领导。毛主席在很多场合都说过“神府苏区很艰苦，坚持下来很不容易，神府人民不但坚持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培养和保存了大量革命干部”。

神府革命根据地由于敌人的层层包围封锁，较长一段时间和党中央失去了直接联系。1937年为了使党中央知道神府佳榆苏区和神府红军的存在，争取得到中央的直接领导，神府红军挥师南下，向榆林、佳县、米脂敌占区一路打去，让敌人去向我中央通报消息。独立师向敌占区的进发，使敌人摸不清头脑，开始他们吹嘘，不用费什么劲，就可以把远离根据地的神府红军消灭。敌人出动了近万人马，在飞机的支援下，对我军进行了围追堵截，但这一切都被我独立师一一粉碎。独立师长驱直入敌占区腹地，惊动了陕西、山西两省的国民党当局。山西的国民党报上登载了独立师南下的消息：“共匪人马两三千，装备齐全，在佳县、米脂一带猖獗活动，国军正在围剿之中，，等等。当时在西安的周副主席看到这一消息，立即报告了中央，并亲自向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强烈抗议，严正要求国民党就地停战进行谈判。最后国民党不得不同意神府红军派代表，途经佳县、米脂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从此，这支由七名共产党员和青年骨干发展起来的红午团队，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在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由小到大，从特务队，经红三支队、红三团、红独立一师、警备六团……逐步发展壮大。

以下就是1936年~1940年期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神府红军和警备六团的指示、部分电文，从电文中也可以看出中央对这支红色武装的重视和关怀。

神府虽然不大，但这个地方很重要，是抗日前线。那里形势很紧张，斗争很艰苦。去神府的消息一定要把态度组织起来，原则组织起来，动员一切力量建立统一战线；不要被困难吓倒，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胜利。

——毛泽东同志对神府地区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

神府地区，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打国民党它是前方，我们打日本它是后方。

——周恩来同志对神府地区的评价

你们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开辟了这样大的一块根据地。部队扩大到两千多人，而且牵制着敌人八十六师、八十四师、晋军和内蒙古傅作义部数万兵力，使得陕北根据地无后顾之忧，对整个陕北武装斗争是个不小的帮助，并且培养了革命干部，这是革命的宝贵财富。

——1937年中央工作团团团长张邦英对神府地区工作的评价

神府特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前哨阵地，它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

——林伯渠

关于陕北地方部队编制及干部任职问题 (1936年12月28日电报)

彭任：

甲、王局长及八十一师已到。

乙、八十一师走后，二十七军增加陕北部队四百人，近去贺晋年为军长，王明为政委，向甘卢行动。李文调红大学习，以陕北地方部队七百人，编为独立第一师，白志文为师长，张廓志为政委，向靖绥行动。

丙、神府地方部队约一千人，编为独立第二师，王兆相为师长，王宝山为政委，原地活动。

丁、中央准备十天后搬延长城。

毛泽东

二十八日二十三时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关于原西北红军各部改编的电令 (1937年8月25日电报)

各独立军师，陕甘宁，神府，关中，陕北及王宏坤、陈奇涵、李宗贵、贺晋年、阎红彦、杜平、甘渭汉、王维舟、叶道志、陈伯钧、马明方、黄罗斌、陈先瑞、王兆相：

兹拟定各独立军师具体编制如下：

(一) 编制原则：以保存原有建制的基础，便于扩大及便于适应陕甘宁地理给养之条件，故决定连以九十个战斗员为限，现四个连的团即缩编为三个连，原三个连的不变动。惟名义上照以下改变：连改为排，团改为连，以排设伙食单位。

(二) 原七十四师改为国民革命军一一五师辎炮两营，驻防郝县、甘泉一带；原独二师王兆相部改为一二〇师工兵营，驻防神府；原独一师及

陕北独立团改为一二〇师特务营，拟驻防靖边、横山一带；二十七军改为一二〇师辎炮两营，拟驻防安边、宁条梁以南地区；原三十军改为一二九师之炮兵营，驻防庆阳、镇原一带；以陕甘宁第三团夕二、三两连及关中警卫营合编为一二九师之辎重营，驻防宁县一带；陕甘宁之一、二、四团改为一二九师工兵营，驻防环县、合水一带；二十九军改为一二九师之特务营，驻防定（边）盐（池）；由一二〇师留下之一团驻防同官^①或洛川，由一二九师留下之一团驻防淳化、旬邑、正宁之线。

（三）以神府、靖边、安定^②、志丹、肤施^③、甘泉、邠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以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副之，驻洛川；以定盐、环县、庆合、正宁、旬淳等县划为西地区，留守处以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副之，驻防正宁。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延安。

（四）以上部队统受肖劲光指挥。

（五）以上部队应于去电令接到后立即进行改编，并将改编情形详报。

（六）其他各地方部队由保安司令部电另行规定。

毛泽东 酉月

（电报原文：摘自解放军档案馆）

①同官，即今铜川。

②安定，即今子长。

③肤施，即今延安。

关于王兆相部开赴晋北作战 （1937年9月21日电报）

神府特委及王兆相：

甲、日寇进攻雁门关，我一二两方面军已到晋北抗战。

乙、兆相等同志准备五日内率主力出五寨、神池与二方面军配合，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留下三分之一兵力及地方武装保守苏区及渡口。

丙、准备情形速告。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一日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关于神府独立师出动抗战及留守部队问题 (1937年9月24日电报)

王兆相、王宝山并告特委：

- 一、多日不通，以后每日联络。
- 二、独立师除留三分之一在神府保卫苏区及沿河渡口外，主力三分之二准备五日后出动，开五寨神池受贺龙同志指挥参加抗战。
- 三、去多少人枪，留多少人枪，去多少地方工作干部，抗日鼓动如何，主力走后如何保卫苏区，如何不被破坏，以上各项与特委商量。
- 四、孙超群同志到否，他随你们行动。

毛泽东 二十四日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速令王兆相部开回神府接马镇至佳县一段河防 (1937年10月22日电报)

贺肖关：

西安行营规定，高双成接佳县以北河防，除严电制止外，速令王兆相率部即日开向神府苏区，接马镇至佳县一段河防，拒绝高双成接防，并飞即神府特委注意，至妥至要。

毛泽东

二十二日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关于王兆相部不回神府问题 (1937年10月28日电报)

朱彭并告贺关及王兆相：

行营答复，马镇（含）以北归高部，以南归我军，王兆相部仍在晋北

不回神府，但须与该区经常联系，勿使有失。

毛泽东 二十八日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关于巩固黄河河防问题 （1937年11月17日电报）

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王兆相孙超群并致朱德彭德怀周恩来：

甲、为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阻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

乙、已将整个河防线由神府马镇到宜川临真河划分三段，各段设河防司令部指挥之。

1、从临真河以北到清涧之河口，设两延河防司令部，何长工任司令员，以警备五团为河防部队。

2、从河口到葭县^①归五县警备区指挥，以七一八团及警备三团为河防部队。

3、从葭县到马镇设神府区河防司令部，以神府保安营任河防部队。

丙、为保障河东部队必要时实施渡河，拟选择以下地段之渡河要点：

1、从三交到绥、米各渡口。

2、两延间之马头及平渡两渡口。

3、神府河防区内选择二三渡口（预备晋西北各兵团使用）。

丁、每一渡河地段备置船二十只以上，大船每只可容百人，并征集必须的水手舵手。为隐蔽我之企图，这些船只应隐蔽河之西岸并派兵看管，防敌毁坏及刺探。其他各渡口之船只，除在必要交通的渡口上留下一二只渡船外，其余一律或集中他处或停泊西岸，并准备必要时破坏之。

戊、凡对我军不需用之渡口，应依照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彻底破坏，并在沿河某些要点上，特别在我渡河地段上，利用天然险要，或破坏或构筑

相当程度工事。其具体布置由各河防司令部负责侦察计划，并告我们。

己、两延及五县河防区已着手布置。关于神府区，请贺（龙）萧（克）直接派人，或令王兆相派得力干部为该河防区司令员，前往侦察布置一切与指挥担任该段河防之保安部队，并请转达神府特委知照。

毛（泽东）、肖（劲光）

十七号晚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①葭县，即今佳县。

警六团仍由贺龙指挥 （1938年5月13日电报）

贺萧关：

- 一、警六团仍由你们指挥在晋境行动，因神府无饭吃。
- 二、该团现有多少人枪，王兆相现住何处。

毛滕肖

十三日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军委电：

为了适应目前战争形势，便利直接抗战的军事行动指挥与扩大和补给起见，特留后方之独立营及各独立军师立即整编如下：

- （一）原二十七军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一团。
- （二）原二十九军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二团。
- （三）原三十军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三团。
- （四）原七十四师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四团。
- （五）原独立第一师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五团。

(六) 独立第二师王兆相部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六团。

(七) 陕甘宁部一二九师平山营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七团。

独立营及七一八团三八五旅之一个团均照旧不变。各警备团一律恢复营的建制及团的政治供给卫生部门的组织与工作。各警备团之团长仍以原任首任之，改编情况电告军委并加紧整理训练。

中央军委

十一月二日十四时

(电报原文：摘自解放军档案馆)

警六团营以上干部履历报告 (1938.6)

滕左：

警六团营以上干部履历如下：

(一) 上校团长王兆相，三十岁。一九三一年入伍，曾任红二十儿军班长、队长、团长、师长。

(二) 中校副团长孙超群，三十一岁。安徽颖县人，一九二七年在福建上杭入伍，曾任红十二军班长、排长、连长、独立营长，二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教导团长、二十三师师长。

(三) 少校参谋、少校军需王山海，三十七岁，陕北神木人，一九三一年在马家辛庄入伍，曾任会计科长。

(四) 少校卫生队长张金，二十二岁，广东兴宁人，一九三。年入伍，曾任红军班长、排长、司药、医生、卫生所长。

(五) 少校一营长贺立爱，二十五岁，陕西神木人，一九三四年入伍，曾任红军独立团连长、游击队长。

(六) 少校二营长贾兰枝，二十八岁，陕西神木人，一九三三年入伍，曾任红军队长、连长、团长。

(七) 少校三营长吴子明，二十五岁，陕西中部人，一九三四年入伍，曾任红军队长、连长、团参谋。

周 六日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对宋支警六团作战的指示 (1938. 2. 26)

宋孙并朱彭任：

一、晋西北敌情：

(一) 神池宁武二十三日被陷落，河武两城之敌千七百余入。

(二) 清水河已被敌蒙伪骑兵约二千余占领。

(三) 放弃平鲁之敌约七百人经井坪、老营堡寨、偏关，有与清水河南下之敌配合进攻河曲之势。

二、我师主力在同蒲线上平社及关城镇战斗后，同蒲铁路已被我控制与破坏。

三、整个战争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见总部屡次电令。目前的部署：

(一) 师主力仍部署在喜州南阳曲北地区，重点置于平社一带，击据点击汽车，准备打敌之增援。

(二) 警六团在偏关失守后，应转移至偏关达县之间，与蔡杨会合，五一四支队由孙张统一指挥，配合何军打击偏关南进或神池西进之敌，破坏敌之交通，袭击敌人据点。

宋支队应集结畔镇主力，并破坏大同朔县间敌之交通，伏击汽车，由敌之据点打击敌人，配合主力作战，并机动地策应张孙何的作战。

贺肖关

二十六日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警六团仍在河东活动为宜 (1938. 3. 10)

贺萧周：

警六团目前仍在河东为宜，更能增河防一层保障，将来情况紧张时回渡河西。

肖劲光

十日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警六团在丰镇附近歼边防剿总 60 多人
(1938. 10. 10)

朱彭总、副司令左参谋长：

警六团一部于九日在丰镇西北之 9 号 4 号附近，袭击伪军西北边防剿匪总队 60 多人全部解决，计俘伪队长刘崇贤 1 名，以下官兵 50 多人，缴获冲锋枪 1 支，手枪 1 支，轻机枪 3 挺，步枪 24 支，马 50 多匹，日伪旗数面。

周士第

甘泗淇

十日申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警六团袭击红沙坝战况
(1938. 10. 13)

左并转贺肖关：

一、警六团十二日夜袭击丰镇以北至红沙坝车站，将敌击退。缴步枪 9 支，电话机 2 部，军用品甚多，详查后再报告。第一营营长贺伟负伤，战士亡 7 人。

二、我们报告如下：据警六团孙团长张政委之电，我部十二日夜袭击丰镇以北之红沙坝车站，与敌肉搏，敌除一部逃脱外，毙敌 30 余人，俘敌 13 人，缴轻机枪 2 挺，步枪 20 余支，手枪 2 支，电话机 2 部，军用品甚多正清查中。当将车站设备完全破坏，我第一营营长贺伟同志负重伤，共伤亡 25 人。

周 甘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警六团归一二零师建制
(1940. 4. 20)

贺、关、并转朱彭：

同意警六团属一二零师建制。

军委四月二十日

(电报原文：摘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档案)

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通电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全国各武装部队，全国人民公鉴：

在神、府、葭几年来的游击战争中，创造了神府抗日根据地，扩大与锻炼了红军。最近，在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与神府特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红二十八军帮助下，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中，正式成立了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

处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红军抗日去路，进攻陕甘抗日根据地与主力红军转移阵地的形势下，本师的成立，在抗日讨逆的战线中是有伟大意义的。

当本师成立的今天，特向全国人民与一切武装部队通电。我们站在抗日讨卖国贼的立场上，联合全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与一切武装部队，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拥护粤桂联军抗日讨蒋武装，坚决反击卖国贼部队的进攻，誓死保卫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与日直接作战。

谨此奉闻

师长 王兆相

政委 张秀山

（原件由老红军贺长光交到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也有同样一份。）

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成立誓词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我等誓以牺牲精神，站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出卖民族利益。

执行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中央政府新的策略路线，武装广大的劳苦群众，坚决回击卖国贼部队对神府苏区的进攻。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坚决开展游击战争，誓死保卫神府苏区，争取对日直接作战。不达目的，不止此誓。

师长 王兆相

政委 张秀山

(原载 1936 年 8 月 1 日中共神府特委机关报《新神府》第 5 期，摘自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第三篇

回

忆

浴血奋战陕甘 呕心沥血神府

——深切怀念张秀山同志

习仲勋、伍修权、马文瑞等

张秀山同志，1911年7月18日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柳桃沟村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共产党员。

1930年初至1932年6月，张秀山受党的派遣先后在宁夏、甘肃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在甘肃靖远组织和领导了甘肃警备三旅部分部队的武装起义，将起义部队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为西北地区建立党的武装力量作出重要贡献。

1932年7月，张秀山去上海党中央受训。在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思想和研究了开展北方游击战争问题后，张秀山回到照金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一起领导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创建工作。

1934年5月28日，为加强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张秀山任特委书记；成立陕甘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陕甘边区政府革命委员会主席。到1934年秋，陕甘边根据地扩展到周边18个县，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5个团，兵力1000余人，陕甘边红色根据地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红二十六军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在长期的战争中，红二十六军慢慢地摸索出了正确的路线。当时已有一个正确的战略部署，具体规定在陕甘普遍发展游击战争，首先以红二十六军为主，创造三个根据地，分成三路游击队。陕北和神府是第一路，陕甘边是第二路，关中是第三路。每一处都有基础，每一处都派了许多干部，比如陕北和神府地区，便派去了杨重远、白雪山、强世卿、魏武、惠泽人、王兆相等人，还有其他同志，在陕北和神府地区发展了游击战争。陕甘边如庆阳、合水、安塞也组织了游击队，派了很多干部，在关中也派了许多干部。关中的斗争是非常残酷

的，打死了几个游击队总指挥，打死了1个，又派去1个，这样创造了3个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在3个根据地进行作战，这3个根据地互相配合，打成一片。

1936年3月，中央调张秀山到中央直属的神府特委工作，先后任组织部长、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特委书记。毛泽东同志指出：“神府虽然不大，但这个地区很重要，是个抗日前哨。”周恩来副主席亲自给张秀山部署了工作任务。

1937年初，国民党又纠集7个团、2个骑兵营，约1万余人，对神府红军发动更大规模进攻。敌人的包围隔断了神府和中央的联系，形势十分危急。张秀山决定通过国民党报纸，让党中央了解到神府的紧急战事，达到制止国民党军队侵犯神府的目的。他指示王兆相师长率领独立师深入敌占区榆林一带。王兆相随即带领部队到达佳县、米脂一带活动。很快，阎锡山的报纸上惊呼：“共产党人马二、三千，在佳县一带活动，国军正在围歼之中。”阎锡山殊不知，我独立师深入只是佯攻而已。周恩来副主席在西安看到报纸，立即向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严正抗议，迫使国民党停止了对神府的“围剿”。

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张邦英同志1937年底作为党中央代表到神府检查工作。毛泽东主席说：“神府很艰苦，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1997年8月

摘自《人民日报》

战斗在晋西北大地上

贺龙（回忆录整理）

1937年9月19日，一二〇师主力从侯马乘火车到达忻县。这时，收到毛泽东9月17日发出的《关于敌情判断及战略部署的指示》：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态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之北。判断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力量分布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之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因此，变更原定部署：一二〇师应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一二九师适当时机进入吕梁山脉活动；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之中。

贺龙等人感到，中央的战略部署已经变化，此时应抓紧时间向北挺进，同时应尽快与山西国民党军取得联系，以便协同作战。

就在这时，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匆匆赶到了忻县。见到贺龙等人后，彭德怀来不及询问更多的情况，立刻将毛泽东19日的急电摆在了贺龙等人面前：“贺龙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和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以相当有效的钳制……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将来刘师可与林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至吕梁山脉。”

彭德怀说：“一二〇师应立即进入晋西北的管涔山区，以宁武、神池为中心，在五寨、岢岚、岚县、河曲、偏关、保德等地区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还应派部队前出雁北。”

……

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八路军总部3个师领导人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

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国抗战的新局面”。

11月14日，贺龙率师部经岢县去岚县，与关向应、甘泗淇会合，研究一二〇师怎样贯彻这一指示。11月28日，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在岚县福音堂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指示。

贺龙首先作了11月份的工作总结。他在总结中说：“这一个月中，在军事上，我们是积极活动的，当敌人向太原前进时，即以张、李、贺、廖尾敌追击，拟进到太原以西地区袭击敌人，协助友军，巩固太原，但我军尚未到达，太原已经失守。所以，张宗逊：李井泉目前仍在太原、文（水）交（城）线上，贺炳炎、廖汉生则已直捣吴城，他们在那里打击敌人，进行地方工作，收容散兵；王震、宋时轮经常在交通线上袭扰敌人；蔡久、杨秀山在朔县附近袭扰日军；王兆相的一营已进占右玉，骑兵连到了清水河。地方工作方面，成绩很大。他们已经组织了义勇军、游击队，人数已经达到了1.2万人，还抓了好多汉奸，破坏了一些伪组织，特别是提高了这一地区民众的抗日情绪和八路军的威信。神池、宁武等地的游击队、义勇军都想直接打八路军的旗帜，因为他们知道八路军是抗战到底的。”他根据统计资料指出：11月份一二〇师毙伤日军570人，击毁汽车104辆，缴获各种枪支328支，但也付出了代价。这个月，一二〇师共伤亡349人。另外，这个月各支队收容散兵956人。他说配合正面作战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有了新的指示，我们要认真讨论怎样贯彻执行。

在会上，贺龙提出了同关、肖等人商量过的方案，经军政委员会讨论后，决定：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一二〇师各部北起大同口泉，南到汾阳，沿同蒲铁路展开，与敌人争夺晋西北广大农村。具体部署是：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进到太原附近的古交镇，并以一部深入交城、清源以北；七一六团活动于吴城镇地区；三五九旅在崞县到忻口一线展开；宋时轮支队进入口全镇、怀仁一带，威胁大同；警备第六团在偏关附近展开兵力深入右玉地区。各自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协助动委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二、整训和整编部队。将各工作团在各地组织的抗日武装编入一二〇师序列，打破蒋介石在兵力上对八路军的无理限制。忻崞独立团编为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在汾阳、孝义组织的三泉游击队编为三五八旅七一

六团第二营；雁北游击队编入宋时轮支队；神五游击队改编为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支队；平山独立团编为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崞县独立团编为三五九旅七一九团；侯马独立团分别编入各部。

到 1938 年初，一二〇师扩大为拥有 2 个三团制的旅、5 个直属团或相当于团的部队（宋支队、警备六团、独立一支队、教导团和学兵团）、2 个直属营和 3 个直属连，全师从渡河入晋时的 8227 人发展到 29162 人，部队力量进一步得到扩大。

摘自八路军一二〇师纪战实录《山河呼啸》（孙科佳著 湖南出版社）

黄河河防的一些回忆

肖劲光（回忆录整理）

1937年9月13日，侵华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占领大同，随即以一部兵力和伪蒙军向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推进，以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企图配合日军第五师团夺占晋北要地平型关、雁门关，直取太原。10月23日，毛泽东、张闻天向陕甘宁边区部队发出指示，指出边区即将成为直接抗战的区域，要求全边区部队必须立即进行直接抗战的准备与动员；边区直接抗战刻不容缓，尤以北面沿长城及东面黄河沿岸之军事布置最为紧要。并急令警备第八团和警备第一、第三团速接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五县河防。

1937年11月8日，日军攻占太原，继续沿同蒲铁路南进和西犯。为便于作战指挥和动员起见，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将全区划分为6个军事指挥区，即：（1）三边区（靖边、安边、定边、盐池、环县、保安）；（2）五县警备区（米脂、绥德、清涧、吴堡、佳县）；（3）神府区；（4）陇东区（曲子、庆阳、合水、镇原）；（5）关中区；（6）直属区（安定、延长、延川、延安、甘富、宜红）。为了加强河防的守备，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将整个河防划分三段，各段设河防司令部负责指挥。汾川河以北至河口（不含）以南设两延河防司令部，何长工任司令员，司令部驻延长；河口以北至佳县设五县河防司令部（即绥德警备司令部），陈奇涵任司令员，司令部驻绥德；佳县（不含）以北至马镇设神府司令部，王兆相任司令员，司令部驻神府。肖劲光任河防总指挥。

不久，日军兵分几路，直逼黄河东岸，并占领了一些渡口，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八路军一二〇师集中主力打击了进至晋西北的各路敌军，收复七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同时，驻晋西南的一一五师回师晋西，迅速控制了吕梁山地区，主力转至大宁地区作战，歼敌2000余人。当时在晋东南一带的一二九师为策应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也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和削弱。这些战斗，滞留了日军向黄河西岸进攻的主力。日军只在黄河东岸建立了一些据点。

就在这空当，八路军留守兵团在陕晋黄河交界处，开始了紧急布防。

在兵力部署上，留守兵团以王兆相为团长的警备第六团在神府地区，守备佳县至贺家川沿河渡口；以文年生为团长、帅荣为政委的警备第八团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至枣林坪沿河渡口；以阎红彦为团长、杜平为政委的警备第三团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接近枣林坪一带沿河渡口；以陈先瑞为团长、罗志敏为政委的警备第四团驻永坪地区，派出1个营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以白志文为团长、李宗贵为政委的警备第五团驻延长，守备凉水岩至清水关沿河渡口。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各自的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后方大本营的安危系于一身，河防总指挥肖劲光不敢掉以轻心，与曹里怀分头到各防区视察防务，以防不测。

1938年3月12日，进犯晋西北兴县的一路日军2000余人，附炮20余门，到达黄河东岸。10多架飞机在河西阵地上空来回侦察轰炸，接着日军用大炮对河西阵地轰炸了约3个小时。随后，大队敌人开始渡河。警备第六团指战员沉着应战，一直等到敌人密集部队拥下河时，才突然集中全部机枪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慌乱逃窜。留守兵团事先准备好的一支部队，乘势渡过黄河，袭敌侧背，敌人支持不住，向兴县方向仓惶逃去。这一仗，共计击毙日军40余人，伤敌100余人，缴获步枪10多支和不少军用品。河防部队仅伤亡6人。

战斗结束打扫完战场，留守兵团将缴获的日军大衣、罐头、军刀和其他武器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背着手出来，在战利品面前转了几转，笑呵呵地望着大伙说：“这洋货是好啊！”

肖劲光详尽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战斗的经过，尤其是“半渡而击”的战法，毛泽东点着头说：“就照这打法。”

用兵之道在于诡秘，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肖劲光深知日军此次受挫绝不会罢休，真正的恶仗还在后头……

摘自《一代元戎：大将肖劲光》（胡学兵、孙国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艰苦奋斗 无私无畏
百折不挠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读王兆相同志《战争年代的回忆》

马文瑞

我和王兆相同志相识于 60 多年前。

那是 1933 年 8 月，陕北特委刚刚召开过著名的高起家垵会议，我按照会议在陕北建立红色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代表陕北特委前往神（木）府（谷）地区巡视工作。兆相同志当时刚奉命从红二十六军回到神木家乡，我向他传达了特委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同时证实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哥哥——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同志，已英勇地牺牲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屠刀下。尽管兆相与兆卿感情很深，但他仍强忍住悲痛，坚定地向我表示：“我哥哥他们牺牲了，我一定要接着干革命，党组织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久，兆相同志就担任了新建的神府红色武装的军事指挥员，历任神木红军特务队政委、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陕北红军独立第三团团团长、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在陕北特委和神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兆相同志与神府军民一起，经过浴血苦战，创建、巩固了神（木）府（谷）葭（县）榆（林）革命根据地，并且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将这块孤悬于陕西省最北端的根据地坚持下来，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主席曾说：“神府很艰苦，坚持下来很不容易！”这句话是对神府军民包括兆相同志的褒扬。

抗日战争时期，兆相同志率部转战华北和华东抗日前线，参加了粉碎日军“铁壁合围大扫荡”、“拉网大扫荡”及对山东日伪军的多次攻势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解放战争时期，兆相同志率部由山东赴东北，参加了承德保卫战、三下江南作战和辽沈战役；又率部由东北进关南下，一直打到湖南，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卓著的战功。

兆相同志这部《战争年代的回忆》，记述了他在西北、华北、华东、东北、中南的征程，回顾了他从一个放羊娃成长为共和国开国将军的经历，

我认为是一部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教育意义的好书。读这部书，可以感受革命战争的艰苦卓绝的胜利来之不易，可以领略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可以给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一些有益的人生启迪。

今天，革命战争年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我认为，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继续弘扬战争年代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用战争年代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我们克服困难，开拓前进吧。

2001年3月

摘自《论延安精神》

回忆无定河畔六烈士

马文瑞

1933年8月3日（农历6月12日），在陕北米脂县城南十里铺的无定河畔，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等6位共产党员，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人民为了纪念他们，称颂他们为“无定河畔六烈士”。今年是六烈士就义50周年，作为六烈士生前的同志和战友，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了解到的史料，将他们的英雄事迹撰写出来，以慰藉先烈，启迪后人。

一

1933年，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正处在艰苦阶段。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陕甘革命武装，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兵清乡“剿共”，实行保甲政策，妄图将革命力量全部消灭。而革命队伍内部，。由于当时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左”倾盲动，强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惨遭失败。不久杜衡又叛变投敌，出卖了党组织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时间，黑云漫天，狼烟遍地，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

中共陕北特委为了部署陕北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开展武装斗争，决定召开第四次特委扩大会议。为了保证安全，将会议地址选在佳县的偏僻山村——高起家坬高禄孝同志的家里。

高禄孝同志是中共党员，陕北特委交通员。他当时还不到20岁，对党忠诚，机智勇敢。他的家是一个革命家庭：祖父高振烈是有名的老中医，热爱共产党，支持儿子和孙子闹革命；高禄孝的三叔高钧仰、堂兄高禄忠都是共产党员，堂弟高禄贤小小年纪就加入了共青团。会址选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加之村子的群众基础好，有党团员站岗放哨，开会是比较安全的。

高家有孔窑洞，里面有个套窑，套窑门用柜子、木板挡着。20多个同志白天隐蔽在套窑里开会，吃饭有高禄孝亲自往里送，直到夜幕降临，才悄悄出来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特委会议从7月22日开始。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

特委工作报告。特委委员王兆卿、毕维周、崔逢运、鲁学智和我出席了会议，与会的各地区党组织代表还有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高朗亭、高长久、赵福祥、张岗、贾怀智等。

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北方代表的文件精神，总结了特委的工作，分析了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势，着重讨论了如何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问题，选举了新的特委委员。会议决定：迅速在神木、府谷、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和延川、安定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分派特委各同志到以上地区开展工作。

在这次特委会上，王兆卿同志就如何武装群众、打击敌人，提出了许多好建议，被选为特委委员，分管军事工作。会后他被派往安定地区，协助毕维周同志整顿游击第一支队，开展游击战争。王兆卿是陕西神木县王家孤村人，时年 25 岁。早在 1925 年，他在绥德师范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勤奋好学，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军联军第十三路总司令部政治处书记官，后在陕北、山西、甘肃等地搞兵运工作。红二十四军余部开到陕北神府一带失败后，他曾冒险营救战友，将梁子秀、老牛等同志掩护在自己家中。他参加过靖远兵变，曾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工作。记得 1932 年 11 月间，他由家乡前去陕甘游击队路经瓦窑堡找我接头。当时我任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住在安定一带。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同志送给陕北特委一批经费，让杨庚武、雷云亭带到安定，要我转交特委。我一时找不到可靠的人，再去找王兆卿，他欣然接受。王兆卿带着经费，和一个老乡同路前往驻在米脂县的特委机关，当他走到无定河畔时，那老乡见财起意，用石头将王兆卿打昏在地，将经费抢跑了。王兆卿同志伤的很重，在米脂、佳县养了一段，回到了特委。特委负责人马明方同志把他留在特委，曾到曾县、吴堡一带指导工作。

毕维周同志是米脂县城关镇华严寺湾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入团，后转为党员。历任共青团区委委员，中共县委委员和陕北特委委员。他出身贫苦，对敌斗争坚决。在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联络员赴北平等地联络时，曾不顾个人安危，探望身在狱中的刘澜涛等同志，给狱中同志以很大鼓舞。1933 年 2 月，特委派他到安定地区巡视工作时，他同强世清、郝醒民同志

率领游击队，机智勇敢地在栾家坪桥头上击毙国民党安定县县长刘述明，缴获步枪两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这次特委扩大会上，他又当选特委委员，并由特委派任红军安定游击队政委。

特委扩大会议胜利结束了，马明方和张达志同志代表特委，向支持和掩护革命的高振烈一家表示感谢。与会的同志们信心百倍地奔赴各地传达会议精神，开展武装斗争，商定一个月后向特委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但是，就在这时，由于叛徒告密，一场反革命的搜捕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二

当时，米脂驻军是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的一个连队，连司务长名叫董培义，是渭南人。他伪装进步，诡称参加过渭华暴动，要求加入我地下党。米脂一些同志觉得在白军中有这样一个人也好，对开展兵运、搞兵变是个有利条件，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就把他接收入党。董培义参加过地下党的一些活动，逐步了解到党的秘密联络点和领导人的行踪。后来，他的老婆在和敌人一个排长鬼混时，告发了他的情况。敌连长李子宜把董培义提起来审问，他叛变了。敌团长姜梅生根据董培义提供的情报，制定了搜捕计划。那时米脂县地下党区委的宣传员王守义、工作人员高庆恩住在县城内，李子宜带领匪兵先把他两人逮捕，然后窜到镇川堡，将米脂区委书记崔明道同志家团团包围。

崔明道是米脂县城北街人，后来移居镇川堡，1906年10月生，1927年参加革命。他以班家沟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特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王兆卿、毕维周和高禄孝同志一起，由佳县赴安定，途经镇川堡，住在崔明道家里。在地下斗争的艰苦岁月，战友相见，分外高兴，大家一起分析形势，研究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一直谈到深夜。黎明时分，凶残的敌人破门而入，王兆卿等同志奋起反抗，但寡不敌众，不幸被捕。

紧接着，李子宜又率匪兵到郝家坪抓常学恭（此人后叛变），扑空后，又急忙赶往姜家兴庄，企图逮捕住在姜好兴家的其他特委委员。姜家的住房坐落在沟底，有两孔土窑洞，院子很小，矮墙外面就是一条小河。当时，我和马明方同志以及常学恭在姜家的窑洞里整理特委扩大会议的文件，姜好兴的母亲在门口嘹哨。她看见白匪军来了，赶忙拿起一把扫帚，跪在地上，

边向前移动，边装着扫地，到窑门口低声说：“白匪军来了！”我急忙收拾好文件，顺手塞进炕洞里。正在这时，敌人来到我们住房附近。他们以为我们在紧邻的石窑洞里开会，径直扑了进去。我们趁此机会，迅即走出窑洞跳过矮墙，顺河道向后沟方向跑去。敌人发觉了，一面追，一面放枪。我们熟路，跑到后沟顺一条拐渠上山岭躲开。敌人追问时，群众故意说我们进大沟了，把敌人引开。他们扑了空，恼羞成怒，把群众捆起来拷打，群众宁肯挨打受苦，也要掩护党员，掩护干部。

我们从姜家兴庄跑出来后，向镇川堡方向进发。我一口气翻了几架山岭，天黑赶到一个农民家里吃了些南瓜。第二天，我到镇川堡去找崔明道，才知他们几人已经被捕，情况十分危急。我随即找到比我先来的马明方同志，我们分析，敌人可能要发通缉令，扩大逮捕范围，必须做好隐蔽工作，并设法营救被捕同志。

敌人没抓到我们，就以十倍的疯狂，把罪恶的毒手伸向被捕的6位同志。

三

敌人把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等6位同志关押在连部所在地——米脂县城财神庙里，拷打审讯无效，又押送国民党县政府看守所，继续威逼利诱，残酷折磨，烙铁烙、杠子压、灌辣椒水、跪火铁绳，用尽了各种酷刑。但6位同志大义凛然，守口如瓶，坚贞不屈。面对豺狼的敌人，他们坚定地说：“要吃张口，要杀开刀！要我们背叛共产党，办不到！”

敌人从王兆卿等同志嘴里什么也没有得到，又害怕我们的游击队劫狱救人，决定以押往绥德为名，阴谋在半路上进行枪杀。

1938年8月3日早晨，米脂城内，敌人增岗加哨，戒备森严，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王兆卿等同志，个个被五花大绑，在敌人押解下，昂然离开县城，向绥德方向进发。当走到米脂县南十里铺管家湾路口时，敌人强迫他们沿着田间小路走向无定河畔。王兆卿等同志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奋力高呼：“共产党万岁！”“倒国民党反动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敌人慌忙开枪，我党忠诚战士、陕北人民的好儿子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6位同志，倒在哺育他们成长的陕北大地上。

敌人的枪声唤来了革命者的亲属，招来了乡亲。他们不顾敌人刀枪的拦阻，抢回毕维周、崔明道、高庆恩 3 位烈士的遗体，装殓安葬；王兆卿、高禄孝、王守义 3 烈士的遗体被敌人抛入无定河中。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水，烈士的精神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

为了纪念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王兆卿等六烈士，1941 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绥德烈士纪念碑上铭刻了六烈士的英名，表彰他们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要学习王兆卿、毕维周等六烈士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献身的高尚情操，学习他们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们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纲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

1983 年 7 月

摘自《论延安精神》

神府红军独立师

张秀山

一

1936年7月初，神府特委几次开会研究组建神府红军独立师问题。对于尽快组建独立师，特委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独立师的干部配备问题，过多地考虑了以前神府红军干部的不团结因素。

杨和亭和特委一些同志的意见是：由我任独立师师长兼政委。我的意见是这两个职务应该分开，我可以担任师政委，师长应该由其他同志担任。这样，更适合战时的要求，在紧急情况下，如果发生了意外，不至于对部队产生不利的影响。另外，分开对干部也是个锻炼和培养。战争期间，多培养一些干部有好处。我讲了红二十六军的例子，我说：在红二十六军时，我们感到这样做很有好处。开始，王泰吉是师长，他去白军做兵运工作后，师党委研究，马上由刘志丹接任师长。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后，杨森接任师长；师政委也是这样，开始是高岗任师政委，他犯了错误后，师党委决定杨森接任师政委，杨森战斗中负伤，马上又让我接任师政委，谢子长负伤后，师党委和陕甘边特委马上又让我到前方接任师政委。我说，从以往的经验看，多培养一些干部，更适应战争的要求。我在会上提出可否让王兆相同志任师长。我给大家解释说：王兆相是1932年末，和几个同志到陕甘边，参加红二十六军，是神木县党组织派他们去的。1933年9月从陕甘边苏区回到神府后，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但是会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我就到新建的独立营检查工作去了。

这期间，特委同志又开会，还是认为在独立师初建时期由我一人任师长兼政委对部队有利，并准备把这一意见报告中央。我回到特委看到给中央的报告后，认为不妥，就找杨和亭谈，他说：大家研究后认为，独立师建立初期，师长还有个能力和威信问题。而且在他们之中，不好作比较，让这个当，不让那一个当，不太好办，因此，决定还是由你一个人当。我说这样不适合战争的要求，我向中央报告了我的意见。之后，中央批准

了我的意见。

1936年8月1日，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在神府花石崖正式宣告成立，杨和亭在大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决定，神府独立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组织序列。王兆相任师长，张秀山任政委，李治洲任参谋长，王恩惠任秘书长。下编两个团：第一团团团长刘明山，政委邓万祥；第二团团团长贾兰枝，政委贺伟。还有3个直属连。全师有近1000人，枪支也基本齐备，有10余挺机枪。

我们根据中央的要求写了独立师向全国人民的“通电”和“誓词”。

全国各武装部队、全国人民公鉴：

在神、府、葭几年来的游击战争中，创造了神府抗日根据地，扩大与锻炼了红军。最近，在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与神府特委领导下，红二十八军帮助下，广大人民拥护中，正式成立了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

处于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红军抗日去路，进攻陕甘抗日根据地与主力红军转移阵地的形势之下，本师的成立，在抗日讨逆的战线中是有伟大意义的。

当本师成立的今天，特向全国人民与一切武装部队通电。我们站在抗日讨灭卖国贼的立场上，联合全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与一切武装部队，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拥护粤桂联军抗日讨蒋武装，坚决反对卖国贼部队的进攻。誓死保卫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与日直接作战。谨此奉闻。

全师官兵面对军旗宣誓：

我等誓以牺牲精神，站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出卖民族利益。执行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中央政府新的策略路线，武装广大的劳苦群众，坚决回击卖国贼部队对神府苏区的进攻。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坚决开展游击战争，誓死保卫神府苏区，争取对日直接作战。不达目的，不止此誓。

成立大会后，红军战士个个兴高采烈，非常振奋。有的说：就是要让日本鬼子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不可欺的，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回东洋去！为了激发部队的斗志，我们要求各个连对“誓词”进行讨论，很多战士直白地说：发了誓，就不能当软蛋，一定要和日本鬼子、卖国贼干到底！

独立师成立初期，有些战士还是刚刚扔下锄头的农民，这时部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农民意识、地方观念强，作风散漫，游击习气严重。为此，我们特别加强了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干部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进行党的统一战线教育；把保卫神府苏区和土地革命成果，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保卫中华民族利益紧紧联系起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批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散布的“恐日病”，树立依靠全国人民，进行抗战必胜的教育；在部队中，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学习教育，部队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为了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使独立师尽快提高到正规红军队伍的水平，我们专门集训了连队指导员，学习加强党支部建设、开展党支部工作的方法和经验等。我们还起草了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对在各种情况下开展政治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如进攻战、伏击战前的政治工作，行军宿营中的政治工作，打了胜仗的政治工作，打了败仗的政治工作等。

在军事方面，对部队加强了军事战术、技术训练。

独立师成立后，对苏区人民群众是很大的鼓舞，要求加入红军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农民放下锄头，有的扔掉讨饭棍，跟着部队要求参加红军。我根据过去在红二十六军的经验，把这些青少年集中起来，组成少年先锋队，经过政治和军事集训，再编入战斗部队。

部队的强弱、素质水平的高低关键在领导。在独立师成立的当晚，我在给全师干部战士作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动员时讲道：我们为什么能战胜敌人，而敌人为什么不能消灭我们？除了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外，关键是我们有神府人民的支持，而敌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神府群众就是革命的大海，我们独立师就是这大海中的一条鱼。鱼要靠水才能活命，才能游来游去，我们红军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才有行动自由。我们每个干部、战士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也是我一再要求大家必须遵守“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的目的所在：尤其是每一个干部，从师长、政委开始，一定要做出表率。部队进步的快慢，关键在我们干部。

三

肃反抓“AB团”这个时期，神府红军在发展中，也受到了“左”倾残余的破坏。1936年，我到特委之前，按照陕西省委指示，神府党内进行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后就在党内、红军游击队中抓开了“AB团”。“AB团”是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秘密特务组织。

我来神府时，陕西省委还派了一位同志担任神府苏区的政治保卫局长，是专门负责抓“AB团”的。政治保卫局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在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中，安排了特派员，他们可以自行审查、审问、逮捕和处置被认为是“AB团”的人。

一次，我到独立营检查工作，独立营教导员对我说，他们营里有“AB团”，已经杀了4个人，现在还有一个准备抓走。我问是怎么发现的？他说是特派员说的。我又问这几个人平时表现怎么样？他说，都是本地的穷苦人，参军后打仗都很勇敢，为人也很老实……我问：怎么知道他们是“AB团”呢？他说：是他们审出来的，不承认就打、就用刑……

听他这么一讲，我想到一年前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我说：这几个人是不是“AB团”，你应该清楚，你应该对他们负责！靠打、靠用刑，就断定是反革命？我又问这个还没有抓走的人现在怎么样？他说：是一连指导员，是我们营里的骨干，特派员说是已砍头的那几个人供出的。我听后生气地说：这样下去，你们这个营非被杀光不可！教导员也显得很无奈。

我要他集合部队，说要认识一下全营同志。队伍集合好，进行点名，当点到一连指导员时，我发现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娃娃。我问他那4个被杀战士的情况时，一他声音响亮地报告：他们作战勇敢，政治可靠……我立刻制止他说：不要再说了，他们是“AB团”，已经被杀了！我走时对营长和教导员说，这个人我带走了。教导员听后，一脸愁苦相立刻不见了。

在路上，我问这个年轻人，家住什么地方，多大年龄，以前在家干什么，什么时间入的党，什么时间参的军等。我听他的情况很清楚，又问他

“AB团”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AB团”,听说是“AB团”就杀头。我苦笑着说:小同志,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之后,我给他另外安排了工作,没有再让他回去。这个年轻人,就是90年代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李正亭同志。

独立师成立不久,有两名战士被特委政治保卫局抓走,经严刑拷打,说这两名战士是“反革命”,还说他们已经供出独立师还有20多个“反革命”。我知道后,立即到他们所在的连队找连长、指导员、班长、战士了解情况,都说这些人很好,没有问题,打仗都很勇敢,有些还是部队的骨干。

我把政治保卫局开列的名单拿给王兆相看,他说,这些人他都了解,是很好的同志,不可能是“反革命”。我对王兆相说:去年“左”倾分子在陕北搞的肃反,就是这样造成的,我们一定要制止。于是召开师党委会,我把情况向师党委会报告后,大家一致同意我提出的不能向特委保卫局交人的意见,和师保卫部门归师党委直接领导的决定。

特委保卫局看我们不向他们交人,他们的负责人就来找我,说是根据陕西省委负责人的指示办事的。我对他说,省委的正确指示我们要执行,错误的指示不能执行。你要多调查调查,搞清楚情况,不要靠审讯来定案,再那样搞,会出大乱子的。我又把师党委的决定向特委书记杨和亭作了汇报,对他说:现在神府与中央的联系受到敌人阻隔,上面的很多情况我们都不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强特委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不能允许个别部门和个别人超越党的组织,擅自抓人杀人。后来的事实证明,神府根本就没有什么“AB团”。

由于独立师在成立后,对“左”倾残余进行了正确的抵制,部队人心很快稳定了下来,能够全力以赴地去对付敌人的“围剿”,这对独立师战胜敌人,以及之后的壮大成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

独立师建立初期,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枪支弹药和物资供应,尤其是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有时很紧张。我提出乘府谷敌军兵力不足的机会,到

北边活动一下。这是独立师第一次远程行动，王兆相有些紧张。我说：放大胆干，打仗是练出来的，闯一闯就有经验了。

哈拉寨是府谷县北边的一个重镇，位于绥远、陕西、山西的交界处，是这一地区蒙汉民族进行物资、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这里住有一些土豪恶霸和官府的走狗，他们强霸市场，横行社会，盘剥百姓，各地来这里经商的人对他们非常痛恨。独立师摸清情况后，快速奔袭，接连消灭了哈拉寨、清水、木瓜的反动民团，狠狠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威风，同时宣传了群众，扩大了共产党、红军在这一带的影响。我军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尤其是得到了一些布匹，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

但这次行动，我们也有一定损失，一团政委邓万祥同志英勇牺牲了，还牺牲了1名连长。邓万祥同志是我在红二十六军时的老部下，当过连长，打仗很勇敢。4月在贺家川战斗中，他没有得到命令，就带领一个连冲入敌人设伏区。战斗结束后，我批评了他，他痛悔地说：老政委，一打起仗来，我就管不住自己，就想冲，这个老毛病总是改不了！我说：你改不了，就不让你带兵了！邓万祥同志对革命非常忠诚，他的牺牲令我很悲痛。

独立师的建立对敌人震动很大。蒋介石的中央特派员，和陕西、山西、绥远的国民党部队决定对神府进行军事“围剿”。1936年9月至11月，敌人对神府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敌人以晋军七十二师陈长捷部4个团为主力，八十六师高双成部3个团和1个骑兵营，及一些地方民团相配合，总计一万兵力。敌军这次“围剿”，采取密集、稳步推进战术，每占领一地就修筑防御工事，团与团之间紧密呼应，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10月1日，神府特委在阎家山召开会议，我代表特委作了反“围剿”报告。我说：晋军与榆林的敌八十六师不一样，八十六师是地头蛇，队伍中多是地痞流氓和土匪，熟悉苏区情况，作战凶狠刁顽。而晋军是阎锡山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团配有迫击炮连，营配有重机枪连，班都有轻机枪，士兵武器装备精良，子弹、手榴弹充足，他们习惯于正规的阵地战。但是，晋军的弱点也很突出，他们不适应山地游击战，不熟悉神府的地形，在他们兵力展开之前，我们选其孤立部分，攻其不备，或设伏围歼，我军便有取胜之把握。但不可与敌纠缠，决不打硬碰硬的拼死战。由于敌军是由晋、陕两部分兵力组成，又是分兵南北夹击，我提出“向南作战，先打晋军”

的作战方针。我独立师向南跳到外线打击敌人，独立营和游击队留在内线，各自为战，破坏敌人交通运输，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困扰敌人。与会同志一致赞同我的意见。

会后，我代表特委写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决议。独立师在贺家川召开了誓师大会，并针对晋军的特点，开展了战前练兵活动。

10月，敌军进入苏区深处，他们的战线拉得很长。我和王兆相率领独立师乘隙插入敌后，在泥河沟，歼灭敌人1个排。之后，红军以弱示敌，派约100多人的独立营进入敌占区，引诱驻苏怀家守敌出动。敌人果然上钩，派出2个连向独立营扑来。我独立师已在苏泥家村设伏。拂晓，敌军1个连占村东南山头，我一团突然发起猛攻，全歼该连，俘敌连长及以下几十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手枪几十支。

与此同时，村后山敌人1个连，在行进中被埋伏在那里的我第二团，干净利落全部歼灭，敌连长也被俘。

我们审讯了被俘的2个敌军连长。一个说：“原以为是武器不好的200多人的游击队，想吃掉你们。团长÷营长都在后面督战，谁知刚拿下前哨阵地，就被你们冲垮了。”另一个敌连长说：“你们红军打仗不正规，不等我们展开，一群娃娃兵上来就把我们包住了。如果让我们部队占领了阵地，看你们能不能打胜。”我听后笑着说：“那就等着以后再碰上时，先通知你们，等你们准备好了再打！”两个被俘的敌军连长也苦笑了起来。

战斗结束后，我们率部队迅速撤离战场，回到根据地，并及时总结对晋军作战经验。大家一致认识到，利用设伏、突袭的战术打击敌人很管用。

之后，独立师一、二团分别进入敌占区，寻机袭扰敌人，以迫使敌人退出我根据地。一团在王寿梁歼敌百余人，迫使晋军放弃高新庄、衙院沟等据点。二团在万镇山上截击敌运输队，缴获敌军大量米面、驮骡，切断了敌军的后勤供应，加上根据地军民实行坚壁清野等措施，给敌军造成了很大困难。

各县独立营和游击队在保卫家乡的同时，也主动出击，破坏敌人交通，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在根据地军民的有力打击下，晋军七十二师两次被迫调整部署。后因傅作义在绥远对日宣战而退出苏区，回到山西。红军趁敌军撤退之机，迅

速进至通秦寨一带，打开了佳县金明寺、井道峁、清泉寺等地土围子，解救了大批群众。

11月底，独立师决定消灭高家堡敌人高玉亭营。我们派出一部分兵力，首先包围了高家堡南面几十里外乔岔滩村南山碉堡里的民团；另派出一部分兵力攻打该村1个排的守敌。同时，又派一支小部队到高家堡附近引诱敌军。

五

战斗打响后，高家堡敌营长高玉亭立即派出1个连的兵力和百余名民团，前去增援乔岔滩的守敌。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我军主力一阵猛打，除击毙敌1名连长外，还打死打伤和俘虏了一些敌人，缴获了各种枪支80余支，乔岔滩民团30多人也被迫投降。

接着，我部于深夜突然攻打高家堡，很快歼灭了守敌2个连。敌营长高玉亭侥幸逃脱。红军取胜后，当夜押着俘虏，撤到东南方向几十里外的龙尾峁。

红军在龙尾峁召开了军民庆功总结大会，表彰了立功的指战员和地方支前民众，还宣布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鼓励他们参加革命队伍，对释放回家的士兵，教育他们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俘虏们很受感动，有的当即参加了红军。

至此，被敌人占领的神府苏区大部恢复，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

1937年1月，为了扩大革命宣传、筹集军需，红军独立师再次进军哈拉寨，沿途消灭了新民、庙沟门民团，俘虏了骚扰红军的准格尔旗蒙军骑兵营营长及一批士兵。

从被俘营长韩守信口中，我们得知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消息。虽然这个营长对事变的情况说不清楚，但我们在远离中央、通信中断、长期受敌人包围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1937年1月至4月，敌人以国民党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为“剿共”总

指挥，纠集 7 个团和 2 个骑兵营，约一万多兵力，对神府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红军独立师在佳芦县秃尾河畔的薛家会村附近设伏，歼灭俘虏敌军几十人，缴获枪几十支，其中有轻机枪 2 挺，俘虏敌军 1 名副团长。

从被俘的敌副团长苏鼎臣口中，我们又了解到“西安事变”的一些情况，他说：张、杨二将军把蒋介石扣起来后，感到不好处理，请共产党参加解决。共产党派了周恩来去调停。蒋介石同意不打共产党了，同意停止内战，还同意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他讲的这些情况，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从其他途径了解到关于“西安事变”的情况。我问他：既然蒋介石也同意不打内战了，你们为什么还派出重兵来打我们？他说：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和高双成的八十六师有矛盾，都有自己的打算。高双成是为了扩大他在榆林、米脂、横山一带的地盘，扩充他的势力；高桂滋是想乘“围剿”神府红军之机，吃掉八十六师。

从这些情况看，神府苏区要面临一场更加严酷的战斗。

六

1937 年春节期间，接到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通知，对神府特委和独立师的领导人进行调整，中央任命我为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武开章任宣传部长，毛凤翔任统战部长。陕西省委派王宝山来接任神府独立师政委，杨文谟任师参谋长。

为打破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商讨对策。我在会上讲了几个问题：

一是当前神府苏区的形势。从我们掌握的各种情况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同意不打共产党了，但是他现在又派出国民党的八十四师、八十六师来“围剿”我们。这说明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是假，继续内战是真，他在用两面派手段来对付我们和欺骗民众。再从国民党军队对我们层层严密封锁来看，我们与党中央的联系几乎被割断，“西安事变”后的形势，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接到党中央的通报，这又表明，中央与我们联系很困难，中央现在还不知道我们面临的严重情况。

二是神府苏区怎么办?我们要立刻动员苏区军民做好对付国民党疯狂“围剿”的准备;要想办法尽快把我们神府当前面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紧迫情况报告党中央。因为蒋介石在西安同意不打内战了,党中央知道我们的情况后,肯定会想出制止他们进攻我们苏区的办法。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报告?派人去报告,很难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即使过去了,用1个月、2个月时间,到那时,迟了,不行。我想了几天,只能靠独立师来完成。

我刚说到这,有的同志急了,说:“独立师怎么去报告?”我说:大家知道,我们红军每次同敌人打仗,国民党的报纸上就很快登出,红军如何逃窜、被他们消灭等等。这次,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独立师打出去,插到敌人后方,造成一种要打的紧张形势,让国民党的报纸吹呼吹呼,这样也就帮我们给党中央报信了。但是,独立师插到敌人后方后,不能真打,真打,我们打不过人家。打出去,只是为造成一种打的“阵势”,“阵势”造成了,独立师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就尽快撤回来。这可能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不冒这个险,就很难把信报告给党中央,就很难打破我们苏区目前的危险局面。我又说:由于独立师这次行动,关系到神府苏区当前的命运,我决定和独立师一起参加这次外线行动。

会议认真研究了 my 的意见,一致同意派独立师到敌后行动的计划。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在当前苏区局势紧张的时候离开特委。独立师的同志也说,他们一定会按照特委的意图行动,并保证说如有失误,拿他们是问。

会后,我们一起研究了行动方案。

红军独立师出发前,我对王兆相说:兆相同志,独立师深入白区活动已有好几次了,部队还是有些经验的。不过,这次任务很重要,也很艰巨,是关系到苏区当前命运的重大行动,一定要小心,不可粗心大意。千万记住,这次出去打不是目的,是要让敌人替我们给党中央报信。这次出去,要加强对部队的纪律约束,不准随意行动。完成得好,回来后特委给你们开庆功会。

3月中旬,独立师南下,深入敌占区佳县、米脂、榆林一带。敌人慌忙调集兵力尾随追击,又派飞机轰炸、扫射。敌军被我红军牵着鼻子在敌占区转了十多天,搞得精疲力尽。当他们派出重兵堵截时,独立师已跳出包围圈,胜利回到了苏区。很快,阎锡山的报纸写道:“共军人马两三千人,

装备整齐，在佳县、米脂一带猖獗活动，国军正在围歼之中”等。

后来，我得知：周恩来副主席在西安看到报纸上登出国民党军队“围剿”神府红军的消息，立即向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严正抗议，揭露他们破坏停战协议的行径。这样，迫使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对神府苏区的“围剿”。

神府苏区因此转危为安。

摘自《我的八十五年》

忆战争年代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见

王兆相

1935年，我正在陕北神（木）府（谷）佳（县）榆（林）革命根据地担任红三团团团长，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陕北的喜讯。当时，神府佳榆革命根据地正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围剿”中，已与西北革命根据地隔绝。我们在紧张的反“围剿”战斗的间隙，时时盼望着能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能见到毛泽东主席。

在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援下，我们孤悬陕北最北端的根据地坚持了下来，红三团也发展壮大成了有2000多人的陕北红军独立师，我被任命为师长。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独立师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六团，我任团长。毛主席给我和政委发来电报，命令我团东渡黄河到山西参加抗战。我率警备六团出征晋西北，迎击日伪军，建立抗日政权，迅速打开了局面。

1938年3月，我奉命调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安排我入学之前先去见毛主席。

3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到招待所找我，说毛主席要接见我，让我快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马上赶到毛主席的住地——延安城北门内的凤凰山麓。

秘书把我让到毛主席办公的窑洞，我一进门，见毛主席手拿一支烟站在那里沉思。我立正向毛主席敬了军礼，朗声说：“报告毛主席，我是警备六团团团长王兆相。”毛主席笑着走过来，向我伸出了手。我忙用双手握住了毛主席的手。毛主席亲切地说：“没见过面，可早就知道你，快坐下。滕代远同志说你来延安学习，这很好。”我是陕北人，以前只收到过毛主席发来的十几份电报，从未接触过毛主席，所以有些拘束。看到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我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我在神府佳榆地区工作、战斗多年，毛主席首先向我询问了神府佳榆根据地的情况，问得很细。我把根据地和红三团、独立师创建、发展的情况作了扼要的汇报。

毛主席专注地听完，思索着说：“神府佳榆的人民群众为创建和保卫这块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你们能紧紧依靠群众粉碎敌人的几次‘围剿’，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力量，这是很大的成绩。现在，神府佳榆已经成为晋西北八路军的稳固后方，在抗战中战略地位很重要。总之，神府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党中央是满意的。”

听了毛主席的话，我想到了那些为创建和保卫神府佳榆根据地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乡亲们，他们的血没有自流，毕竟毛主席和党中央记着他们，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接着，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才开辟不久的晋西北根据地的情况。当讲到我团一个营留守神府黄河河防，主力两个营 800 余人渡黄河东征，不到半年就增加到 2000 人，毛主席满意地点了头。我又讲到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师长，把指挥所设在距前方 30 里的一个防空洞里，白天不敢出来，晚上才出来，参谋人员给他汇报战况，声音大了点，那位师长马上制止，说是怕被日军听到。毛主席听得笑了起来。

我在晋西北时，曾奉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命令，礼节性地拜会过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何柱国是东北军将领，抗战愿望强烈，他认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行之有效，而国民党的政训处没什么用，希望八路军派政工干部帮助他开展工作。我把会见何柱国的情况也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感兴趣地说：“何柱国是看出问题来了。在国民党军队和东北军里，确有不少将领是要求抗日的，必要时可以帮助他们。何柱国能和你谈这些情况，也说明他的倾向，今后可以继续做他的工作。”

在我汇报过程中，毛主席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我的文化程度低，许多事情靠脑子记，所以有个别数字没讲对。毛主席马上做了纠正。对一些我讲不清楚的问题，毛主席接过去做了解释和说明。

最后谈到了学习问题。毛主席望着我说：“战争情势下，学习机会是难得的。你文化低，这次进‘抗大’要好好学习。你在神府根据地的创建中做了不少工作，有许多好的经验，但是不善于总结，你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努力学习，学习搞好了，才能更好地工作。”

这时，秘书进来报告又有客人到了。我站起来说：“主席，你很忙，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我一定好好学习，提高自己。”

毛主席微笑着说：“好嘛，希望你在学习方面也打胜仗。”

我给毛主席敬了礼，转身向窑洞外走去，毛主席一直把我送到窑洞门口。第一次见毛主席，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细细琢磨毛主席对我讲的话，感到深受鼓舞和鞭策。

我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又被安排到马列学院继续学习。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举行第一届会议，我被马列学院选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分在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同组。

会议秘书长曹力如同志通知我，由我担任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的组长。我觉得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里大首长很多，自己当组长不合适，就极力推辞。但曹力如说：“让你当组长，是征求过首长们的意见的，他们都同意了。这次会要开十天，首长们工作多，有些分组的小会就不一定来了。你当组长，有大事报告他们一下，小事你就处理了，这样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嘛。”我只好应承下来。

刚当上组长，我就得到会议秘书处通知：一些地方的同志给大会送来了少量土特产，秘书处决定分给与会代表。我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没有来，就给他们一一写了便函，再签上我的名字，由曹力如派人送了去。

两天后，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们都来了，在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的位置就坐。毛主席恰巧来到我的座位前，我站起来给他敬了礼，向他问了好。

毛主席认出了我，与我握手时说：“王兆相同志，你派人送来的便函和礼品，我都收到了，谢谢你啦。”坐下后，毛主席又说：“王兆相同志，你是我们的组长，我事情多，不能经常来参加小组会，我先向你请个假。”

我笑着说：“你是中央领导人，不到会总是工作忙呗，还向我请什么假呢？”

毛主席说：“啊？中央领导人也是普通代表嘛，再忙也不能不请假，不请假是不对的，这可是个组织原则问题。”

休会的时候，毛主席向我了解了头一天会议的情况，还关心地问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有没有困难。他说：“你当过团长、师长，带兵、打游击战

还是很有经验的。但文化低，不善于总结提高。所以一定要抓紧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增强理论修养。不但要善于工作，还要会总结，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给大家看，借以推动工作。要学习，总结，再学习，再总结。”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届会议结束时，我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十五名政府委员之一。毛主席笑着勉励我说：“结合实际努力学习吧，学习使人进步，肯学习的同志才能为人民做更多的事。”

我自马列学院第三期毕业后，被派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率领一个旅开赴东北战场。这期间再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直到辽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第四野战军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在香山接见与会的四野干部时，我才于10年之后又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比在延安时胖了些，气派也更大了，他声音洪亮地对我们说：“我们二野、三野、四野三路大军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浩浩荡荡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战争年代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转眼过去好几十年了。毛主席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仍然难以磨灭。作为一名红军老战士，我在怀念毛主席的时候常想：像紧紧地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地思考和解决问题，结合实际努力学习这些毛主席倡导的东西，我们，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应当永远珍视、继承的。

摘自《解放军报》

从特务连到独立师

王兆相

我是陕西省最北部的神木县人，192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我考入榆林中学读书一年多，又做了一段地下交通站的工作，于1932年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先是在骑兵大队当战士，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团）后，我被任命为红二团警卫队队长。

1933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今佳县）召开了高起家瓢会议，会上决定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我就在这时被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派回老家神木县，作为军事骨干参加陕北的武装斗争。

我哥哥王兆卿是陕北特委的军委书记，他在参加高起家瓢会议几天后，就被国民党陕北军阀井岳秀逮捕杀害了，遗体被抛进了无定河。陕北特委委员马文瑞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我强忍悲痛向马文瑞表示：“我哥哥牺牲了，我一定要接着干革命，党组织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马文瑞交给我一支手枪，神色凝重地说：“你在红二十六军锻炼了一年，当过警卫队长，搞军事斗争是内行，希望你把神木、府谷地区的游击队建立起来。”

为组建神木、府谷地区的红色武装，中共神木南乡区委从物色成员到搜集武器，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那时候，搞到一支枪很不容易。区委起初派了两名党员过黄河到山西太原买枪，结果枪未买到，两名同志却牺牲了。后来，区委又派一名党员到国民党驻军当兵，8天后这名党员从敌营背回来了一支步枪。正当我们为武器太少发愁时，同情革命的铁匠师徒打制了一批大刀、长矛送过来，才算解决了问题。

1933年10月18日，南乡区委在尚家吕召开了游击队成立大会，共7人参加了会议。贾怀光代表南乡区委宣布：“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和神木、府谷人民的迫切要求，神府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组织今天正式成立！经陕北特委批准，它的名字暂称中国工农红军神府特务队，队长李成兰，政委

王兆相，队员就是今天到会的5位同志。”贾怀光接着说：“咱们这是被逼上梁山啊！梁山好汉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咱们要大闹神（木）府（谷）葭（县）榆（林）地区，要叫白军、县府、地主、豪绅不得安宁。咱们有共产党领导，要像南边的红军一样，宣传群众，齐心协力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建立穷人自己的政权，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我说：“我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利时，听刘志丹讲过一句话，‘要相信共产党红军一定能胜利！我们的红旗倒不了，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把红二十六军的红旗打到底！’咱们都该记住刘志丹同志的话，要干就干到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表示：我们为穷苦人打天下，一定要不怕流血牺牲，勇敢作战，决不打退堂鼓！

成立大会是在支持革命的群众张景新家窑洞里召开的。会议结束后，主人为了庆贺神府红色武装的诞生，宰了自家一只羊，炖了一锅羊肉。大家一边吃着羊肉，一边热烈地议论特务队的当前任务和发展壮大的远景，个个充满信心。想到英勇就义的哥哥王兆卿和百折不挠的老首长刘志丹，我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像他们那样对待革命事业，把特务队带好，使之成为令敌人害怕的红色武装。

特务队成立不久，李成兰、李成荣兄弟就在战斗中牺牲了。但特务队迅速壮大了起来，先后扩编为陕北红军的第三支队（红三支队）、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三团（红三团）。尽管我们与陕北红军的兄弟部队被国民党军阻隔，一直单独战斗在神（木）府（谷）葭（县）榆（林）地区，但还是在短短3年时间里，由7个人、4支枪，发展到1200多人、1100多支步枪、20挺机枪。

1936年8月1日，部队奉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军委命令再次扩编，番号为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我担任了师长。这张照片，就是独立师成立时拍摄的。当时，我们从国民党军占领的神木城接来照相馆的两位师傅，请他俩给兵强马壮的独立师拍了一张全师合影。两位师傅起初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心存疑虑。但真正来到苏区与我们接触后，亲眼看见红军对老百姓好，纪律严明，官兵平等，不但打消了疑虑，对我们表示钦佩，回到神木城后，还悄悄地为红军做了宣传。

建国后，在一些博物馆和纪念馆征集旧照片时我才得知，由于种种原

因，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都没有留下部队的合影，我们独立师这一张，是唯一的一张，还真是珍贵呢。

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0 年出版之《军中老照片》

难忘的会见

乌兰夫

1938年元旦刚过，为了解决供给困难，白海风到武汉找国民党政府联系要军饷、粮秣和武器装备去了。

白海风走后，我召集党委会研究如何到南边去找党组织接关系，因为自从1931年王若飞同志被捕后，我们就失掉了同国内党组织的关系。我们在蒙旗独立旅中建立的党组织和发展的党员，都与上级党组织没有关系。会议决定由我亲自到就近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去接关系。

我来到驻岚县的一二〇师政治部，接待我的恰好是甘泗淇同志。甘泗淇当时是一二〇师政治部主任，与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两人从莫斯科分手后一直没有联系，这次相见自然十分亲热。甘泗淇让勤务员添了一套被褥，安排我和他住在一起。我们晚间躺在炕上，畅谈在莫斯科的同窗岁月，感到无比兴奋，往昔异国他乡的学生生涯，旧闻轶事，谈得十分融洽，不知不觉夜已深了。我说明了这次来的目的，几次提出向甘泗淇同志汇报工作。甘泗淇同志说我一路上累了，劝我好好休息一夜，来日再谈也不迟。

我感慨万千地说：“老甘，你是不知道，我这几年就像失掉娘的孩子似的，想党想的不行啊！”

甘泗淇安慰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哪个孩子不想娘呢。现在咱们不是睡在一条炕上了嘛，我给你三天时间，让你说个够，怎么样？睡吧！……”

次日上午，甘泗淇同志将原定召开的一次会议推迟，专门听取我汇报蒙旗独立旅的情况。

我详细地从百灵庙暴动说起，汇报了蒙旗独立旅几起几落的重建、改编和参加归绥抗战转移到伊克昭盟的经过，目前部队的编制人数，以及部队党组织的工作发展情况。并且如实地讲了部队当前存在的具体困难，请甘泗淇同志将蒙旗独立旅的情况汇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希望党中央对这支蒙古族部队的工作给予领导和指示。

甘泗淇认真而有兴趣地听了我的这些汇报后，称赞说：“这些年你单

枪匹马地搞地下工作，为党抓了一支武装，还发展了很多党员，成绩不小啊！”又说：“你能把蒙旗独立旅这样一支统一战线部队，带到伊克昭盟来抗日，说明你很会做统战工作。我建议你总结一下经验，为什么蒙旗独立旅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能攻善战，没有一个逃兵？”他停顿片刻，提高嗓音说：“我看主要是贯彻执行了古田会议决议，把党的支部委员会建在连上，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你说对不对呀？”

甘泗淇同志是我党早期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政策思想水平很高。他几句话就把我们在蒙旗独立旅的工作成绩，提高到政策高度上来，使我由衷地敬服。

甘泗淇同志立即将蒙旗独立旅的情况整理出专题材料，上报党中央。

我在一二〇师等待中央指示期间，甘泗淇同志介绍我去晋西北临时省委，与罗贵波同志接上了关系。

193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一二〇师的几位领导发来复电，电文对蒙旗独立旅的工作，作了明确指示。我手捧电文，激动得两眼湿润了。几年来，我们第一次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这声音似战鼓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这声音似指南针，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对蒙旗独立旅今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甘泗淇同志被我的情绪所感染。他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中央的指示很及时、很宝贵，你要组织部队的党员认真地学习和贯彻执行啊！”

我点点头，尔后请求说：“老甘，我马上就回部队去！”

“你忙什么，明天再走吧。”

“不行，我要赶快回部队，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贯彻下去。”我说。

“也好！你要走我就不强留你了。”甘泗淇把通讯员叫过来，“你马上通知大车队，马上套车，把师里调给蒙旗独立旅的1000套军装和1000双棉鞋装好车。”

这些物资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场及时雨、雪中炭。我紧紧握住甘泗淇的手说：“老甘，我代表蒙旗独立旅的官兵，再一次向你们表示深切谢意！”

甘泗淇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家都是为了抗日，应当同舟共济，互

相帮助嘛!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没有资金,不能帮助你。我告诉你个秘密,王兆相那里有钱,你可以到他那里去,他会慷慨解囊的。”

这时的王兆相所率的部队经过前期筹措、生产自救以及打土豪获得了一些资金,可谓“兵强马壮”,打鬼子也打得格外勇猛。他经常拿出自己的部分物资和资金帮助其他的部队。

我连连拱手作揖说道:“好,你这就算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告别了甘泗淇同志,领着载满战友手足情的大马车,满腔欢畅地离开一二〇师驻地,马不停蹄地赶回了部队。

我带着中央的指示,带着一二〇师援助的物资回到河曲。当几辆大车进入部队驻地,官兵们看到这些棉军装和军鞋,一个个高兴地欢呼起来!是呀,有了这些衣服和鞋子,就不用挨冻了,他们怎能不高兴呢?当然,对我来说,这次去一二〇师的最大收获,还是带回了党中央的声音。我马上召集部队中的党员开会,按照中央指示,检查过去部队党的工作存在的问题,讨论了贯彻意见,决定部队党组织立即转入地下,今后党的活动一律秘密进行。

为了解决部队吃的问题,我又心急火燎地去到王兆相那里去求援了。来到王兆相驻地后,我说明来意。王兆相先是热情地招待了我,我们彼此将各自部队的情况说了一下。听到我们蒙旗独立旅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战斗,跟鬼子打仗,王兆相眼睛湿润了,说道:“相比之下,你们实在是太艰难了。你们在那边坚持打鬼子太不容易了,相信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会记得你们所作出的努力和斗争的。”说完,王兆相支援了我们1000块大洋,这1000块大洋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很多战士不用再忍受饥饿了。我紧紧握住王兆相的手,内心充满了感激。

部队有了吃的穿的,情绪高涨起来,冒着数九严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练兵。

正在这时,中共中央来电指示,为了减少晋西北根据地的负担,更为了保存我们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要求我们尽量减少与敌人接触,保存实力,以作为将来解放内蒙古广大地区的骨干力量,决定蒙旗独立旅撤出河曲,向府谷转移。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向府谷转移……

摘自《乌兰夫传》

排除万难坚持抗战的一支劲旅

——忆新三五八旅的茁壮成长

裴周玉

1939年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率领一二〇师主力开赴冀中后，三五八旅机关及地方部队留在晋西北，继续沿用三五八旅的名义，领导晋西北人民坚持抗日战争，而且战胜了顽固势力的反共破坏阴谋，并在新军和晋西北人民支持下，粉碎了阎锡山向新军与八路军发动的军事进攻——晋西事变。保卫了晋西北根据地与人民胜利果实，这是新三五八旅的骄傲和光荣。

新三五八旅的成长

1938年12月11日，贺龙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宣布去冀中执行抗日任务时说：“晋西北的天下是我们打开的，晋西北的根据地是我们的依托，不能丢给敌人。把三五八旅机关留在这里，让群众知道，贺龙在冀中，一二〇师还在晋西北。”这是贺龙同志高瞻远瞩与两者兼顾的重要战略思想，是继续发挥一二〇师军威，震撼日寇的高明决策。因为三五八旅是红二方面军的主力，自1937年8月改编为一二〇师、9月进入晋西北抗日前线后，数次给日军严厉打击，如首战雁门关，歼灭日寇汽车近百辆、日军近千人；派出宋支队挺进雁北，收复平鲁、右玉县城；1938年日寇1万多人向晋西北大举进攻时，在友军的配合下，粉碎日寇的进攻，恢复了岢岚、保德、宁武等七座县城；11月三五八旅挺进晋察冀边区之五台县伏击日寇，在滑石片一带歼敌一〇九师团文野大队六七百人，打出了军威，使日寇闻风丧胆。所以，1938年12月20日，八路军总部命令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〇师机关与三五八旅所属七一五团及七一六团开进冀中参加抗战时，而将三五八旅旅直机关仍留晋西北，率领警备六团、七一四团、独立一团与二团及三、六支队，继续沿用三五八旅名义，在晋西北坚持抗日战争。从此，新三五八旅就正式诞生了。

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政委张平化、参谋长喻楚杰、政治部

主任刘惠农等，率领机关留在晋西北，司令部下辖：一科长张全忠、二科长樊哲祥、三科长向克樱、四科长邓禹及警卫营侦察连、通信连等。政治部主任刘惠农，组织科长王定一、徐士凯，宣传科长饶兴、胡蛮，民运科长颜龙茂，锄奸科长裴周玉，敌工科长吴西，总务科长刘大煌及宣传队，供给处长史可全、政委贾如胜及兵站、运输队等，卫生队长周长庚、政委徐士凯及医院等。

警备六团的前身是陕北神府苏区的独立师，人数不足千人，1937年9月调归一二〇师建制，整编为师属工兵营。当年10月又整编为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孙超群，政委王宝山、张达志，参谋长张全忠，政治处主任王学礼、黄立清，他们长期在雁北与河曲、五寨一带敌后坚持抗战，是新三五八旅战斗力最强，能攻善守的主力兵团。

七一四团是1937年冬，由沂州游击队发展起来的，于1938年1月扩编为七一四团，团长顿新云，政委彭德大、汤成功，参谋长樊哲祥、张新华、康平生，政治处主任张世良、潘振华、王志武。经过战斗洗礼，培养了好的作风，成了新三五八旅主力之一。

独立一团由游击一、二支队于1938年底合编为独立一团。团长毛少先，政委陈远波，参谋长曾来古，政治处主任罗斌。活动于静乐以东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也是新三五八旅主力之一。

独立二团由沂州游击队发展为第四支队，后改为独立二团，团长张新华，政委陈云凯，政治处主任李三柚。这个团人数不足千人，但打仗勇敢，能吃苦耐劳，也是新三五八旅的一支劲旅。

第三支队是1939年组建的游击队，在静乐、交城、阳曲等敌后边沿地区活动，成为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游击队。

雁北六支队是1937年秋组织的游击队，1938年春天，从各县游击队中抽调组成的支队，下辖3个团，分别是骑兵团、步兵二团、步兵三团。

新三五八旅的光荣使命

晋西北（后改为晋绥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门户与屏障，是华北、华东同延安联系的桥梁与纽带。但这个地区环境错综复杂，生活

艰苦。保证完成贺龙同志交给新三五八旅的光荣任务，是全旅同志的奋斗目标。

旅机关于 1938 年底，由古交移驻岚县县城后，实际上行使一二〇师原领导机关的指挥职能，包括指挥新军的任务在内，因为贺龙离开晋西北之前，战总会军事部部长程子华当面对贺龙说：“老总，我调冀中工作后，这支部队就由你指挥了。”新三五八旅的具体任务是：第一，团结晋西北一切抗日的人民和军队包括阎锡山的新军与旧军，坚持晋西北抗日战争。第二，在晋西北党委统一领导下，配合战地动委会、牺盟会开展群众工作。第三，巩固与扩大晋西北八路军的武装力量。同时，也要尽全力帮助与支持新军建设。第四，护送前往晋察冀与晋东南的干部与物资，并保证通过封锁线的安全。

粉碎日寇春季大扫荡

新三五八旅驻岚县迎来了第一个春节。虽然我们没有钱办酒席、买鞭炮，但机关也吃上了猪肉与饺子，这是十年来第一次，过一个安静与丰富多彩的好年。不料春节后日寇出动四五架飞机轰炸岚县县城，给岚县人民的财产带来极大的破坏与损失，牺牲了 10 余名群众，但我旅人员、马匹、物资均未受损失。敌机轰炸是敌人进攻的前奏，果真 1939 年 2 月下旬，日一〇九师团分兵多路向岚县进攻，除朔县 1000 余敌进到神池被警备六团阻击停止进攻外，太原敌近千人、沂州敌七八百人、宁武敌近千人，分别向静乐合围，但在静乐以东之北被七一四团、独立一团伏击，毙伤敌百余人，于 2 月 28 日攻占静乐时，又遭受独立二团守城部队抵抗，击毙击伤几十人。日寇侵占岚县、静乐、方山和东村后，积极抢修城墙，组织部队出城骚扰，仅岚县敌人就出城清剿三次。就在这个时期，警备六团组织人员破坏宁武、朔县铁路、电线，打击日寇的进攻与骚扰，使五寨、岚县敌人惶恐不安。六支队在雁北怀仁城西拔掉鹅毛口敌据点，打死打伤与俘虏敌近 200 余人。兰村出扰敌人钻进龙泉的沟里，被独立一团全歼，战斗 30 分钟，50 余名日本兵没有跑出去。

新军各部队也在各自的地区开展向敌人进攻，打击日寇进攻，并作出

极大贡献。由于三五八旅与友军开展了积极打击日寇，截断交通运输线，迫使岚县、静乐与方山之敌分别撤回，最终收复了这三座县城与西北全部领土，胜利完成了党赋予保卫晋西北根据地的光荣任务。

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由于一二〇师主力在冀中战果辉煌，取得了巨大胜利，部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故一二〇师首长决定将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政委张平化、参谋长喻楚杰及机关少数同志调去冀中，恢复三五八旅领导机关的建制。而新三五八旅调师教导团团长彭绍辉任旅长，区党委书记罗贵波任政委，李夫克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刘惠农，继续沿用三五八旅名义（为区别新旅，改称张、彭八旅），在晋西北坚持抗日战争。

新三五八旅司令部就驻岚县西南之上明镇，政治部驻西上村，晋西北区党委移驻大蛇头，岚县动委会与牺盟会与县委以及群众团体都驻前合会。在岚县、静乐、方山积极打击日寇，执行统战政策，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抗战队伍进一步加强，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摘自《人民文学》

红军时期的一段回忆

贺长光

1935年，国民党反动军队对神府苏区进行反革命大“围剿”，神府苏区大部分地方被敌侵占，革命群众遭到了空前的灾难，许多家庭流离失所，有被敌人杀害的，有外逃的，也有在山沟里躲藏的。我和我的哥哥也藏在山上石沟里。红军部队分成小股，分散活动。地主豪绅十分猖狂地逼债要租，到处寻找红军家属，要挟他们“自首”投降。但英勇的红军战士不畏强敌，对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保存自己的力量，保卫苏区的存在。

我的父亲1934年就参加红军游击队，在敌人大“围剿”时和家人失去联系。春季，敌人联保处派两个“衙役”，和甲长共3人，到我家逼要“地亩”款，因给不起地亩款，就把我父亲捆绑拉走。父亲在中途挣脱绳索，与敌“衙役”厮打跑掉，连夜找到红军游击队，就参加了红军，参加了反“围剿”斗争，为穷人和被害群众报仇。

父亲走后，敌人将我家抄家封门，逼得我兄弟两人外逃，我哥在刘家坡揽工放羊，我在高家塔一家油坊当童工，赶牛、推磨、放牛，有饭没工钱。1936年2月，我回村正遇上红军干部来贺家川“扩红”。红军干部杨维元指着我问：“这是谁家的娃娃？”围观的群众说：“他爹参加红军走了，无音讯，母亲早已过世，娃娃们无人照顾真可怜！”他转身问我：“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当红军去？”我说：“愿意！”随后我就跟他们到神木苏维埃政府驻地贾家沟报名。保卫局负责人问我，你为什么参加红军？我说为了打倒国民党和地主豪绅。他又说：“当红军有三条纪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被敌人抓住不能当叛徒，你能做到吗？”我一口答应我能做到，就这样我参加了红军。

1936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对神府苏区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那时神府红军部队已由三支队扩大为红三团、独立师，对敌人的“围剿”展开了反击。根据地有了较大的扩大，苏区建立苏维埃政府，区、乡苏维埃政权，村贫农会，组建起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团体。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为红军站岗、放哨、参战、慰问、送粮、送饭、送军鞋，

监视地主豪绅的活动。

我初参加红军穿的是没收的地主的衣服，花花绿绿的，大家见我叫我“红小鬼”。我们白天住在村里，晚上夜静后，转移到村外，防止敌人包围偷袭我们驻地。那时处于游击环境，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吃不上饭，没衣服穿，自己动手打麻鞋穿。

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逼蒋抗日，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

1937年春，国民党军队对神府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我原来在神府苏维埃政府当通讯员，后调到特委无线电台送电报，由于工作需要电台移交给红军独立师师部，我由地方转到了部队。4月间，神府苏区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停止内战。独立师驻扎在王家桑塔、沙峁、刘家坡、石角塔，有1000多人的部队，是供给制，每天1斤粮5分菜蔬钱。驻地根本没有菜吃，就动员战士们到野外、河滩、地里挖野菜，来解决吃菜问题。小米很少，就吃高粱饭。7月间，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发来灰色军装，把原来的红军服装换下，五角星红军帽换成灰帽。引起战士不满，不愿换装，有的说，打了国民党几年，现在改编成八路军警备六团，穿国民党部队的灰军装，真想不通！后经师领导做思想工作说，当前是一致抗日，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我们仍是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大家思想通了。9月初，部队开赴山西前线，打日本帝国主义。我因年纪小，转回地方搞青年工作，继续参加根据地建设。

摘自《红色神府纪事》

红三团、警备六团、神府支队的战争岁月

刘维真

我是陕西神木县刘家湾人，1934年10月参加红三团至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我担任战士、通讯员、特别员（警卫员）、警卫班长、警卫排长。

在1934年10月至1937年8月，3年当中，主要打了些小仗：在北上府谷参加了高粱战斗，歼敌骑兵10多人。在清水、孤山、黄甫、哈拉寨消灭了民团、土豪。1935年2月，打太和寨一战受损未成功，接着在毛家坬歼敌1个连。攻打瓦窑渠受损，撤离。后来我军骑兵连叛变。

此后几十倍于红三团的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围剿，他们修碉堡、并村子，步步为营，编保甲制连坐法。红三团被迫化整为零，组成10多个小分队，白天隐蔽在山沟野外，晚上出来活动打击敌人，打游击一直到1935年9月份。墩梁、解家堡战斗受损，桥家堰消灭敌人数十人。打采林，高家山受敌伏击。

1936年元旦，袭击沙峁镇。在榆林香水渠消灭敌人五六十人。在鱼河堡、镇川堡、毛国川、安崖地、五元家、万镇，打了一些战斗。

红二十八军北上神府地区，东渡黄河在桃柳沟、杨家墉消灭敌1个多营。我红三团由沙峁头东渡山西罗裕口完成了配合任务。接着在贺家川和敌人打了3天3夜，战斗非常激烈。

1936年5月，我红三团在榆林佳县的烟洞山被敌人1个骑兵团、1个步兵团包围，由半夜打到天明，才分散突围冲出包围圈。我被十几个敌骑兵追赶的距离不到10米，眼看就要当俘虏了，我的枪是德国造手提连枪，这种枪一梭子就50发子弹，但只剩20发子弹了。此时我急忙回身向后打出十几发子弹，敌人骑兵连人带马倒下三四个。我趁机跳下沟去，衣服都被酸枣枝挂破撕碎不见了，鞋帽也都丢光了。我一直等到天黑，从敌人空隙中偷渡佳芦河，来到齐家会村。正好碰到佳县地方工作的妇女青年会同志们，她们见我这个样子大笑，一位同志将我推向炕用被子包住，找来衣服。后来又找来鞋子，她们又找来布连夜给我缝裤子、帽子。以后我和她

们在一起打了 10 多天的游击，那些天，我成了她们笑话的对象了。后来找到了大部队，我回到连队，连长费儿、指导员张崇仁和同志们都说有人亲眼看见我被敌人活捉了。我说：“狗日的他们连屎都捉不住。”逗得大家大笑一场。

1936 年 8 月独立师成立，在高家堡消灭敌人两个连。在苏泥家战斗中消灭阎锡山晋军陈长捷、段树华两个连，活捉其连长。二上哈拉寨一路出根据地，来到敌占区孤山、清水、皇甫到哈拉寨，打了一些仗，将据点里的敌人消灭，扩大根据地，打下哈拉寨后解决了部队的吃、穿问题。部队返回时，在庙沟门受到敌人的伏击，未受损失。在介虎坞被敌人阻击，战斗打得很残酷，后撤出战斗，牺牲不少指战员。

1936 年 11 月至 12 月，我们三上哈拉寨，先后消灭了几个民团的据点之后，又消灭了从绥远派来的一个骑兵营，敌营长被活捉。

在沙峁镇战斗中，我部队没有损失。接着有消息传来，中央红军在陕西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我独立师决定南下到佳县、米脂一带活动，部队在井道峁被敌人高桂滋的两个团阻击，后面有榆林高双成三个团尾随追击。我独立师决定挥师北上，在回苏区的途中，上述敌人的几个团对我师形成包围，佳芦河边还有敌人陈长捷一个团驻守在至高家堡下至介虎坞镇，这阵势真是插翅难飞。我师行进到离河边还有 100 多里地时，指战员们已经有两天没吃饭了。我们这些当特务员的到村中去找吃的，但敌人实行了并村，村中无人，我们只好在老土豆坑子里找了些连老乡也吃不成的小麻土豆用火烧熟分给王兆相师长、王宝山政委、王恩惠秘书长、王国昌主任们充饥。

当时的情况部队只有强攻硬拼，冲过佳芦河火龙庙的敌人关口，才能突破重围回到苏区。王兆相师长亲自挑选组编一个连排以上干部突击队。每人带上手榴弹、大刀、刺刀、短枪，向敌人一个加强营把守的关口进行强攻，大部队随后。最后经过激战，突击队硬是冲上去了，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胜利返回苏区马家湾。团政委陈进堂在带队掩护时牺牲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我红军独立师于 8 月份奉党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来电，东渡黄河。到山西的神池县贺池义井镇，受到贺龙师长的接见，部队整编为工兵营。近千人的部队编成一个营，真不好管理，

一个班 30 人，一个连 300 多人。没几天又改编成警备第六团并归贺龙指挥。

警备六团首次在山西宁武县对日军进行破击战后，返回神池县的凤凰山，接着奉命移驻山西偏关县。副团长孙超群带一个营到右玉县发展部队，组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

政治部主任王恩惠、一营营长贺伟带一个连到山西平鲁县建立抗日政府。王恩惠任县委书记，组建发展抗日游击队，两个月游击队发展到 300 多人。原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刘华香是大队长，段子敬是指导员。我一直跟着王恩惠当警卫员。

1938 年 2 月间，警备六团孙超群团长、张达志政委带领两个连在偏关侯平鲁县之间的马寨堡山阻击由大同方面进犯偏关的 1000 多日本鬼子。战斗非常激烈，双方进行拼刺刀，战斗持续了 8 个多小时，我方死守阵地，日方未能前进一步。那时我是孙团长的警卫员，孙团长和张政委都亲自掷手榴弹打击敌人，我也用手榴弹打击敌人，一直到晚上才撤出战斗向河曲县转移。

紧接着孙超群团长、张达志政委带领一营一个连和特务连又在南石班沟阻击日伪军 2000 多人，战斗持续了 6 个多小时。因第二营受阻击未能运动到敌人后方发起攻击，敌人攻势很猛，所以孙超群团长亲自用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战士们后来把子弹、手榴弹全打光了。当时我拿的是 20 响的连枪，打敌人不敢把子弹全打完，这时候敌人冲上来了，我强拉着孙团长从田畦上退了下来。特务连和一营的一个连被迫退下山，正在重新组织抵抗和有步骤的撤退，结果敌人从左、前、右三面包围过来，当时我军急忙向南后撤，有一个排长叫焦八子和一个战士有一挺机枪，我手里有一支 20 响的枪，眼看着不行了，撤不出来了，焦排长一把从战士手里夺过机枪来就站着向不到 20 米的敌群扫射，那个战士一枚手榴弹投向敌人，我看到孙超群团长、张达志政委和政委的警卫员已跑出五六米，就不顾一切地将所剩的 10 多发子弹向敌群扫射，敌人倒下几个，大部分立刻卧倒了。我们 3 个人一齐向后跑了 10 多米遇到了一个沟渠口，又一同从沟渠连跳带滚到沟下，到沟里一看日本鬼子、伪军死的伤的躺倒一大片。我们也跑不动了，就很快向南走，也没有遇到敌人追赶，一直走了四五里路才上山。我们 3 个人身上都有枪伤，只是不太重，排长伤在肩膀上。到天黑我们 3 个人才

回到单寨村找到团部，他们还以为我们3个人都牺牲了呢。

那时，八路军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在岢岚、五寨之间的三井镇消灭了日军数千人，取得了收复河曲、保德、岢岚、五寨、神池等8个县的重大胜利。

1938年6月间，我被调到三五八旅的旅部参谋训练班学习。说起来我们那个参训班有点特殊，除两名是新参加八路军的高中生外，其余七八个都是些调皮难管的兵，有贺龙师长、张宗逊旅长、贺炳炎团长等高级首长的警卫员。

山西五台和河北平山之间的骨石片战斗中，我们在张宗逊旅长的指挥下，消灭了从五台出来的500多敌人。在打扫战场时，我们犯了个很大的错误。班长带领我们去打扫战场，看见很多日本鬼子的尸体，这时有的战士议论说：“日本鬼子和中国人不一样，他们的心都是黑的。”有人不信，建议看看他们的心到底是啥样的。于是我们几个人就用刺刀挑出一个心脏来看。此事让张旅长和张平化副政委知道了，大骂我们一顿，这还了得，要开除党籍，全部关禁闭，等候处理。这下可吓坏了我们，但当时部队每天都非常紧张，又是行军，又是打仗，过了几天没有人再提起此事了。后来才知道，是旅司令部的参谋科长刘子荣作了自我批评，说这事主要是他没有管教好，要处分就请求处分他，这事才算过去了。

1939年元月，参谋培训班毕业后，我回到警备六团担任测绘员，待遇和其他参谋一样，负责团里的地图。

1939年6月，警备六团在岚县整训后，二上雁北，在山西右玉县的南山水头黄老沟和敌人打了一仗。当时听地方干部介绍，敌人只有100多人，团里就决定立即投入战斗，打起来后，才知道敌人有500多人。这一仗打下来敌人死伤100来人，我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牺牲了一个营长和40多名指战员。

接着我警备六团在新店子战斗中，消灭伪军70多人，这一期间，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在和林县的五间房子被敌人偷袭受到一定损失。后来，我们又在丰东地区打了几个小胜仗，在右玉东山、红山打了一次艰苦的战斗，消灭日本鬼子数十人。

1940年2月，阎锡山挑起晋西事变，发起反共进犯我抗日根据地，我

团在河曲战斗中消灭其 1000 余人。

1940 年春，在楼沟堡阻击敌人打了一仗，夏季反扫荡中，在岢岚山和日伪军打了一仗。

三上雁北在银墩、保安堡等地和日伪军作战。

警备第六团参加了百团大战，记得当时在破击战中打得非常艰苦，小的战斗就记不清楚了。

在我任测绘参谋时给团首长行军作战提供了许多可靠有力的信息，每天行军宿营时，我们首先调查几十里内外村庄大小、吃水、粮食、地形、风土人情、老百姓对我军的关系等情况，并了解掌握敌人据点及周围环境、地形等情况。这对首长决策起到了帮助，为此曾多次受到首长的表扬和奖励。

我在警备六团和晋绥二分区新八旅（后又改为晋绥二旅）四五个年头中任参谋（侦察参谋）时，都能按首长意图对敌人情况进行侦察且比较准确，并几次巧妙地抓俘虏，消灭敌人的侦探。一次我们抓住了太原城日本兵工厂的一个中国工程师，对其做思想工作后，他能暗地里定时向我军提供敌人的情报动向，这对我军有力地打击日伪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此我受到许光达司令员和一二〇师的表扬。

1945 年，我来到新成立的神府支队。刘籍甫任支队长、县委书记刘北垣兼任政委、徐曙东任参谋长，下设 4 个连 300 多人。张志远任一连指导员，连长是刘崇德、王效先（河北省人）。我是五连指导员，连长杨兴世。刘学英是六连指导员、连长张宗银。后来这个团逐渐扩充到 10 个连。

解放战争中小的战斗不说了，大的战斗有解放高家堡、解放神木、十里长滩战役、王家湾、麻地沟、沙圪堵等，消灭了大量敌人。

1948 年的一天，我们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要我们团护送毛主席到河北省西柏坡。时值黄河冰冻开解，河水湍急不能下水渡河，耽误了几个小时未能去成。随后，奉命北上打清水河，消灭敌人一个团。

后参加晋中战役，在忻州豆罗镇消灭阎锡山一个师。

1948 年在晋中太原战役中，开始我三十一团攻打敌军两个重点外围羊围山据点，碉堡非常坚固，四面不好接近，由刘籍甫团长、刘崇忠政委亲自率三营攻打，结果受阻，后重新组织强攻下来，付出了很大的伤亡。

由刘崇德营长和我带一营攻打东寨山，这个碉堡很高，三面有其他碉堡火力支援，难于接近，打了一上午，我们两个连的正副班长和 20 多名战士伤亡。我和营长商量这样硬攻不行，由我带三连绕道隐蔽到碉堡后面，敌人以为那里是山崖且密布地雷，估计我们不可能从那里上去，我派小战士从铁丝网爬过去，将栓在地雷上的绳子剪断，最后一个地雷的绳子不小心被拉响，但无伤亡。部队顺利地翻上围墙，敌人招架不住了被我们消灭。担任正面攻击的一、二连伤亡很大。

太原战役后，我们又北上打清水河，结果敌人逃跑了。后又参加了绥包战役，打了古半乌素战斗，攻打大同市接受敌人投降等战斗。

摘自《红色神府纪事》

神府工农红军的战斗岁月

贾如胜

我是神木南区贾家沟村人。1928年春在本村由贾怀光、贾令德介绍加入共产党，组织上要我以共青团员的身份在农村做党的宣传工作。1933年11月神府地区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诞生后，我因在本村的革命活动为敌人驻军所发觉而难以立足，就在11月间到尚家壘村找到南乡区委负责人贾怀光，要求参加三支队当红军。贾带着我找到三支队队长王兆相说我是正式党员，让我参加了三支队。

红三支队（后为红三团）的胜利发展

三支队开始行动时，去打一户土豪，一个队员因枪走火打伤一个女孩子。地主、豪绅们大骂三支队是“土匪”，有些群众不明真相，也把三支队当作“土匪”。后来，三支队在红教寺、佳县北沙坡西沟村和尚家峁岳南路上先后杀死6个收税狗腿子，并贴出布告，宣传了三支队取消苛捐杂税、打倒军阀地主、建立劳动人民自己政权的主张后，大得人心，群众纷纷称赞三支队是为人民办好事的队伍。反动官兵、土豪劣绅们则大为震惊，他们不敢出来收税、要租、逼债。从此三支队在农村的活动逐步公开起来。三支队所到之处，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同时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成立农村政权。到1934年4月，三支队已经发展到三四十人，开辟了好些可以公开活动的村庄。

4月间，三支队驻在孟家塬村时，距该村六七里的黄家塬村一个党员报告说：九圪村反革命分子王全誉带5个团丁回到家里。支队领导决定消灭这些家伙。我们吃过午饭就急行军包围了九圪村，不料王全誉抄小路逃跑了，5个团丁打死1个、抓住3个，缴获4支枪和10多板子弹。当晚三支队住宿到张家塌村。第二天三支队在该村编为两个中队，一中队队长王进修，指导员王宗光；二中队队长刘德，指导员是我。各中队编两个班。

不久，三支队到了三区王家圪，决定消灭太和寨村王进成的民团。支

队长王兆相带领两个中队长，各扛一把锄头去太和寨对面山上察看地形，杨文谟政委在队里召集党员开会进行战斗动员。王兆相等 3 人回来后，根据敌情和地形，布置一中队攻民团驻守的庙宇北门；二中队由政委带领攻庙宇南门，队长带 4 个人去抓南门哨兵。晚饭后，王兆相队长介绍了地形和敌人的兵力，说敌人有 20 多个，但十七八个是烟鬼，没有打过仗，我们要多做政治喊话瓦解工作。大家听了情绪很高，表示一定要消灭敌人。

这天夜里，部队行军 40 里，拂晓前赶到太和寨村前边。稍作休整后，王兆相带 4 个人去摸哨兵，部队随后紧跟，敌人发觉，我们两个队就一拥而下，包围了整个庙宇，边打枪边喊话。敌人拒不缴枪，队长和政委重新决定把一中队攻打的北门放开，命一班人去村里埋伏，也不打枪不喊话了。敌人不知究竟，先放出两个团丁察看，接着敌人像一群老鼠往外窜。这时，我们突然开了枪，同时大声喊话，没等敌人逃出村子，就缴了十几支枪。有 4 个家伙持枪逃跑，战士们追到山坡上，正好碰上几个农民在耕地，他们一人拿一把锄头对这 4 个家伙说：“把枪、子弹放下，逃命吧！”这些家伙乖乖地放下武器逃走了。这次战斗后，三支队和太和寨的群众一起召开了庆功会。群众高兴地送来窝窝头，端来热米汤给战士们吃。一个老大娘手里拿着五六个鸡蛋送到战士面前说：“孩子，这是才煮的，还热着呢。吃了好有劲打敌人！”

太和寨战斗后，三支队向一、二区转移了。我们到二区刘家瓜村的第二天早饭后，跑来一个同志报告说：盘塘的敌人到了菜园沟，把群众围在崖窑里面用点燃的柴捆烧。情况危急，部队得到这个消息，就决定马上出发营救群众。我们赶到菜园沟北梁，王进修代队长带一中队向西边靠近，杨政委带二中队守住山梁。敌人很快以几个坟堆为掩护向我们射击，并对我们喊话。杨政委从喊话中听出有刘征西（即刘鸿飞）的声音，就带着几个战士顺地坎下去，到坟下面一上塄坎大声喊：“刘鸿飞，你还不缴枪等啥时！”敌人的排长说：“我缴枪。”随即丢出驳壳枪，其他士兵也放下了枪。原来刘鸿飞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我地下党员，当时是敌二排长。杨政委又让刘鸿飞喊话，叫西边的敌人不用打了。但西边的敌排长却叫士兵后撤退走。一中队立即追击，二中队进入村里已经把逃路卡死。敌人无路可走，只好往老乡家里钻，结果一个个做了俘虏。这次战斗缴步枪 20 支，驳壳枪

2支。战斗中，周围十几里二十几里的赤卫队员听到枪声，在地方干部的带动下，都跑来助战，敌人完全陷入包围之中。

这次战斗胜利不久，沙峁头和盘塘的白军就撤走了。6月间，三支队到府谷南乡武家庄一带，北至窑虹、栏杆堡，西到刘家畔、王寿梁，南到邻家川等处活动。这时三支队扩大到一百四五十个人。

三支队的胜利传到了府谷。7月间，韩峰同志冒着危险一个人从木瓜堡来到神木请求三支队援助府谷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经王队长、杨政委和地方党委研究，同意援助。派张子玉任队长，贺成补同去，拨给1支步枪、1支驳壳枪，还给了十一支队3支步枪、2支八音手枪、1支折腰手枪，2支毛瑟枪交给了地方组织的小特务队。

1934年9月间，三支队改为红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鸿飞。下辖三个连：一连连长王进修，指导员是我；二连连长刘德，指导员马尚前；三连连长贺伟，指导员刘锦华。这时红三团活动于高家堡北面，柏林堡、解家堡一带，同窑野河东的杨解岛、栏杆堡等地区连接起来。红三团到处宣传党的政策，张贴标语，扩大政治影响。

为了开展府谷的工作，9月间红三团北上木瓜堡和庙沟门，与七支队会合。在那里活动的韩峰和张子玉等同志领导的七支队，不到3个月发展到十八九个人。红三团和七支队决定袭击哈拉寨敌人，进到该镇后，抓住5个蒙古兵教育后释放了。还抓住了两个老财，把一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另一个押回根据地，要了50套冬装、400银元后才放了回去。红三团这次北上，给七支队以很大的支持鼓舞，加快了府谷西北地区的发展。

反“围剿”战斗的失利和分散活动

红三团在撤回途中把我和另外两个同志留到七支队工作。12月中旬王宗光去七支队，又把我调到十一支队工作。十一支队只有二十三四个人，有长短枪8支、火枪2支、大刀2把。

1935年春节过后不久，红三团来信要攻打新寨子，要求十一支队配合。同志们高兴地说：“这可好了，消灭了敌人，搞他几条枪。十一支队力量就大了！”一班张班长是本地人，对新寨子地形熟悉，他说：“要十一支队

占领新寨子对面牵制敌人，但那里没有隐蔽的地方，对我们不利。”但他还是有把握的说：“不管怎样，给我几个人，摸到村里搞它点胜利品。”队部就先派他去了解情况，晚饭后在李家崮接头。支队按时到了那里，张班长说敌连部驻高旺升院子，排、班情况不了解。半夜过后十一支队到了指定地点，在一个开阔的坡地上等待红三团的攻击开始。战斗打响后，张班长带了3个战士越过小渠往村边一家的院墙边摸，张班长和一个战士刚到路边，从墙里飞来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张班长，他当即牺牲。另一战士上去抢救也负了伤，其余两个战士经掩护才撤下来。天亮之前，红三团那边枪声小了，我同队长研究决定马上撤退。当我们撤退到暖水沟时，红三团和赤卫队已经全部撤离，撤离决定没有通知十一支队。后来知道参谋长刘鸿飞也牺牲了。这次战斗没有避强打弱，不是伏击敌人的一部，结果打了败仗。

4月间我因病在家治疗。6月初病愈，到三区李家庄找到红三团。杨政委说张德超去了十一支队，要我任红三团三连指导员。三连共48人，2个排5个班，13个党员，连长刘增荣。我去后就赶上瓦窑渠战斗。部队出发到王家坨村宿营，晚上团部召开连干部会议进行部署。我问：“团里派人了解了瓦窑渠的情况吗？”王兆相团长说：“没有，但那里咱们都住过，地理情况熟悉。”贺伟、王进修说：“过去住过，但未注意过地形，敌人在哪个院子不了解，有什么防御工事不清楚。咱们子弹少，攻打防守的敌人要细致了解才好！”杨政委说：“我们需摸到敌人的家门口打，摸到哨兵更好。如被哨兵发现，我们就来个迅速包围，把敌人消灭到院内。”任建福说：“从新寨子的战斗来看（他是新寨子战斗中的突击队队长），经过训练的兵不如太和寨的民团那样好打。”王团长接着说：“如果这次搞好了，缴获几十条枪，就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这次战斗布置，一、二连在东西两侧打，三连在村北打。我们主要摸哨兵，问明敌人的驻地，能摸到家里抓一部分就好办了。如果敌哨兵先开了枪，就立即攻打，不等敌人出院，我们先占领窑背，把敌人围在院内。团部在二、三连间指挥各点。你们认为消灭敌人有把握吗？”同志们说：“地形不够熟悉，敌人驻地不清楚，从北面往下攻全是开阔地，没有隐蔽地方。团部是否派人侦察后再打？”王团长说：“那村十来户人家，我们摸到村里打，他们跑不了！”

会后我们回连队的途中，刘增荣连长说：“对地形敌情不了解，有些盲目。”第二天召开了党员会，刘连长传达任务后，在瓦窑渠住过的王学恭、李忠诚、张盛斌等说：“咱三连进攻的地形开阔，如敌哨在窑背，好远就能发现我们。我们子弹少，又没手榴弹，敌人住在哪个院里也不知道，冒摸不好打。”我让大家多想办法，克服困难。接着又开了全连会议，刘连长传达后，我讲了攻打该村的有利条件：该村是老区，人民希望消灭敌人，村里又有党的组织（但事先未联系）。接着两个排进行了讨论，战士的发言同党员会上的意见基本相同。会将大家的意见给团部作了汇报，团里也没有提出什么新办法来。

晚饭后，全团集合出发，团长、政委作了战斗动员。经过一夜行军，于天亮前到了瓦窑渠北梁上。略微休息后，各连接计划布置向敌靠近。没有预料，三连刚接近敌驻窑背后百十米远处，敌人就开枪了。刘连长带领三连一排向敌哨位刚冲过去就中弹牺牲了，通信员也接着牺牲。一排长贾怀耀见地形于我们不利，就改从两侧退下来。这时尚未听到一、二连的动静。三连撤退到出发地，我向团长、政委汇报了情况。团长说：“距此5里的马镇，驻一连敌军，如不很快撤退，就有被敌人堵击尾追的可能。40里外的瓦罗敌军也可能增援。马上撤退。”团长没有问一、二连的战斗情况，就从原路撤退了。部队到了马家新庄村东北梁上，敌人从东面开枪了，全团向村南沟退去。我们到了南沟半坡，一连的几个同志说马尚前指导员也牺牲了。

部队在马家新庄及附近几个村吃了晚饭后转移到了王家虬村。过了几天部队在任家山宿营时，三连召集党员战士总结瓦窑渠战斗情况。大家说，不侦察敌情，不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村南本可以牵制敌人，我们却没有去人，敌人无后顾之忧。不吸取打新寨子的教训，造成无谓伤亡。尤其辛苦两年扩充的几十个骑兵叛变投敌，大家都痛心。当团部通知连干部开会时，都以为是开总结会，战士们要我们把连里的讨论意见汇报团里。我到会一看，特派员老张（王达成）也在，心想这次总结会一定会开好。不料，会议不是总结瓦窑渠战斗，只有老张在那里大讲1934年取得的成绩，接着又说敌人派来一个旅，两个骑兵连，还有反动的民团和反共义勇队，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要部队把年老体弱的精简回去，以减少牺牲。

还说他要回特委汇报情况，搬红二十六军来神府粉碎敌人的“围剿”。其实，红三团并没有什么年老体弱的。年龄最大的老陈 50 岁左右，最小的马俊 16 岁，小伙子挺精干的。参加会议的地方同志和红三团的同志不同意老张的意见，因此上午的会议没有开下去。下午的会上，老张说，三团的精简问题由三团自己研究解决，指定十一支队过黄河去山西兴县活动，会议草草结束。

红三团在团部研究部队精简和分散活动后，三连只有 3 个同志需要暂时离队，经动员他们也同意这个决定。离队时组织上要求他们不暴露身份，团结村里的人对敌斗争，决不能向敌自首，这 3 个同志回去后表现很好。部队精简后，团部又研究了分散活动情况，当时分成了一、二、三、四连 4 个行动单位，四连的部分战士编到一、二连。4 个单位活动地区是：一连在神木一、二、三区；二连在佳芦一、二区；三连在神城区和佳芦三、四、五区；四连由连长小张带几个同志活动在佳芦和神木四、五区之间；团部机动指挥各连。三连没有连长，我提议高振禄任连长，团部同意。杨政委向三连宣布新连长后，并作了分散活动的动员工作。在讨论中，三连战士认为，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三连比当初的三支队大了三四倍。我们有苏区人民的拥护，又有南方红军和二十六军的支援，一定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大家还说骑兵连的叛变，迟早要受到革命的惩罚。革命的人民是压不倒、杀不绝的。在严峻的考验面前，红军战士们充分表现了同仇敌忾、与强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三连深入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敌后神城区，时刻注意保护群众利益，我们每离开一个村庄时，就让群众去向敌人报告，以免群众受害。群众也时时刻刻关心掩护红军。一次，我们夜间行军走到四区斜塌村，派了 1 个战士先进村了解情况。他一进村就发现了敌人，正在危急之时，一个媳妇赶紧说：“你还不找桶去担水，老总们吃了饭还要洗脚，明天还要做早饭！”这样战士才脱险返回。当晚我们驻在东山杨家畔，而敌人却到四区马家新庄一带追我们，结果扑了个空。

过了几天，三连在佳芦四、五区和神城区活动后转移到高家堡北面。所到之处，我们散发传单，同群众一起劳动了解情况。群众也非常拥护我们。驻高家堡的敌人离我们只有 20 来里，可一直没有攻打我们。原来，敌

人向这里的群众了解我们的情况时，群众夸大说我们有七八十人，还带两挺长腿腿的枪，敌人因此不敢来，我们前进敌人就跟，我们宿营，敌人也驻下，相距二十多里不敢接触。有时我们在野外住宿，群众就把粮食和锅放到野外叫我们自己做饭吃。

两个多日的分散活动，大家深深体会到，敌人虽然想尽办法，并村庄，办自首，想把红军和地方干部困死，但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拥护共产党员和红军，极端仇视国民党反动派。只要我们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胜利的消息，密切军民关系，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

9月间，红三团在李家庄抓了万户峪土匪骑兵的3个俘虏，缴了3支步枪、3匹马。这是在最困难时期我们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后来，红三团在毛家坬村宿营时，太和寨的敌人中有人要投降。团长、政委带一、二、三连当晚去接应。到了太和寨寺院的对面山上，忽听太和寨一声巨响，三连还没有到接头地点，敌人就开枪了。原来敌人是搞假投降。部队马上撤退到白家沟。这时才知道，我方牺牲了张德超、高育才、贾怀耀等4位同志。李治洲的驳壳枪和子弹全丢了，第二天才回到部队。我军又吃了一次大亏，战士的思想情绪很不好。

11月间，部队在陈家沟召开了总支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刘北垣。会议内容大致是，王团长准备去陕北特委汇报情况，杨政委也要求去，最后决定由杨政委带张江全和一女同志去。会上还确定由三连到白区去抓土豪，筹备棉衣、子弹和经费。三连来到柏林堡北二三十里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地方干部很久没有来，没有地方干部配合，只有靠部队自己四处找群众进行宣传、侦察。三连经济员冯道在和群众交谈中了解到，群众盼望红军常来。他们说：“你们不来，解生龙这个地主民团头子就回来要租子要债，我们就不得安生了。”冯道要农民组织赤卫队保护自己，农民说红军常在这里他们就敢同敌人斗。部队两次到神城区虽然没有抓到地主老财，却在当地群众中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解生龙知道红军常去，就跑到神木城里，收粮收税也不敢去了。白军士兵看到要他们不要给地主老财当炮灰等标语也不撕了。

一天，驻在陈家坪的敌人来攻打，一、二、三连一起反击，把敌人压在西北边的坟地下。敌人占了有利地形，三连长高振禄中弹牺牲，一、二

连也牺牲了战士任建禄、刘建征，我的头部负伤。战斗结束后，我临时指定班长王学恭、二班副刘忠诚负责三连工作，并报告团部，我即离队养伤了。

走向新的胜利

1936年2月我伤好归队后，在三区王家寨由杨和亭主持召开了地方干部会议，三团的干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调整了红三团的干部：毛凤翔当政委，王团长几次提出他不任团长，改由贺伟接任，团参谋长刘鸿飞牺牲后一直缺员，由我继任。

会后第三天，三团就向佳芦区出发了。在离万户峪10里的张家飒村宿营，第二天有人来报告：万户峪民团从马家沟动身返回。团部决定在大坵村北面伏击敌人。这次伏击战打死了民团头子，缴获长、短枪18支，团丁全部被俘，因为大都是烟鬼，所以全部释放了。部队返回三区，在毛家坵召开了庆功大会，毛政委表扬了作战勇敢的同志，各连也都作了总结。

第三天部队向佳芦区前进时，传来张秀山、刘明山等六七位同志来神府工作的消息。团长、政委和我迎接了新同志，我们一一握手，相互介绍认识。部队返回毛家坵，派人找来杨和亭、乔钟灵、贾怀光等地方同志。毛政委把三团的情况向张秀山等作了汇报。张秀山也传达了上级对神府工作的指示，他还给三团带来两挺机枪。大家对于他们的到来十分高兴，认为一定会加快神府苏区的恢复和发展。

张秀山等同志来后又对红三团作了调整：刘明山任团长，贺伟任参谋长，我被调任四支队政委。四支队政委武开章、队长贾兰枝调回三团另行分配。我随即到了佳芦郑家坵村找到四支队，传达了上级调动指示。武、贾两人走后，我同经济员许发善和三个班长作了交谈了解到四支队的同志大部分是当地人，熟悉情况，我决心和他们团结一致，争取把四支队进一步搞好。

3月间，四支队在上河村的附近碰上从南走来的不少担架队，我们问是哪个部队的？回答说是刘志丹和宋任穷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四支队马上派人带路，又帮助他们找吃住地方，并向群众宣传刘志丹来了。消息传开，农

民们非常高兴，逢人就说刘志丹来了。

二十八军驻在李家峁村，我到军部请示工作。见到了刘志丹、宋任穷两位首长和唐参谋长。他们问附近驻有什么敌人，有没有地方干部？我汇报说，30里外自家铺有土匪骑兵、民团团丁各20来人；西南通秦寨驻敌骑兵200多人；东北50里外万户峪驻敌人1个连；往北还有花石崖村驻1个土匪骑兵连。泥河沟驻阎锡山的1个排，不等我们去打就逃跑了。刘志丹笑着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打到他们老窝里了，因此他们夹着尾巴守老窝去了！”刘军长问我四支队有多少人和枪。我回答说：“有28个人，1支驳壳枪，5支七九步枪，1支土枪，2把大刀，五六支红缨枪。”刘军长听了笑嘻嘻地说：“人枪还不少呀！”我又回答枪就这么几支，子弹更少。刘军长感慨的说：“是呀！咱红军的武器弹药来之不易，都是用生命换来的。”他还指示我们说：“你们以后多找些小股敌人，一次搞到1条枪，10次就是10条，积少成多，慢慢就壮大了。敌人走了，你们伏击他的后尾，搞他一两支枪就走。游击队要多打伏击，摸哨兵、夜间偷袭等办法都可以使用。”临走，刘军长要我第二天派两个带路的。

第二天，我挑了一个班长、一个战士，让他们给刘军长带路，并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刘军长让他们回来再归队。我又找来干部要他们负责将伤员抬到北面苏区去。

红二十八军在神木三区杨家墉村一战消灭了太和寨敌人1个多连，俘虏了副营长。这个消息传开，只1个晚上，除沙峁村守敌外，神木苏区其余敌军全部逃跑了。红二十八军从山坡村渡过黄河，解放了兴县的罗峪口和黑峪口。后来向东南进军与十五军团会师，伤病员转回神府苏区治疗。

在二十八军的胜利进军中，红三团和各游击队乘机前进，神府苏区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四支队由二十多个人发展到四五十人。

6月间，四支队和榆林的二中队合编为独立二营，副营长贾正应，政委是我，下辖两个连，活动在佳芦区和榆林开光川一带，先后进行了白家铺阻击战和针树峁战斗。8月间，山西晋军侵占了佳芦区不少村庄，二营逐步转移到高念文村以北。9月到了苏泥家村时，村干部报告说，有个不认识的人走了，要我们提高警惕。晚饭后独立师也到了该村，我们把情况汇报给

师领导后，师领导要我们注意南面动向，北面由师部负责。第二天天还不亮，晋军 1 个排就进攻了。二营一连在独立师一团一连援助下，全歼了进攻的敌人，俘虏 30 多人，其中有敌连长、排长各 1 人。不一会敌人又向独立师二团的北面开始进攻，机关枪、迫击炮并发，火力很猛。二团从正面阻击，独立二营由侧面反击，战斗取得胜利。俘敌 100 多人，内有敌连长 1 人、排长 3 人。南北两个战场共歼敌近两个连，俘虏一百三四十人，内有连长 2 人、排长 4 人。俘虏说：“这次我们来了一个加强营，带迫击炮 1 门、重机枪 1 挺，结果还是失败了。”这次战斗独立二营牺牲战士 1 人，负伤 5 人，我右臂负了伤。

我们胜利地返回屈家南沟，准备迎接更大的胜利。

1982 年 11 月 17 日

警备六团在塞上战斗片段

韩创业

警备六团原是陕北的一支红军部队，当时称红三团，后改编为红独立师第一团。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红独立师改编为工兵营。1937年8月间，工兵营奉命东渡黄河，北上抗日，当部队挺进至五寨县时，即改称为警备六团。当时，该团团长为王兆相，政委为张达志，副团长为孙超群。1938年初，王调回延安，由孙超群接任团长，政委仍是张达志。1940年孙、张调走，又由张鸿卿、毛少先先后接任团长，王定一为政委，李发应为副政委。1941年毛调走，一段时间没有团长。1942年该团被调到晋西北，李发应任副团长，潘振华任政委。1945年潘调走后由曾长久接任政委。

警备六团，在抗战初期受一二〇师指挥，后又归彭绍辉为旅长的新三五八旅领导。彭八旅改为独立二旅后，警备六团仍属二旅建制。1940年晋绥军区成立，二旅改为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警备六团改编为九团，受二分区领导。1945年北上到绥远地区，则归绥蒙军区领导。1946年九团又改编归属晋绥三旅，1947年三旅改编为三军八师，九团改编为八师二十四团。

在抗战期间，警备六团主要活动在岚县、青岗、五寨、神池、保德、河曲、偏关、平鲁、右玉、清河、和林、大同、丰镇、凉城等长城内外的近20多个县，担负的几项主要任务：一是穿插于敌后，机动灵活地打击消灭敌人；二是清剿国民党散兵和土匪，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不受损失；三是深入群众，协助地方党组织做抗日宣传，动员、组织广大青年参军参战，扩大抗日队伍。

我在警备六团工作达10多年，尽管对该团在抗日期间活动情况了解一些，但由于已时隔40余年，又没有原始资料，仅靠回忆难度很大，下面只从军事方面写一些我记忆较深的战斗片断，以供编写人民革命斗争史参考。

挺进抗日前线，迎头痛击敌寇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勃勃，以大批兵力向我华北地区

发动全面进犯，并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9月上旬，日军突破天镇盘山晋军防线，很快占领大同及雁北各县城镇，北同蒲、平绥铁路干线亦控制在日寇手里。日寇所到之处，奸淫抢劫、烧杀，无恶不作。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国民党不战而逃。就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备六团奉我党的命令，东渡黄河，北上抗日前线，展开与敌寇殊死的战斗。

1938年2月，日寇由平鲁向偏关进犯。当时偏关地区驻有我团和国民党骑二军。22日敌人占领了骑二军军部驻地——距偏关县城60里的老营堡。这时，上级命令我团连夜出发阻击敌人，以掩护群众撤退转移。当夜，我团便向偏关以东40里的马站堡挺进。路上我们与国民党骑二军撤退部队相遇，在一条河沟的人行小道上，我八路军雄赳赳、气昂昂北进，国民党军丢盔弃甲南逃，沿路拾了他们不少武器、装备。我指战员对国民党骑二军的这种狼狈相非常愤慨。有的战士故意讽刺地问：“你们到哪里去呀？为什么不打敌人向后跑呢？”当夜，我侦察部队在马站堡以东河沟与敌接触，战斗打响，双方对峙一夜，都有一些伤亡。23日，日寇开始攻击马站堡北山我军占据的高地。我指战员与敌人展开激战，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敌军虽伤亡很大，但始终未能占据山头。下午6时许，我军完成阻击敌人、掩护群众撤退的任务后，便迅速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是我团与日寇打的第一仗，也是第一次取得打鬼子的经验。经过这次战斗，部队对打日本鬼子树立了信心。战士们说“听说鬼子很厉害，经此一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国民党军队过去瞧不起我们，说我们武器破烂，不能打仗，经马站堡一战改变了看法，翘起大拇指说：“你们是好样的，能打！”

继马站堡阻击战之后，我团在石板沟又打了一次伏击战。石板沟是河曲城以东80里的一个村庄。1938年春，日寇千余名进犯河曲，企图长期占领该县城，但因这里的地形多山又背水（黄河），与驻防五寨之日军联络较困难，因此，在侵占河曲县城仅数日便撤退。石板沟是敌人撤退的必经之路，地形特点是沟深山陡，敌人不易展开。我团预先埋伏在沟沿两侧，待敌人进入沟心，集中打其后尾一部。一天，上午10点左右战斗打响，埋伏沟两侧的我指战员，像雨点般地向沟里扔手榴弹，机枪、步枪也同时开火，敌人遭到这突然的打击，人喊马叫，一片混乱。后来敌人展开兵力反扑时，我团即胜利撤退转移。这次战斗，击毙打伤日寇多名。鬼子只好把

尸体用柴火烧掉，带着骨灰溜走。至此，日寇没敢再进犯河曲。

马站堡阻击战和石板沟伏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消除了一些人心里存在的“恐日病”，树立了我党领导的八路军能够打败日本鬼子的必胜信念。

大踏步地前进出奇袭击敌人

1938年秋季，我团由五寨出发，经偏关、平鲁、右玉，行程400余里，直奔凉城县境内的南北水泉村，决定出其不意袭击厂汉营镇。厂汉营镇，是内蒙古凉城县的一个重要集镇，也是平绥路南侧的战略要地。这里驻有伪军1个连，防备较松弛。9月14日，我团突然向该镇伪军发起攻击，没多长时间，就将敌全歼。这是我团长途行军奔袭敌人的第一次胜利。

厂汉营战斗结束后，趁平绥路敌人还未来得及调动，团首长决定乘胜夜袭红沙坝车站。红沙坝车站距厂汉营约有50公里，是丰镇、集宁之间的咽喉车站。此站全由日本鬼子守护，戒备森严。守护的日军虽然只有百人左右，也没有什么较强的防御工事，只有数层铁丝网，但由于完全由日军守护，战斗力较强，加之交通方便，增援迅速。因此团首长决定速战速决，打了就走。在此方针下，部队深夜向车站出击，先把铁丝网剪断，逐步逼近，在剪最后一层时碰响了铁丝网上的罐头盒，被敌人发现，战斗随即打响。我一、二营穿过铁丝网，占领了有利地形，用超过敌人几倍的火力，把敌人打哑了。我们进到日军住的屋里去搜索，看不见一个鬼子，只见屋内有衣、被、望远镜、手表等。找来两名铁路工人问鬼子到哪里去了，他们也搞不清。原来日军住的屋里有地洞，从地洞逃走了。这时派到铁路两侧的部队，一面防止敌人增援，一面破坏铁路。可是破坏无工具，又无经验。战士们就用七八个或十来个手榴弹捆在一起炸铁路，结果炸不断，但是迷惑了敌人，敌人不知我们用的是什么炮。在搜索中，遇到一间屋子内隐蔽着的1个敌人的顽抗，我们连进2个人均被刺伤，最后用手榴弹扔进屋内，炸得鸦雀无声。后点火进去一看只有1个鬼子，盖着被子在床上躺着，两眼睁着一声不吭，喊话又不懂，只好把鬼子打死撤出战斗。在撤退时由于轻敌，吹哨集合部队，一营营长贺伟同志站在队前讲话，被隐蔽的

敌人打冷枪击中牺牲。这次战斗缴获了部分武器、装备，有三八步枪、军毯、大衣等，都补充了部队。

红沙坝战斗，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对敌人震动很大。因此日军调集2000余人，对我进行围攻，企图与我决战，以达到消灭或赶走我之目的。我针锋相对，按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活动，利用夜幕巧妙地撤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右玉、西山地区。

我团第一次在厂汉营消灭伪军1个连后，没过多久，敌又占领该镇，兵力增加为2个骑兵连，工事也有所增加。当时，我们在右玉东沟一带活动，经过侦察，在掌握敌情地形和敌人设防情况的基础上，决定在旧年春节前乘敌人忙于过年，疏忽大意，二打厂汉营。首先团部在破虎堡进行了战斗动员，组成30人的2个便衣突击队，1个由杨好好、焦九九带队，1个由教育参谋李建顺带队。战斗部署是，将这2个突击队成员全部化装成进镇卖农产品和办年货的农民，第一步先潜入镇内，第二步即配合主力部队，里应外合消灭敌人。1939年2月16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夜，第一组由某村长（内线联系）带领，经堡墙处的水道口顺利潜入镇内，并部署了战斗打响后先占领敌炮楼，插上我军的红旗，作为与主力部队联络的信号。第二组计划于二十七日上午潜入镇内。但不幸的是，潜入镇内的突击队，有1名同志在街上买货，不慎将枪外露，被敌发现，随即战斗提早打响。这时大部队离厂汉营镇尚有10余里。团部听到枪声，立即带部队跑步前进。12时许，接近该镇，组织强攻，全团司号员不停地吹冲锋号，部队勇猛扑向敌人，战斗异常激烈。敌见我兵力众多慌成一团，大部被我歼灭。残敌乘马冲出北门逃走。这次战斗打死敌人连长郭维臣及其大部，但没有全歼。我便衣突击队员，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与敌人一直拼到底。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他们拾起再给敌人扔过去，没有子弹就用砖头砸敌人，30名同志，除1名负重伤得救外，其余全部牺牲。总结经验教训有如下几点：（1）大胆设想，组织便衣潜入，待外攻部队打响后，内外合击，完全正确；（2）便衣进去主攻部队应提前行动，在不暴露的情况下，夜间靠近据点，隐蔽集结，一旦内应部队打响，外攻部队马上投入战斗，仍可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取得战斗的成功，减少损失，全歼敌人；

(3) 未等部队逼近便衣队暴露是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

第三次长途奔袭，是王老沟战斗。1939年春，我团奉命撤回晋西北岚县，进行了3个月的整训。5月间由岚县出发，经肯岚、五寨、神池、平鲁等地，行程500余里进到右玉南山。6月22日，部队在行军中得知，岱岳敌人出来扫荡。当时得到的情报是：敌人伪军百余人，还有少数日军。得此情况后，我团指战员高兴万分，便在行军途中召集各级指挥员传达情况，部署战斗，并命令各部队向敌奔袭，由北向南打，切断敌人的退路，防止敌人逃跑。我部展开猛攻后，连续攻夺2个山头，最后敌人占领了王老沟南山（此山上有马占山部队构筑的工事）。敌人占此有利地形死守，我军攻击多次均未攻下，争夺阵地达8小时之久，双方距离仅几十米。在战斗中，敌一挺重机枪的几个射手均被打死，尸体在枪边堆了一堆。为了夺这挺机枪，我以火力掩护战士冲上去，抓住枪腿没拉几步就被敌人打倒，再上去拉，又被敌人打倒，始终没有拉下来。为夺这挺机枪，我牺牲连长1人、战士多名。战斗进行中，我判断敌情有变化，不是原报的100多伪军，而是300多名日军，据此情况，我决定撤出战斗。但白天撤退易成溃退，所以一直对峙到天黑才撤出战斗。在撤退时，六连指导员王银堂负伤，现该同志退休在陕西省甘泉县，为二等残疾军人。

这次战斗，由于我侦察工作没有做好，敌情没有摸清，所以未能全歼敌人，同时敌人也没有估计到会遇到我这样的主力部队，被打得狼狈不堪。300多鬼子被我打死200余人。我伤亡145人，其中有营、连、排干部。二营营长白兴元同志和二营代教导员王金相特派员都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不断寻找战机灵活打击敌人

1939年6月下旬，我团跨出长城直奔内蒙古和林格尔的辛店镇。该镇驻守2个伪军骑兵连，从未受过我军打击，警戒疏忽，工事简单，镇四周只有土城墙为屏障。7月1日夜10时许，我部队抵达城下，部署战斗。分配一营攻城，二营为预备队，三营堵城门。在部队登城时被敌哨发现，战斗打响，我登城部队迅速突入城内，向敌人猛攻。在敌未展开战斗部署的情况下，我们已突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除

被我消灭一部外，其余乘马冲出城门逃走。这次战斗，团首长指挥果断，出其不意，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攻城的顺利成功，消灭了一部分敌人，缴获了一批战利品。战斗结束后，部队当夜便迅速向南转移。第二天，敌人出动飞机向河滩树林狂轰滥炸，结果只炸毁了许多树林。此次战斗后，敌人很不甘心，妄图用偷袭来消灭我主力。部队转移至和林格尔县的一间房子村庄时，由于连续作战过度疲劳，到达驻地只顾睡觉，疏忽警戒。原计划稍加休息再转移，没有估计到敌人未走大路，绕小道包围了团部驻地，我派出的侦察兵却未发现敌人。当时，团部仅有1个特务连，战斗打响时敌人已进村庄。房顶、院墙、大门被敌人堵住。突围时难以统一指挥，只有各自为战，边打边冲。整个村庄一片火海，硝烟弥漫，除了枪炮声什么也听不到。我全体指战员，白刃格斗，英勇冲杀，把敌人冲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电台台长李乾同志冲出房门，大门已被敌人堵住，身带电台翻墙时被敌人击中负伤。他带着电台，流着血继续向外冲，终于把电台带了出来。在战斗的紧急关头，驻团部以西四五里的一营，见团部被包围，教导员李发应同志指挥全营迅速增援，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斗中一营有不少同志穿着辛店镇战斗缴获敌人的黄军衣，开始敌人误以为是他们自己人，与我军混在一起，交战中发现是八路军，便慌了手脚，立即集中兵力对付一营，团部随之得以解围。这次战斗我虽然是被敌袭击，但由于全体指战员打得勇猛顽强，给敌人以严重杀伤。自此我们发现，敌人偷袭往往在拂晓包围，天亮打响。我部队亦采取了针对性措施，不管到哪里，拂晓要派出小分队巡逻或搜山，避免了意外的损失。

一间房突围战斗后，我团转至右玉西山整训了1个月。8月上旬，我们东出右玉县，夜间穿过平绥铁路，直奔丰镇城东的巴音图、大庄科两个敌据点，一夜时间将这2个据点的伪军全部歼灭，缴获其全部武器和不少物资。战斗结束后，为了迷惑敌人，我军以声东击西的策略，先向东进入阳高北山转了一个圈子，然后折向话行，决定穿过平绥路，到右玉东山沟一带活动。当时，团首长估计，穿越平绥路可能要遇到敌人阻击，所以从最坏的情况做了准备。命令一营为前卫，如遇敌人，用刺刀格斗，拼开一个口子，掩护部队通过，并决定在深夜通过铁路。那天，没有月光，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当部队路经一块西瓜地时，不少人被西瓜绊倒，不断发出

笑声和武器碰击声，肃静行进实际不静了。然而，没有一个人随便拿西瓜去吃，都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充分体现了我军指战员的优良作风。

部队顺利穿过平绥路，在右玉东山沟姚家窑、黄家窑、中窑子一带没住几天，左云、右玉、厂汉营之敌约 2000 余，分三路包围我团。在姚家窑我部队搜山小分队，拂晓与右玉来犯之敌接火。主力部队紧急集合后，发现厂汉营之敌已占领黄家窑后山。当时判断敌人可能是几路合围，我军当即以二连对付厂汉营之敌，以特务连对付右玉之敌，主力部队迅速抢占一座山。当我部队抢占制高点时，敌人已距制高点仅几百米了，团长孙超群便亲自指挥火力向敌射击。他见机枪射手只打零星敌人，没有对准敌集群打，即严厉指责，射手马上对准了敌人集群，把敌人打得在山腰中乱跑。经过激战，三路来敌均被我击退，但我三连伤亡重大，仅剩 30 余人了，连长刘春堂同志牺牲，全连班、排长牺牲得各剩 1 人。此次战斗，后勤非战斗人员与主力失去联络，团长很焦急，多次派人联络寻找，结果他们穿过公路转移到右玉西山去了。

在敌后，面临着数倍于我的敌人，我部队在战术上昼伏夜行，声东击西，时而活动在右玉东山，时而活动在右玉西山，时而出长城北进，时而穿越平绥东征，不断寻找战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逐渐打出了军威，各据点之敌胆战心惊，不敢轻易出来。从而，建起了右玉东山、西山 2 块根据地，保护了群众利益，保证了我党地方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以后在困难时期坚持斗争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转战长城内外展开两面作战

1940 年，警备六团奉命从雁北、绥南回师晋西北，参加晋西北的反顽固战役。我团从青岚出发到河曲，配合友军截击消灭杨集贤、白志沂带领的顽固派部队。我们的任务是由北山经寺塬、大小念塬、吕家塬进至河蓝城占渡口，然后在黄河东消灭敌人。部队经过寺塬时与敌接触，当时正是正月初四，夜很黑，又是三九季节，机枪大都打不响。可敌人如惊弓之鸟一打就跑，部队一夜行了 80 余里插到渡口，但敌人已逃到黄河西。至此，晋西北的顽固派全部被肃清。这年秋季，部队又参加了反扫荡战役，日军在五寨集结数千人，向青岚地区进犯，我团在二旅彭绍辉旅长的指挥下，

配合一师进行反扫荡，在西豹峪山上与敌进行一天激烈战斗，由于地形对我有利，周围森林密布，敌人始终未敢前进。这次反扫荡，部队生活非常艰苦，吃的是煮黑豆、煮草麦（带壳的），有的吃豌豆苗，干部、战士体重都降了几斤。团长张鸿卿因指挥不力，受到彭绍辉旅长的批评，当了100天团长就调走了。

1941年春，警备六团又返回雁北和绥南一带，接连打了几仗，有胜利，也有损失。一次是黑石沟战斗，地点是在清水河与和林格尔之间。那天正刮着大风，风沙弥漫，什么也看不见。战斗打响后，观察不到敌方的情况和运动，是进是退决心难下。正在此时，参谋长秦实庵和特务连指导员张卓汉同志牺牲。团长毛少先考虑，如继续打下去，也是盲目无把握战斗，便决定撤退，打了一次消耗战。另一次是，右玉敌百余人，夜间出动，企图袭击地方区县机关，骚扰抢劫群众，但未估计到我主力部队进驻此地，天亮我发现南山梁有敌人在行进，当时敌有多少搞不清楚，因而我绕山抢占东山，居高临下与敌展开战斗。在战斗中敌发现我兵力多，即边打边退企图逃跑。我部队边打边追，一直追了20余里。敌人把子弹打光，枪支砸坏，枪件分解扔掉，溃不成军。我军一直追到距右玉城下几里的地方，抓住3个鬼子，但死不投降，战士拖他走，不但不走反将战士的手咬破。正在此时，敌增援部队赶到，我将3名鬼子打死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我特务连连长邹金堂同志负伤。战斗结束后，我团向左云方向转移，又遇到左云敌人出来骚扰，天刚亮在牛心山附近发现敌百余人。经战斗，敌发现我兵力多，仓促逃跑，并施放毒气弹作掩护。我追击部队有些轻微中毒，但风大毒气很快吹散。这次追击战什么也没有缴获，只捡了几个毒气罐。还有一次战斗是1941年秋，团长毛少先带领骑兵出去活动，在距厂汉营敌据点20余里的厂汉洞住了2天，因思想麻痹未转移，第二天被包围。这里是个山沟，敌人堵死路口，骑兵不能展开，结果除毛少先同志和少数几个冲出外，其余全部损失，大队长王金龙牺牲。

主动进攻数次横扫各个据点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警备六团除抽出一部分干部参加整风外，大

部队仍坚持活动在清水河、平鲁、五寨、神池等地，其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保护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结束后，部队便开始有计划地主动进攻敌据点。其中打得最好的一次是八角堡的歼灭战。

八角堡属神池县管辖，守敌却属五寨县城之敌指挥。这个敌据点距三岔、五寨较远，离义井较近，因此八、义两处敌经常联络，互通情报。八角堡北临我根据地，处于一面作战态势，是靠近我根据地的一突出据点，常驻日、伪军百余人，防守较严，并配有电台。1944年以前，我团曾多次打击过从该据点出来骚扰之敌。这次在八角堡打的歼灭战，事先我团做了详细侦察和周密准备。1944年冬季，团参谋长周志高和我带先遣部队，先到距八角堡30余里的万家洼附近活动，派我和侦察员到八角堡城郊侦察近20天。在八角堡西有一小村，村边有母子二人的一户人家。我们晚上潜伏她家休息吃饭，白天上山观察，并派她儿子进据点了解敌情。就这样反复多次将敌人的兵力、警戒配备基本摸清。1945年正月初二，部队由河曲双神堂出发，经义井方向黑豆洼、韩家洼到马家洼集结。团首长命我回去汇报情况，我离开时留侦察员继续观察监视敌人。当我回团部汇报才片刻，话还没说完，侦察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报告，说敌人已向义井方向出发，团首长一听高兴万分，认为机会难得。我一面汇报一面通知部队出发。晋绥二分区独立营也参加了，部队集结在西山，指挥员看了地形，决定了作战部署，将主要兵力埋伏在敌人返回必经之路郭家附近，待敌人返回时一举歼灭。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冲锋号一吹，部队猛冲猛打，缴枪不杀的喊声响彻山谷。敌人看到四面被我包围，大势已去，顿时慌了手脚，120多伪军举手缴械全部投降。还有6名鬼子利用一壕沟，死不缴枪，顽固抵抗。经2小时的战斗，6名鬼子被打死5名，有1名负伤的鬼子做垂死挣扎，4个连围住这一个鬼子。为了活捉这1个鬼子，我们献出了5个同志的生命，其中有连长刘仆同志，最后大家气愤之下打死了这个鬼子。据点外的伏击战结束以后，立即部署攻城战斗，此时已是下午3时左右。

据俘虏供称，敌人据点里尚有少数留守人员，其中2名鬼子、1名电台报务员、1名重机枪射手。根据敌人的兵力和守备情况，我决定了攻城部署，九团（即警备六团）攻西、北、南三面，独立营攻东面。这次攻城是农历正月初，夜色很黑，对我攻城十分有利。我攻城部队在城下架梯子，穿梭

联络，敌人看不见我们，听到响声就乱打枪。独立营先攻上东城墙向南发展，消灭了南城墙的敌人，缴获了1挺九二式重机枪，打开了南城门。部队进城后向敌人营房搜索，逼近营房时遇到守电台1名鬼子的抵抗，最后发现只有1间房子有敌人，喊话不缴枪，被我打死。我带特务连攻南城门时，敌人的重机枪盲目不停地向我射击，但敌人人数少，防守薄弱，难以应付，我兵力超过敌人数十倍，四面攻击，几小时就歼灭了敌人，结束了战斗。

八角堡战斗的胜利是晋西北一次典型的歼灭战，我牺牲连长1人、政指1人、排长3人、班长9人及战士共30余人。缴获了敌人全部武器弹药，其中有：九二式重机枪、歪把子轻机枪、三八式步枪、王八盒子（日本手枪）等，全部装备了部队。正月十一日回到了河曲县的曲峪村，开了庆祝大会，将缴获的武器摆在会场上展览，让群众参观，政府动员群众给部队送了不少慰问品，大大鼓舞了士气，提高了部队的声誉。

在偏关、清水河、平鲁三角地带日寇设有不少据点，各据点的敌人都百余人，大部是伪军。这些据点的敌人虽然战斗力不强，但不少人由于是本地人，对本地的地形和社会上的许多情况熟悉，因而对这一地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和我党工作的开展危害极大。因此，八角堡战斗后，我部队便向这一地区开始逼近，先后把暖泉、阳湾子、铡草塬、韭菜庄窝、南丈子等6个据点之敌挤跑或消灭。

打暖泉、阳湾子、铡草塬据点时，团长曾征派我带2个连，夜间穿插敌背后切断退路，拟拂晓攻击。但在穿插时被敌发现，第二天攻击时敌全部逃跑。随即我白天攻打阳湾子，敌见我逼近就放弃据点，在山地野外与我对峙，我前进敌人后退，我停止敌人也停止，整整消磨一天。天黑敌人向清水河县逃跑。铡草塬是西临黄河山头上的1个据点，我以三连、五连2个连白天逼近，准备夜间包围，第二天拂晓攻击，用火封锁大门，但不知道黄河岸还有一暗道，敌人全部撤到黄河边。对面是国民党军队，不停地向我射击。我在搜索时抓到6名俘虏，缴获6支枪、2匹骡子，为不让敌人继续占领，放火把据点烧掉了。韭菜庄窝是我带1个骑兵大队去的（是骑兵旅的部队，归我临时指挥），当逼近据点时，敌人怕我攻击而逃跑。逃跑时伪军哗变，将一名日本鬼子指挥官打死，并将这个鬼子用汽油焚烧。

据点周围地雷密布，我清除了地雷，炸毁了碉堡，当天撤离。王庄窝是靠近长城的1个据点，这一据点的敌人也是闻风而逃。我军收复据点后，清除地雷，炸毁碉堡，给群众发放粮食，至此清水河县境内敌5个据点全部拔掉。

长城外5个据点拔掉后，还有平鲁县南丈子1个突出据点，我军围困这一据点不到一月，打击敌人3次。一次是敌人到祝马会，离据点20余里被我打击一次；一次是敌人6人到高家窑，离敌据点1里路，一鬼子指挥官被我击毙；第三次是利用敌人下山驮吃水袭击的。因为这个敌据点的碉堡筑在南丈子南山顶上，吃水要到沟下用毛驴驮，我围困敌人，首先把水断掉。一天拂晓，我派10多人的小分队，埋伏在沟里的水井附近，敌人拉着5头毛驴到井边驮水时，被我小分队将水桶打翻，敌人被活捉。敌人遭我多次打击后，士气低落，不敢出据点，有的装病，有的请假，不久该据点也被我拔掉。

拔除敌据点战斗，正是抗日战争战略大反攻来临之际，敌人在战略上已处于被动，因此，1个月的时间扫清了6个据点，解放了这一地区，为开展这一地区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警备六团在抗日战争中，面对十多个县几十个据点的敌人，斗争艰苦，作战频繁，可是部队越打越多，战斗力越打越强。我们团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作风过硬，团首长孙超群、张达志从来都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关键时刻，亲临指挥，有时到1个连、1个排、1个火力点，观察指挥，做到了毛主席教导的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在他们的模范行动鼓舞下，部队指战员每次战斗，都是争先恐后，所以部队干部的伤亡比例大些。曾在雁北、绥南牺牲的有：团参谋长秦实庵、一营营长贺伟、二营营长白兴元、特派员王金相（代二营教导员）、三营教导员李子恩、骑兵大队长王金龙等数以千计的指战员。他们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晋绥长城内外、平绥路两侧，是我团活动的地区。在这一地区，我们与群众的关系搞得很亲密，特别是右玉东西山沟，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有时还可以住一两天、两三天再转移，敌人一出据点，这里的群众就向我们通风报信。在那样频繁的作战活动中，没有好的群众基础是不能立足的。

因此军队打仗同做群众工作是并存的，如没有群众的支援，在这样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而我们也永远怀念这里的人民群众。

摘自《神府红军团征战记》

坚持雁北绥南抗日游击战的警备六团

杨克林

说起八路军警备六团（后改称九团），雁北、绥南地区 60 岁以上的群众都知道是一支英勇善战、坚决抗击日寇侵略者的队伍。

在抗日战争漫长岁月里，警备六团在雁北、绥南进行过大小战斗约数百次，消灭日伪军约数千人，为我党坚持雁北、绥南敌后游击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东渡黄河，誓师北上

我是 1938 年 5 月随该团政治处主任黄立清同志来到警备六团的。据了解，这个部队原为陕甘宁边区神府特区的一个游击支队，后称红三团，又改为红独立师，是陕北神府苏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创建起来的，是保卫神府苏区的唯一武装部队。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形成，红独立师改编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在王兆相同志率领下离开家乡，挥师东渡黄河抗日。先缩编为一二〇师工兵营，后扩编为警备六团，属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管辖，在 frontline 归一二〇师直接指挥。

东渡后，全团指战员基于民族仇恨，抗日情绪极为高涨，都想多杀几个鬼子，为中华民族报仇雪恨。不久，王兆相团长调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由孙超群同志任团长，张达志同志任政治委员，黄立清同志任政治处主任。从 1937 年 9 月起，这个部队多数时间在雁北、绥南山区活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地方武装抗击日伪，消灭土匪，开辟雁北、绥南抗日根据地。由于斗争环境的艰苦，部队不定期地撤回老根据地河曲进行休整，所以与河曲人民建立了深厚感情。

1940 年春，警备六团改归彭八旅指挥（即由彭绍辉同志为旅长的新三五八旅），部队逐渐扩大为 5 个营。由于夺取敌人武器，装备亦有所改善。1941 年秋，彭八旅改称一二〇师独立第二旅，警备六团的番号亦改称为九团。1940 年夏天，团长孙超群、政委张达志先后调走，由张鸿卿、毛少先

先后任团长，王定一同志任政治委员，又调来田零星同志任政治处副主任。

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数以千计的战士牺牲在雁北绥南的土地上。许多内战时期的红军指战员为雁北人民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雁北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英雄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艰苦战斗，功绩卓著

1938年5月底，我由一二〇师教导团分配到警备六团工作，当时部队正在五寨整训。据部队老同志们谈，警备六团东渡黄河后，日寇正沿同蒲路南下，阎锡山的队伍节节败退。六团挺进同蒲路，在师部指挥下完成了破坏铁路的任务，并北上到偏关、平鲁、右玉发动群众抗击日伪，进行了马站堡和石板沟的战斗，开始和日本鬼子交锋。1938年春又参加了粉碎敌人向晋西北大举进攻的战役。经过半年抗击日寇的战斗，战士们树立了打鬼子的信心，觉得日本鬼子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五寨整训进一步推动了部队的正规化。整训中总结了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军事训练，加强了政治工作，建立了连队各种制度，克服了游击习气，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从1938年8月以后，部队除个别战斗任务或短暂休整外，大多数时间在雁北、绥南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38年9月13日，部队由五寨出发兼程行军400余里，挺进至绥南凉城的中水泉一带。第二天就进行了奇袭厂汉营镇的战斗，消灭伪军李守信部队的1个骑兵连，缴获了敌人全部枪支、马匹和敌人抢来的大烟土。这次战斗对稳定群众情绪、开辟地方工作起了明显的作用。当地土匪散兵闻风而逃，使我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厂汉营战斗胜利之后，乘敌人未摸清我军情况之时，又长途奔袭平绥铁路红沙坝车站，消灭鬼子数十人，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和物资，对敌人震撼较大。数日后，日寇调集2000余人对我进行扫荡，我军昼伏夜出，巧妙地突破敌人的围攻，使敌人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撤回据点。

这一年的冬天，部队经常活动于长城内外、同蒲路西，寻找机会打击

进犯之敌，配合地方部队，掩护了党政工作顺利开展，使各县抗日活动风起云涌。

1938年底，团首长了解到左右凉县中心地区厂汉营又被敌人占领，并增加兵力至2个骑兵连。为拔除这个深入我活动中心的钉子，团首长决定再袭厂汉营。经研究利用年关上镇赶集的人多、敌人白天戒备放松的有利条件，采取派便衣突击队、里应外合奇袭的战斗计划。于是挑选班排骨干，自告奋勇组成30余人的便衣队，身带短枪、手榴弹，分两个组化装成上镇赶集、出售农产品、办年货的农民。第一组由杨好好排长带领先进入镇内，一旦战斗打响，坚决占领炮楼，并规定了联络信号。第二组由教育参谋李建顺带领从镇东进入镇内，配合第一组里应外合消灭敌人。不幸的是进入镇内的第一组的战士被敌人发现，便开了火。这时，便衣队迅速按指定目标占领炮楼，挂起了红旗，坚持战斗。手榴弹打光了，子弹打光了，最后用砖头打击敌人。我们英勇的战士坚决抵抗，望眼欲穿地盼望主力部队赶快前来。镇东的另一组听到里边打响，就赶快相互配合打击敌人。可是我主力部队是步兵，距厂汉营还有十多里。团首长知道战斗提前打响了，心急如焚，命令部队飞速前进，并要骑兵连迂回到镇北，防止敌人向北逃跑。大军猛扑敌人，敌人见我兵力众多，冲锋号响彻云天，仓皇逃跑。经我步骑围歼追击，大部分敌人被消灭，少数逃跑了，我军缴获了不少枪支、马匹。这次战斗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了我军的影响，威慑了敌人，但是我们也付出了代价。英雄的杨好好等30余名便衣队坚持到最后，有29名为国家、民族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大都是红军老战士，雁北、绥南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1939年2月初，部队奉命回到晋西北的岚县。这时阎锡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提出要在晋西北“困死八路军”、“饿垮八路军”的反动口号。他们在粮食上限制我们，给部队休整造成困难。4月下旬，六团又奉命北上，这是第三次北上。除三营抽2个连回到陕北神府县加强河防、保卫家乡外，其余主力又经神池、平鲁，到6月中旬挺进到右玉南山。地方党政领导报告，有岱岳日伪军百余人出发扫荡。团首长决定消灭这股敌人，立即布置战斗，先切断敌人退路，然后从正面攻击。战士们士气高涨，接连攻克2个山头，最后把敌人包围在王老沟山上。想不到敌人利用了国民党军队曾

修筑的工事顽抗，形成我军白天攻山头战斗达 8 小时之久，先后杀伤敌人 200 余人。团首长感到在日军固守的情况下持续攻击有困难，伤亡会更大；若再延长时间，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对我更加不利，因此决定天黑撤出战斗。这次战斗的缺点是没有完全掌握敌情，我们面对的并不是百余伪军，而是数百名精锐的日本鬼子。战斗打得很激烈，虽给敌人以大量杀伤，但我方亦付出代价。我二营营长白兴元同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转送回兴县后牺牲在医院。战士们称这次战斗为“血战王老沟”。这次战斗给国民党顽固派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谰言以当头一棒。

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是这个部队的特点。在王老沟战斗后不久，紧接着又进行了几次战斗，如夜袭辛店镇的战斗、一间房子战斗，特别是穿过平绥路，深入到丰东，夜袭巴音图、大庄科据点的战斗，消灭敌人 200 余人，缴获了不少物资，大大提高了部队士气。

1939 年冬，部队在连续作战之后转移到右玉东山稍事休息，日寇集结右玉、左云、凉城三路敌三千余人，企图合击我军。这一天我驻姚家窑子某营小分队，在拂晓与右玉前来之敌打响。主力部队迅速集合，发现凉城方面之敌已接近我方，我迅速抢占红山制高点，以火力压制敌人。团长孙超群同志看到机枪射手未打中敌集群目标，于是立即提醒他迅速对准集群敌人射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掩护部队冲出了敌人包围圈。敌人死伤数十人，三路围攻扑了空。

1939 年 12 月，警备六团参加了反顽固斗争的战斗，除三营教导员李子恩带领骑兵 2 个连配合地方部队包围消灭左云顽固势力之外，主力奉命转移河曲，配合新军打击了阎顽势力，为建设晋西北新政权创造了条件。

反顽斗争胜利之后，部队在河曲鹿固村进行整训。三营的 2 个连由陕西佳县回到鹿固，归还建制。

1940 年 8 月，配合百团大战，部队第四次北上雁北、绥南，并向大同丰凉地区挺进，寻找机会打击敌人。先是我骑兵营在清水河境内攻克杨家窑子敌据点，消灭伪军 20 余人。步兵在右玉黄土坡附近与右玉出发的一股日军展开激战，敌人撤退，我追击百余里，敌丢下数具尸体逃回城内。

1941 年秋，部队向清河县挺进，在黑石图与从和林辛店子出发之敌展开战斗，因气候恶劣，黄风蔽日，未能解决战斗。敌我双方都有伤亡，我

团参谋长秦实庵同志、特务连指导员张卓汉同志，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六团分散在各地小股活动的部队也在各处不断袭击敌人，使敌人惊恐万状，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动，对于我地方工作的开展极为有利。

从1942年以后，雁北、绥南形势恶化，部队主力分散活动，以后便转移到神、朔、偏、平一带活动，但仍派出副团长李发应同志带领骑兵营活动在雁北各县，不断打击敌人。

以上仅叙述了警备六团（九团）在雁北、绥南坚持抗日战争的简要行动和一些主要战例。足以说明，它在雁北抗战史上功绩卓著。

是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

警备六团和其他主力部队一样，除打仗之外，每到一处都派出工作组，向驻地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揭露敌人的残暴，扩大我军影响。部队活动的地区，团政治处民运工作人员先在这些地区开展工作。对新开辟地区，首先派出得力干部组织群众，建党建政，建立地方武装。所以说，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也是工作队。

1937年警备六团进至偏关、平鲁间活动，10月为了开展地方工作，曾派出政治处主任王恩惠同志到平鲁县参加牺盟平鲁县工作委员会、动委会工作，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使平鲁各方面工作顺利发展。10月间，部队一部分北上到右玉，又派出团政治处组织股长贾圣漠同志，组织右玉县动员委员会，配合牺盟会积极开展工作，使当时的右玉抗日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在同右玉城伪维持会斗争中，我团孙超群团长和贾圣漠同志与动委会主任傅生麟同志商定同伪维持会以谈判和武力相结合的方式予以解决，抓了伪县长侯宝山、公安局巡官傅锡林等人，收缴步枪200余支，还有不少马匹。并协助地方组成七支队，开始建立了地方武装。

1938年9月，部队第二次北上雁北，积极支持地方工作，并继续派出干部参加组织动委会的工作。同时，团部又派三营教导员李子恩同志带领2个连开辟大、丰、凉、左地区工作，清剿土匪，动员群众参军，使马头山到弥陀山的一大片地区变成了抗日游击区。1939年春，又组织了大、丰、

左、凉县政府。先是班玉钰为县长，后改由赵芝山同志为县长，我为第一科科长，下辖三个区，积极开展工作，并成立了县游击大队，调一营副教导员高学贵同志为大队长。1941年秋，绥南地委成立，丰凉区归绥南地委接管，大左地区分别划归大怀县和左云县，于是撤消大左、丰凉、左县政府。我和赵芝山、高学贵同志都回归部队。1941年冬，警备六团（这时已改称九团）步兵主力转移晋西北，由李发应副团长带领骑兵坚持雁北游击活动。当时日寇加紧蚕食，广修公路，增设据点，环境逐步恶化。为了稳定群众情绪，支持部队活动，团政治处又任命我为团长，组织武装工作团，坚持以弥陀山为中心的大左地区工作。后由于环境恶劣，叛徒活动猖狂，又加上我得重病转移，所以仅坚持了4个月便撤出。

1942年5月，独立二旅政治部又委托九团重新组织敌后工作团，以陈奋生同志为政委，班玉钰、赵芝山和我为正副团长。班玉钰带领一部分武装人员活动在和林辛店子一带；赵芝山常驻右玉东山沟，为后方联络点；我带领一部分武工队人员活动在左云北山，向大左平川开展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打击汉奸，争取群众，筹集物资，支援部队，坚持全面对敌斗争。我们在敌人据点林立之间，坚持斗争，工作环境极为艰苦。至1942年秋，工作结束，奉命撤回河曲。

以上情况说明，警备六团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2年，尽管环境恶劣，始终没有放松做地方工作，所以说它也是工作队。

具有老红军的优良作风

警备六团所以能长期坚持雁北地区的游击战争，根据我亲身的体会，是与这个部队的优良作风分不开的。

官兵一致，艰苦奋斗。警备六团原是陕北红军，其骨干成员都是陕北神木、府谷、佳县一带的人。陕北是个贫穷的地区，部队指战员吃苦耐劳，习以为常。从红军到八路军，官兵一致的生活作风是长期养成的。首长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给部队树立了榜样。有时地方慰劳一些日用品和香烟之类的东西，全部分给各单位，首长并不多留。部队的装备也很简单，由于战斗频繁，行军疲劳，指战员除携带武器弹药外，其

他东西都不愿多带。全团集中起来也不过仅有 1 个连的毯子。白天穿什么，晚上盖什么。特别是一间房子战斗，东西几乎丢光了，返回右玉西山休整时，过着铺地盖天的生活。吃的又是发霉的面，生活真艰苦啊！团首长对大家说，艰苦对人是个考验，谁如果吃不了这个苦，谁都会被淘汰。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指战员们讲怪话的很少。部队喜欢打仗，几天不打就觉得苦闷。打仗就要走路，走路也是为了打胜仗。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长途行军奔袭敌人，是这个团一贯的战斗作风。有连续几天、十几天、百里或近千里的走路，日夜兼程，通过封锁线，一夜就是一百多里。所以这个部队以能打能走著称。为什么能这样吃苦耐劳呢？一个是党的领导好，再一个就是部队指战员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吃点苦也不在乎。

首长带头，勇敢作战。部队的战斗作风好与不好，士气的高低，关键在于指战员的军事素养，作战是否勇敢，指挥艺术如何等。警备六团在抗战初期，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部队越打越强，这与她优良的战斗作风是分不开的。第一，这个部队的领导干部有一个特点，军事素养好，本身又英勇善战，团首长每战必亲临前线指挥。营连领导在战斗中能打敢打，以身作则，勇敢向前，因而就能够带出好的兵来。第二，这个部队的骨干力量都是陕北红军，作战最为勇敢顽强，所以新战士到部队后不久，几次战斗就带成能打能冲的战斗员。如第二次厂汉营战斗的便衣队那种坚决顽强、宁死不屈的精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军民一致，鱼水乡亲。从五路山到洪涛山，从马头山到弥陀山，从长城内外到平绥路两侧，都是警备六团活动的地区。部队是与这个地区的群众血肉相连，关系特别亲密。右玉东西两山沟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有时还可住上一两天、两三天才转移。这里群众觉悟高，我们打击了敌人，也保护了群众。群众把军队当作自家人一样，敌人一出动，群众就通风报信。战争初期，敌人只占交通线。随着战争的发展演变，敌人逐渐增设据点，扩大占领区，使我活动地区越来越小，斗争越来越频繁，环境越来越艰苦。敌人野蛮的“三光”政策，更激发了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对我军的热爱。东西山地区粮食很困难，但群众尽量让部队吃上饭。部队作战后伤病员都依靠群众养护。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是难以坚持斗争的。这种军民鱼水关系是人民战争的基础，是战胜敌人的法宝。只有在共产党

领导下的军队才能保持这种军民一致的密切关系。

摘自《神府红军团征战记》

祁连山下擒顽匪

白占彪

1949年9月，甘肃全境相继解放，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八师奉命进驻河西走廊武威地区，执行剿匪任务。我每当回忆起这一时期艰苦的战斗生活，便激动不已，难以成寐。

8月26日甘肃省会兰州解放，“青马”主力被歼，“宁马”龟缩银川，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率第九十一军、一二〇军残部溃逃河西走廊，妄图拖延时日，垂死挣扎。为歼灭该敌，解放河西和新疆，刚刚参加了兰州战役的我军指战员，硝烟犹在，征尘未拂，便踏着胜利的步伐，在一野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起，分两路钳形追击河西走廊之敌。

为了解放河西各族人民，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迎着困难奋勇前进。一路上斩关夺隘，连克永登、古浪、武威、山丹、民勤等地，于9月21日与第一兵团在张掖胜利会师，矛头直指酒泉之敌。24日，陶峙岳将军通电宣布酒泉守军起义。至此，河西追击作战结束。10月上旬，我第八师奉命回防武威，肃清残敌，建设政权，维护治安，恢复生产。

武威旧称凉州。当地居住着汉、回、藏、土、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物产丰富，素有“银武威”之称。然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的地痞流氓、土匪恶霸、特务间谍、帮会道首、民族败类，横行无忌，社会情况异常复杂。

解放初期，城乡中残存着许多散兵游勇。他们中间的少数顽固分子，乘我军立足未稳，新政权刚刚建立，地方武装无暇光顾之隙，搜罗旧部残兵游勇，聚而为患。最有名的是原国民党凉州地区专员冶子明、骑兵第五军营长马彦彪等为首的20多股、3000余众的土匪武装。

冶、马二匪，先在西营、桦尖、皇城一带，纠合500余人，组成“中国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自任正、副司令，先后在武威、天祝、古浪、民勤、永昌等地流窜。接着，武威张义堡白高股匪，民勤汉海子王麻子股匪，古浪惯匪马登高一伙，永登“花马营长”包海成股匪，景泰马海龙一伙，天祝赵孔堤、刘积玉股匪等等，与冶子明、马彦彪股匪互相呼应，蠢

蠢欲动。他们还勾结军统特务李信悟、白玉宽等，狂叫“先打区政府，后取凉州城”，阴谋组织武装暴动，赶走解放军，推翻新政权。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和猖狂活动，我第八师指战员义愤填膺，积极请战。师党委立即决定，以第二十四团所属之一营、二营，团炮连、通信连、警卫连、师直骑兵大队（由第二十二团副团长秦玉龙带领）、武威军分区独立营等单位，组成进剿部队，由第二十四团团团长张守鹏、政委贾一民统一指挥，坚决消灭活动于祁连山下的冶子明、马彦彪等股匪。

1950年6月24日，师司令部接到匪情报告：皇城滩区公所遭到土匪袭击。于是，我剿匪部队便从武威出发，轻装奔袭。但当部队到达皇城时，土匪已闻风逃窜，未发生战斗。当晚部队就在皇城附近的废墟上露宿，铺地盖天，和衣而眠。

第二天早上，部队又向帐房沟一带搜索前进。结果，空跑了大半天，仍未找到土匪行踪。这时部队已经十分疲劳，首长遂命各营、连派出警戒，就地休息吃饭。于是，大家喝着祁连山的雪水，就着唯一的小菜——辣子酱，啃着硬梆梆的干粮，一个个吃得有滋有味。

突然，我们的侦察警戒人员与土匪在附近遭遇，发生战斗，一时枪声大作，我方伤亡2人。

听到枪声后，大股土匪抢先爬上附近的潘家沟山。我军也很快调整部署，投入战斗。一营从山的南侧，我们二营（当时我任教导员）从山的北侧，分别向山顶守敌发起进攻。炮连在高地西侧占领阵地，掩护步兵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由于敌情不明，地形不熟，土匪在暗处又居高临下，我在明处由下向上仰攻，地形对我不利，终致我军进攻受阻，伤亡很大。战至午夜，我方被迫撤出战斗。

撤退时，部队需要涉水渡过青阳沟、帐房沟内的雪水河。这时，天公又不作美，突然下起大雨，顷刻山洪暴发，我军正在渡河的分队，有一部分人员和装备被汹涌冰冷的祁连山水冲走。撤出战斗后，部队控制各个山口，防止敌人跑掉。可是，当我们在大雨中熬过一夜，天明打扫战场时，敌人已不知去向。部队遂返回大坝堡休整。

这次帐房沟遭遇战，打得十分被动，部队损失很大。尤其是第二十四团二营四连、五连和警卫连，伤亡颇重，四连指导员杨清和、五连指导员

金铭都英勇牺牲，四连副连长王小山腰部负了伤，同志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三阳岔追剿初战失利，对部队的战斗情绪有一定的影响。上级决定，参加剿匪的部队在大坝堡休整，总结教训，准备再战。师党委派司令部董铁夫副参谋长来到参战部队，指导工作。董副参谋长到部队后，一方面帮助部队查找总结这次战斗失利的原因和教训，对团里的主要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另一方面传达了军首长关于剿匪方针政策的指示。记得军首长当时明确指出，剿匪作战，需坚持3条：一是军事打击，二是政治瓦解，三是发动群众。只有结合剿匪战斗实际，切实执行这3条方针政策，才能取得剿匪战斗的胜利。

其后，师、团党委和政治机关教育广大指战员，克服轻敌麻痹思想，树立长期清剿作战的思想；组织有关部门主动做好民族团结友好工作；派出工作组，采取各种形式，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把清剿歼匪与反霸肃特结合起来。我们还组成文艺演出队，以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教育群众，揭露土匪的罪行，瓦解匪众，孤立匪首，处理和管训散兵游勇，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杜绝匪患。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部队接受教育后，认识提高了，对剿匪的方针、政策、方法也比较明确了，我们就积极带领战士做好再战的行动准备。

8月，部队奉命第2次进山剿匪，武威军分区独立营和当地民兵配合部队行动。同时，野司还命令第一军派出部队从青海门源北上，作策应支援。进剿中，我们遵照上级指示，接受前次作战教训，先后在三阳岔一带打了几次小型追剿仗，都取得了胜利，俘匪80余人，毙伤若干，但仍然未找到土匪的主力。对俘获的土匪，我们进行教育后，都释放回家，要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可是他们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反而对群众施以报复，并继续上山为匪，致使群众不敢向我军报告土匪动向，追剿部队遇到了新的困难——缺乏情报来源。

特别可恨的是，一个曾在马步芳所属部队当过副官的家伙，伪装积极，骗取信任，表面上投降归顺我军，给剿匪部队带路，但暗地里却与土匪勾结，造成我军进剿屡次扑空，战果甚微，干部战士疲惫不堪。

发现这些情况后，第二十四团立即决定，对俘虏加强管训，一律暂不释放；同时进一步发动群众，打消群众顾虑。这样，我军又很快有了情报

来源，剿匪作战随之有了新的转机。针对土匪人地熟悉、分散活动的特点，我们改变单纯军事打击的办法，决定发动群众，擒贼先擒王，集中力量对付最顽固的匪首马彦彪。

马彦彪，绰号“清水营长”，原系国民党骑兵第五军的警卫营长，又是回族军阀马步青的干儿子。他担任“中国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的副司令员，又兼任第一大队的大队长，亲自带着一股顽匪，在西营、皇城一带活动，烧杀奸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

为了找到马彦彪的行踪，我们通过青海茂藏寺的一位管家，先找到武威县桦尖乡水磨沟村牧主苏虎牛义，请他设法寻找马彦彪，双方举行谈判，劝其投降，宽大处理。这个牧主很狡猾，他表面上答应照办，实际上并未主动去找马彦彪，怕“引火烧身”，于己不利。

事有凑巧，9月下旬的一天?群众发现一伙衣衫褴褛、满脸污垢的土匪由皇城滩向桦尖窜来，便跟踪侦察，原来这正是马彦彪及其十几名随员。这个称霸皇城、臭名昭著的顽匪首脑，自年初聚众叛乱以来，经我军多次打击，如今元气将尽，日暮途穷，但又不甘心失败，仍然寻机破坏。这天晚上，他们来到桦尖水磨沟，溜进苏虎牛义家的庄院。苏虎牛义把余匪安置在西屋休息，自己与马彦彪进正屋继续客套应酬。

这天晚上，苏家羊信看见作恶多端的“清水营长”一伙来到苏家，便下决心要探明情况，报告政府。于是，他借故给马添料，在窗下把苏、马两人的谈话听了个仔细。第2天，羊信早早地赶羊出圈。羊群拐进山湾后，他便打马向区政府方向跑去。半路上，恰巧碰到乡长朵轮豆嘎带着2名民兵骑马迎面而来。

原来，乡长听群众报告说，有十几名土匪到了苏虎牛义家，就来打听情况。于是，羊信把所闻向乡长作了详细汇报。朵轮豆嘎命令2名民兵马上回乡政府，集合全乡民兵堵住各沟口，自己遂策马向西营马沟湾驻军求援。约两小时后，乡长和第八师侦察科李参谋，带领1个排和50名民兵，封锁了各个沟口，将苏家庄院团团包围，他俩即带几名战士、民兵冲进庄院，直奔正堂。苏虎牛义慌忙出迎，还打着哈哈说：“乡长大军到此，有失远迎，请到里边坐，里边坐。”李参谋正言喝道：“苏虎!别装蒜了，快把马彦彪交出来。我军的宽大政策你是知道的。否则，后果自负。”

苏虎牛义慢条斯理地说：“哎呀！长官，这从何说起。我苏虎安分守己，拥护政府和解放军，哪敢收藏土匪。若大军要粮、要酥油，尽管说；要马、羊、牛，尽管赶。”

李参谋不想和他再费口舌，就命令战士、民兵搜查。可是没有找到土匪。李参谋对苏虎牛义说：“你别耍滑，我们早已盯上了马彦彪，昨夜他就住在这里过夜。你不交出马彦彪，会有什么后果，你考虑清楚！”乡长说：“谁念一本什么经，大家心里都明白，量他马彦彪也插翅难飞，到时候你可别后悔。”说完，他们就带领人马走了。

原来，苏虎牛义老奸巨猾，他怕马彦彪连累自己，为了安全起见，连夜把马彦彪一伙悄悄地转移到后山一个石洞里藏了起来，所以我们扑了个空。苏虎牛义心想：马彦彪大势已去，迟早会被捉住，何必为他引火烧身。遂决定亲自上山，和马彦彪密谈，叫其假降。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保住自己，又可保住马彦彪，两全其美。苏虎牛义上山见到马彦彪后，便说：“共军已将山沟堵死，庄院已被包围。”马彦彪听完，已知苏虎牛义用意，深知在劫难逃，不如先假投降，以保住性命，再卷土重来，便假意答应了苏虎牛义。

马彦彪打发苏虎牛义离去后，对匪徒们说：“我马彦彪去和共产党谈判，一时回不来，你们各自回家，后会有期。”土匪们依言而行，陆续散去。马彦彪遂下山谈判缴械事宜。

几天后，苏虎牛义托人带信，声称马彦彪接受大军提出的条件，要求解放军派出代表到水磨沟苏家谈判。接信后，第二十四团首长决定，派参谋薛清池带1个警卫班前往谈判，并在水磨沟山下部署一个骑兵连，在后山埋伏1个营的兵力担任警戒，以防不测。谈判中，我方提出，对方为表示投降的诚意，必须交出其全部武器和人员名单。而马彦彪则认为，只要交出其随员20余人的武器，就算投降。双方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

我方见对方没有诚意，遂令骑兵连上山，架起机枪，立即将马彦彪抓了起来，带回团部。随后，又将其全家也带到团部驻地。在皇城滩，我军对其宣传政策，劝其悔改。但马匪执迷不悟，不肯彻底投降。后经沙沟寺、永昌，把他押送到了武威，关进了县公安局监狱。

马匪被关押后，又经反复交代政策，晓以利害，他才答应交出部分枪

支，并带县公安局人员到皇城滩取枪。一共去了两次，第1次取回300多支尚未启封的驳壳枪，第2次又取回少量猎枪和弹药。以后无论怎样做工作，他都不肯交代。为试其诚意，我剿匪指挥部决定：将马彦彪假释，以观后效。释放后不久，马彦彪又联络散匪，重操旧业，很快被我发觉，再次捕获关押。

1951年冬，在“镇反”运动中马彦彪被枪决，苏虎牛义也因通匪伏法。当地人民对此拍手称快，就连马彦彪妻子李素贞，经人民政府教育，又听了群众的控诉，也表示感谢政府对她区别对待，她说：“马匪杀人、烧人、抢人，无恶不作。政府杀他是他罪有应得，也使我洗去耻辱，获得了新的生活。”

1950年10月，河西境内的申麻子（绰号）、马二不都及其他小股残匪共200多人，又聚集在冶子明的破旗之下，以皇城、大梁为中心，活动于青、甘边境之祁连山地区。

1950年12月，冶子明、马二不都股匪100余人，在我部队、民兵清剿下，窜往民勤腾格里沙漠地区。我剿匪部队日夜兼程，穷追冶匪。追至头道湖一带，冶、马残匪70余人又分为数股，绕道窜往天祝县境，企图从天祝逃往青海互助县。

我剿匪指挥部电令沿途民兵迅速阻击，断其退路。天祝县哈溪区龙潭乡政府接到命令，由乡长毛万时、书记李正庭亲率50余名民兵，乘马直奔土匪必经之路石门沟峡口，进行堵击。这天风雪交加，寒气袭人。民兵们星夜急驰50多公里，赶到了祁连山深处石门沟一个山梁上埋伏下来。民兵们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冰雪地里，整整潜伏了两天两夜，直到第3天下午，沟口忽然出现一群骑匪，向沟内拥来。“打！”毛乡长的喊声刚落，顿时枪声大作，手榴弹轰炸开来。冶、马二匪眼见身陷绝境，急令一匪营长带十几个土匪从正面向山梁猛冲，令另一匪营长带十多个土匪从山后迂回，再令另一匪营长手提大刀在后面督战，妄图死里逃生。经过激战，毙、伤土匪11名，活捉匪副团长1名，缴获马7匹和其他物资一部分。我方无一伤亡。余匪慌忙后退，争相逃命。冶、马二匪侥幸逃脱。

1951年春，冶子明、马二不都和齐广元等股匪辗转西窜青海，盘踞于俄博地区。经我驻青部队进剿，该股土匪80余人复又窜至皇城一棵树附近

活动。

4月的一天，天祝县情报站获悉：一股30余人的武装土匪从茂藏寺向大红沟、哈溪滩窜来。武威军分区独立第一连，在延喜乡民兵队长李长林带领的40余名民兵配合下，翻越两座大山，直插西顶天池，占领有利地形，设伏阻截土匪。不多时，土匪果然窜到沟底。土匪预感中了埋伏，畏缩不前。正在此时，我军民前后一齐开火，土匪伤亡惨重，弃马爬山逃命。我军民奋起追击。23岁的藏族民兵班长孔昭海一马当先，奋勇冲杀，不幸中弹牺牲。此次天池阻击战，共消灭土匪30名，其中孔昭海烈士一人就击毙土匪4名。他的英勇事迹极大地鼓舞着我军民继续追剿。民兵代隆的舅父文中科是个惯匪，窜到代隆家躲藏。代隆为了保护人民群众和为烈士报仇，大义灭亲，智擒文匪，受到表彰。

是年盛夏，我军在民勤县以北沙漠中追剿一股土匪，疲劳、干渴使部队行动遇到困难，而土匪能骑善射，多次逃脱。当地政府见此情景，立即动员民兵、群众支援部队骆驼500峰，还用一周时间教会部队指战员骑驼要领。50多位群众拉着骆驼，走在追剿部队的最前面，充当向导为部队带路。步兵变驼兵，沙漠追匪显威风。不长时间，就将流窜于这一地区的一股土匪全部消灭，但始终没抓到冶子明等匪首。

7月中旬，以马二不都为首的一股土匪窜到皇城西南一棵树附近地区。我剿匪部队立即出兵追剿。敌畏我聚歼，迅速窜至老虎沟、宁蟾沟、帐房沟、青阴沟、水磨沟和鸡大坂一带。我军出击围剿，该匪复又回青阳沟、一棵树、柏树沟活动，另一部分外窜，似乎仍有随时东窜皇城之可能。后知匪首冶子明也在这股土匪之中，遂决心全歼该匪。为了消灭这股顽匪，我第八师司令部于8月29日制订了作战部署：以7个连的兵力交由第二十四团副团长李江海指挥，采取驻剿与搜剿、步兵与骑兵、军事清剿与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法，削弱土匪的社会基础及活动条件；以步兵控制要点，骑兵施行穿插和反复搜剿，逼迫土匪进至我预定地区，以步、骑兵配合，反复清剿。同时要求军分区、各人武部、各情报站，派得力干部掌握民兵自卫队，积极活动，控制要点，堵击和进剿可能窜犯之匪，配合驻剿、搜剿部队作战。

10月13日，地方部队部署完毕，巩固了外线。搜剿部队于9月15日

到达指定位置，从内线防匪分散外窜。驻剿部队进点后，实行了包干制，主动搜剿捕捉散匪，并随时准备出击歼匪。第一军还以1个连进驻西岔沟，控制老虎沟通往青海及大梁之要隘，以配合第三军八师剿匪作战。

9月下旬的一天，第二十四团获悉：一棵树一带有土匪活动。搜剿部队立即开赴这一地区。现场勘察后，李副团长带一部由鸡冠山向南，薛清池参谋带一部向北，同时发起进攻；另一部则沿一棵树由东北向西南方向迂回，形成三面合围态势。战斗开始后，我部迅速出击，对敌实施压缩包围。但是，由于我军各部协同不好，一部未等他部到达进攻位置即对匪实施炮击，惊动了敌人，致使部分土匪跑掉。但这一仗，歼敌300余人，俘虏匪首冶子明，从而使土匪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此后，又经多次战斗，终将漏网之数百名土匪消灭。至当年11月底，战斗基本结束，形势趋于安定。

1951年6月，我第三军奉命整编，执行新的任务。这时，武威地区土匪寥寥无几，有的投降，有的弃枪回家，但仍有个别土匪为非作歹。直到1954年底，整个河西走廊地区的匪患，在我公安人员及民兵的努力打击下，终告彻底根除。

（1991年12月）

制服匪首“清水营长”

薛清池

1950年秋初，祁连山的土匪又活跃起来，闹得政府无法开展工作，广大牧民也提心吊胆不得安生。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在西北军区的统一部署下，师令二十四团（装甲第十一旅前身）二次进祁连山的皇城滩地区进行剿匪。

皇城滩各股匪徒的总头子人称“清水营长”，原名马彦彪。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如今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后，群众对我剿匪部队给予了极大支持，面对有利于我们的情况，剿匪指挥部及时把围剿土匪的目标集中到解决“清水营长”马彦彪的身上。

在我二十四团为主的皇城滩剿匪部队连续打击下，各股匪徒人马大减，供给欠缺；特别是寺庙和大牧主的牧场房宅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安全流窜之地了。于是决定先给他个投降收心的机会，通过牧主苏虎牛义对其进行劝说，晓以利害，促其投降。

做过一段工作之后，马彦彪觉得苏虎牛义所言有理。因为，他明白他组织的这个“反共救国军”、那个“反共救国纵队”其实都是空喊罢了，现在他到处流窜，防共都来不及，哪还有什么反共之力。他明白，各股土匪头目跟他，也只不过是野马随群而已，并非同心同德，帐房凹战斗分明显出，真有风吹草动，各股匪徒都会各自逃生。现在，仅仅两个来月，人员锐减，供给无着，今天碰上二十四团，明天又遭二十二团袭击，打来打去打得他那些“弟兄”战无斗志，行无方向，丢失的马匹又难补充……想到这些，马彦彪觉得现在剿匪指挥部既然给他留出这么条路，不妨就跟共产党的剿匪指挥部接触一下，看情况如何，要是真能缓一口气，躲过劫难，日后时局真有改变，不妨东山再起又有什么不可。于是他表示接受苏虎牛义的劝告，同意和共产党、解放军接触。接触的方式是由剿匪指挥部派代表来见他，地点就选定在苏虎牛义的帐房凹牧场。

我剿匪指挥部得到苏虎牛义的报告后，随即作了部署，准备派人去跟“清水营长”马彦彪（以下简称清水）会面。同时考虑到“清水营长”本

身现在还有 400 多人，加上申麻子、冶子明、马二不都各 200 人左右，总共约千余人，虽经几次战斗，有不少伤亡，估计马彦彪身边现在还有三四百人马，仍具有一定反抗能力，他必定会以此为资本来与我代表强行讨价还价，这是很有可能的。为此，我们必须做全面安排，保证谈判万无一失。团决定，由当时担任作战股长的我作为我剿匪指挥部的代表去跟“清水营长”谈判。

一切部署就绪之后，我带着警卫班和骑兵连，从皇城滩驻地出发，直接向帐房凹而来。行至帐房凹山下的昌河东岸，骑兵连便停步隐蔽，设伏待命；警卫班随我上山，来到苏虎牛义牧场的宅舍前。

清水马上亲自出门迎接，言语客气，表现得十分友好，将我们迎入西边的房子里。入室坐定后，他便叫副官们张罗饭食，宰羊羔、炸油饼，按当地习俗对我们一行进行了最高规格的招待。此时，我方人员，马上注意到清水在这里的副官和护兵大约 20 余人。

清水开始说话了：“马某不才，今天把贵军代表请来，共商皇城滩我部与贵军之间和解的事宜。。但我是行伍出身的一介武夫，难免出言粗鲁，还请老弟海涵。但愿贵军不计前嫌，开诚布公，只要贵军肯给鄙人以生存的一席之地，能容我弃暗投明，今后过普通百姓的生活，那么马某我甘愿洗手不干，还乡为民，听从政府的安排……”“你说的‘洗手不干，回乡为民’，那还要看你的行动。你部所有人员放下武器接受改编，那自然是可以的，但不知你是如何打算的？如果做不到上述要求，‘弃暗投明，回乡为民’将会成为想要而不可得的妄想。”我说道。“接受改编，放下武器是可以的，而且我已有准备，但我现在只能将随行人员的武器交给长官，别的我说了不算，他们各有首领，各自行事，我指挥不了，这可能根本办不到，还望贵军理解。我愿将随行人员的枪支弹药交给贵军，请贵军给我出具证明，把我的身份改变为‘良民’”。

我一听，这和剿匪指挥部的要求距离太大了，看来他是在讨价还价玩花招，于是严肃地指出“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的处置是有明确政策的。拒不投降，坚决消灭；主动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编入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战场上战败，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既往不咎，愿留者欢迎，愿走者发路费回家；对于战争罪犯，要缉拿归案，交由政府代表人民进行审

判，根据罪恶轻重分别处理，有的在监管期间表现好可以提前释放，有的死心塌地，罪大恶极，死不悔改，那就是死路一条。根据我党我军的政策希望你认清形势，做出选择，这个选择要快，解放军的忍耐是有限的！”我跟清水说道。听了我的话，马上引起清水和在场护兵和副官们的紧张，他们瞪大眼睛，似有动武的迹象。我警卫战士见此情景毫不示弱，有的手枪出鞘，有的持枪准备射击，霎时间室内空气极为紧张。清水先是沉默，随后令随行人员不要轻举妄动，撤出室外。我却对这种举动没当回事，对着清水开玩笑地说：“怎么样，就你这几个人还想动手吗？我看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还有进一步商量的余地，我们可继续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就你说的，只能交出你随从的武器，就想要一纸证明，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清水听了我这“开导式的严肃警告”，先是把刚才剑拔弩张的随从人员臭骂一顿，然后自我检讨地说：“我们这些人本性难移，动不动就要野蛮，今天对贵代表失礼，还请你原谅！”我接着说：“你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现在海南岛都解放了，你想马步芳还会回来救你吗？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呀，反攻大陆呀，都是骗人的鬼话。现在全国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难道你不愿意看到我们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吗？难道你还要听蒋介石、特务头子们的谎言，继续与人民为敌，为蒋家王朝效忠卖命吗？我劝你还是赶快觉醒，按剿匪指挥部要求弃暗投明吧！要知道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了机会，最后结局我想你也会想到的。如何选择，还请你尽快有个明确的态度！”

然而，本性难移。清水听了我一席话后还想用缓兵之计，暂避厄运，等待以后东山再起。他还是坚持：别的管不了，只交出随从的枪。清水在当马家军营长时，常来皇城滩督导，他沿途欺男霸女，罪大恶极，按上级意图和人民的反映，是可以随时随地就地正法的，就这样放了他，这等于放虎归山，如何向上级交代呢？同时，吃饭谈判扯皮，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再不能和他们磨嘴皮子了，还是将他带回皇城滩剿匪指挥部，再做打算吧。想到这儿，我马上命令警卫，请吴二旦连长带骑兵连上来，用强制手段，将他们带回指挥部再说。不一会儿，骑兵连上来了，一个连散在帐房凹，把苏虎牛义家围得水泄不通。吴二旦连长八尺大汉，面部黝黑，手持二十

响快慢机的德国造驳壳枪，来到门口，向我请示如何行动！我令他们全连原地待命。同时，命“清水营长”立即准备出发，随我们到剿匪指挥部说话。清水自知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只好让他的随从向解放军交枪，然后随他到皇城滩指挥部去再说。在交枪的时候，我还让清水将自己的手枪带好。对此，他感激，又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想着见到剿匪指挥部的首长，或许还能有个如愿的结果。因此，他乖乖地骑上马，跟着警卫班出发了。

当天夜间，部队回到皇城滩剿匪指挥部，向首长汇报了情况。首长立即和清水见了面，交代他先安心休息，有事明天再说。这次抓获清水以下8人，获得战马12匹，缴获长、短枪12支。这些马匹除坐骑之外有的是驮清水的东西的。

当天晚上，清水突然要找我谈事。我到后，他双手端着一支用布包好的左轮手枪，要交给我。他低着头，用深沉的语气，说了下面一段话：“对不起贵军，我太多虑了，今天清查我的随带物品，解放军秋毫无犯原封不动地交给我老婆保管使用，充分说明贵军纪律严明，深明大义。别的我不想了，今后我一定按解放军的要求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争取宽大处理。”

摘自《神府红军团征战记》

父亲的黄土情结

王延生

父亲走了整一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甚至在梦中，他仍是那样神采奕奕、目光炯炯。

我的父亲王兆相是陕西神木人，是从陕北高原那苍凉贫瘠的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开国将军。

父亲出生在陕北神木南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王家后圪，一个地地道道黄土高坡上刨食的农民家中。他从小随父下地干活，十几岁就开始独自放羊。1926年跟随其兄共产党员王兆卿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在府谷盘塘镇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红军，1933年在神府参与领导、创建第一支神府红军特务队，开展武装斗争，参与领导、创建了神府佳榆革命根据地，1940年奉命离开延安到抗日最前线的山东战场。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一直率部驰骋在血与火的各个战场。但不管到什么地方，他始终不忘自己故乡，永远挚爱着生他、养他、培养造就了他不畏艰险、坚忍不拔性格的这块黄土地，永远怀念在这块黄土地上生活的父老乡亲和与他曾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

我父亲常给我们讲：“人要懂得感恩。”三十年代神府红军和神府佳榆苏区在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特派员领导下，遭到重大损失，但神府佳榆的党组织和红军克服困难，在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坚持斗争，逐步恢复并发展壮大红军和根据地。父亲对我们讲，那时国民党军疯狂“围剿”红军、追捕共产党员，神府佳榆人民为掩护红军和党员，许多乡亲被敌人枪杀、刀劈、挖心、剖腹、铡刀铡。为掩护红军，菜园沟的群众一天之内被敌人用铡刀铡了十八个，就连十四五岁的小孩他们也不放过，残忍至极。即便这样，革命群众始终没吐露一点消息给敌人，他们还经常躲开敌人把食物送到红军经过的山上供他们充饥。父亲几次躲过敌人的追捕，都是神木南乡群众及时通风报信，掩护脱险的。父亲说：“红军刚开辟时如果没有家乡人民舍生忘死的支持和掩护，红军和根据地也发展壮大不起来，我王兆相也早就不存在了。”

全国解放后，父亲时刻都惦记着老区的发展，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惦记着红军时代与他并肩战斗已牺牲的和仍健在留在当地的战友们。从六十年代开始他曾数次回到陕甘、延安和神府地区。每次回去都要到家乡各地去看望乡亲，看望战友，到他曾战斗过的地方去凭吊牺牲在那里的烈士。在神木太和寨的山头上，他对陪同人员说：“1935年10月15日，在这里我们红三团与敌人遭遇，当时就牺牲了张德超、高玉才、贾怀耀、王玺四个红军干部，敌人把他们遗体拉走，头割下来挂在了神木城头。”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在地上捡了几块石头堆起来说：“如有可能，将来应该在这里给四位烈士立个碑，让后人不要忘了他们。”

父亲还给我讲，1960年初他离乡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到王家后圪，住在自己家的老窑洞中，每天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有的甚至从几十里外，翻山越沟来与他见面。有次他晚上睡觉时总觉得窑洞外似乎有人，第二天他开门看见老红军王六八、王留星两位蹲在门口抽烟，他问他们晚上怎么不睡觉？他们说怕有坏人对他不利，所以他们几个仍留在家乡的老红军商量要保护他的安全，轮流给他守夜。他听后感动极了，拉住他们的手，劝他们别再这样了，快去休息。父亲给我讲到这里时，眼眶里已充满了泪水。

父亲还给我讲过一件事，就是1983年他回去时真想在王家后圪自己家的窑洞再住一个晚上，但随行的徐秘书、我的小姨夫贺长光等人考虑他的身体情况和当地的条件，坚决不同意他住，硬把他拽走。为此他对我小姨夫贺长光（榆林副专员，老红军）发了火，他说：“什么条件不好，乡亲们世世代代就住在这里，我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过去你们这些干部下乡都要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现在回我自己的家就条件不好啦！”他给我说此事的时候，还满脸委屈。又自言自语地说：“真想在自己家再住上一晚啊”，此时他眼眶里的泪水都快涌出来了。我劝他说：“爸爸，你年龄大了，小姨夫和徐秘书是为你好。”他瞪着我说：“那是忘本。”不过他也承认他们是为了他的健康。

最后一次回家乡是在1997年9月，他近89岁高龄时，我和小弟王东民、王晓建秘书、凌医生等五人陪同他一块儿回去。从包头到神木，榆林专区又派了我的小姨夫贺长光和乔副秘书长带了一个面包车来接我们。路上我们几个都很疲倦，不由得都在打盹。而我的父亲却一直精神抖擞，看

着在车窗前掠过的内蒙古和神木的一个个景致，不住的念叨着：“好！变了！这里我来过、红军也曾来过这里。”在神木、榆林、府谷与老干部们的座谈会、欢迎会上，他一再感叹的说：“改革开放这些年陕北变化太大了，真是大发展、大变化、大进步啊！”他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想了解，都想看，在府谷甚至到居民家里去了解乡亲们的生活，在神木大保当街上与路上的群众聊天。他为家乡的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欢欣鼓舞。在神木与老干部聚会时，他紧紧握住两个专门从内蒙古赶回来看他的红军老战友的手，深情地说：“看到家乡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我们这些为此奋斗了一生的人，应由衷地高兴啊！”

父亲对老区的深厚感情是无以言表的。记得作为全国五、六届的政协委员，他在会上就曾多次呼吁，要加强对革命老区的建设投入，要切实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他常讲：“老区大多是没有物产的贫困山区，那里的人民在我党我军最艰苦的时候，以大无畏的流血牺牲精神支持了革命，赢得了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绝不能忘本啊！”

2005年父亲因高血压造成脑梗住进了医院，就是在医院中他依然忘不了家乡，忘不了家乡的黄土高坡和窑洞。2006年父亲由于肺部感染不得不插上呼吸管，不能说话了，那时他心情烦躁，发火，不配合治疗，我就把在神木街上买的最原始的信天游歌曲一遍一遍给他放，把他喜爱的晋剧“打金枝”、“蝴蝶杯”等放给他听。他只要听到这些他熟悉的曲调，就静下心来，脸上还不时露出一丝丝笑意。有一次李正亭、李智盛二位叔叔在神木办事处主任刘生亮陪同下到医院来探望父亲。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我在他耳边说：“李正亭、李智盛二位叔叔来看你了。”他并没有什么反应。我又说：“还有神木驻京办的刘主任也来看你。”他一听神木来人，马上全身动起来，眯缝着眼睛，微微抬起头来，手动了动，刘生亮见状赶忙走过去问候，李正亭、李智盛二位叔叔笑着说：“好啊！刘生亮的面子比我俩大多了。”其实，父亲只要听到神木来人就会有所触动。陕北、神木、府谷、榆林，家乡的父老乡亲在他老人家的心目中永远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常给我讲，“不要忘了你的祖辈就是在贫穷的黄土高原上生活的农民，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2009年6月3日，我亲爱的父亲在他101岁高龄时，静悄悄地走完了

他崎岖艰难的战斗一生。

现在家乡变化大了，神木这个过去的贫困县已成为全国百强县，从去年开始，当地居民上学、医疗全部免费，这在全国尚属首例。父亲如果在天有灵，知道此事，一定会为家乡的发展进步、为老区人民而高兴的。

2010年5月为纪念父亲写于北京

将军党龄八十一年

王晓建

王兆相，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岁入党，101岁逝世，党龄总共81年。这位老将军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同志，别忘了自己是共产党员。”

王兆相是陕西省最北端的神木县人，1926年即在哥哥、共产党员王兆卿带领下参加了革命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王兆相却毫不畏惧，于1928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兆相入党后，在榆林中学参加过学生运动，以小学教员身份从事过地下工作，1932年加入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当过红二十六军的警卫队长。1933年，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的王兆卿府谷、佳县、榆林的红色武装。王兆相毫不犹豫地说：“我哥哥牺牲了，我一定要接着干革命，党组织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王兆相担任了陕北红军第三支队的支队长，陕北红军第三团团长，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在党组织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他创建的红色武装经过艰苦奋斗，由7个人发展到2000多人，还开辟了一块横跨4个县的神府佳榆革命根据地。

1935年，在“左”倾错误指导下的“肃反”中，王兆相一度被撤职，他的父亲王万德，一位积极支持革命的老人也被杀害。王兆相对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他坚信党组织会把自己和父亲的问题搞清楚。后来，王兆相重任红军团长，又升任师长，从未对打击过自己的人实行报复。1945年、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两次为王兆相的父亲王万德平反，肯定他是一位“对革命有贡献的军烈属”。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围剿”神府佳榆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与王兆相率领的红军独立师停战。国民党中央军、山西军阀阎锡山、陕北军阀高双成都派代表来到红军独立师，想以高官厚禄把王兆相和他的部队拉过去。王兆相与师政委张秀山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这支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只听毛主席、朱总司令调遣，我们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收编！”

抗日战争中，王兆相历任八路军警备第六团团团长、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副司令员、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党组织一声令下，无论是从陕北到晋西北，还是到鲁中、鲁北，他都是毫不迟延、立即行动。他的两个女儿鲁华与沂华，由于战事频繁寄养在老乡家，都因调动工作时未来得及接回而失散，解放后几次派人去找也没有找到。

解放战争时期，王兆相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率领由3个团组成的一个旅进军东北，先后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一六二师师长。东北全境解放后，他入山海关率部南下打到湖南，改任衡阳军分区司令员。有熟悉的同志为他打抱不平：红军时期就已当师长，十几年后还是师长，不公平吧？王兆相却不以为然地说：个人职务进退，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

建国后，王兆相自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担任了十几年的“教官”，从后勤学院组织指挥系主任到工程兵学院院长，在党组织安排的岗位上，他尽职尽责地工作着。他说：“我愿意在院校工作，和平年代不打仗了，作为一名老军人，该怎样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军队尽力呢？我觉得，通过源源不断地为国防事业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正是继续作贡献的一个好途径。”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勋章时，王兆相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军分区司令员，按规定应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可是因为有关部门的疏失，他却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起初他有些不快，但想到牺牲了的老首长刘志丹、谢子长、朱瑞，老战友杨琪、李成兰、刘鸿飞，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勋章呢？王兆相坦然接受了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王兆相当时的秘书向造反派揭发了他，使他遭到了更加严重的迫害。“官复原职”后，王兆相却不准安排那位秘书转业，仍把他调回身边工作。他解释说：“秘书的确做了错事，可我没把他带好，也有责任，我要留下他，帮助他认识、改正错误。改正了错误，就是好同志嘛。”

王兆相1978年复出，担任军委工程兵顾问，1988年离休。年过九旬以后，王兆相仍坚持读书看报，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每逢从文件中、报纸

上看到腐败的人和事，他就会气愤地说：“这些人还是共产党员吗？我看他们一点共产党的气味也没有！”他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发言说：应该从制度上杜绝腐败。

晚年的王兆相，仍保持着廉洁奉公的作风。部队工资制度改革后，他的月工资增加到1万多元。他问秘书是不是财务部门把钱发错了？如果发多了，就赶紧退回去。一次他在练字时不慎弄坏了毛笔，秘书从办公室找了几支毛笔给他送过去，他却不肯收下，认真地说：“办公室的笔是机关办公用的，我个人怎么能要？你还是帮我买笔吧。”

对人民群众的安危疾苦，王兆相时刻记挂在心。任全国政协委员时，他提交过加速发展“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和教育、卫生事业的提案；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他捐出了7000多元。

整整81年，王兆相老将军牢记着自己入党时的誓言，直到2009年病逝。他被公认为真正的、永不变色的共产党员。

（载2011年第9期《是与非》杂志）

情系红军团 永铸国防魂

周义仁

在喜迎党的十八大即将胜利召开的时候，我关上门对着镜子照照，沉思白问说：“看看自己是个老党员，此刻有什么亮点可感恩于党？”回答且是中规中矩，平平凡凡，与模范共产党员相比，差距还不小。但有一点，至今且感到十分自豪。那就是……

我的一生，有六十年都与红军团结下了不解的军缘。真可谓是，军旅人生铸军魂。我爱绿色军装，也爱绿色军营，可更爱红军团战友。在这个绿色军营的战斗集体里，我受到了教育，得到了培养，经受了锻炼，成长为师级干部。我把红军团当作是教育我的家，把战友胜似亲人看待。深感红军团的光环，普照着我的一生，有一种焕发出经久不息的光荣自豪感。

我所在的红军团，前身是成立于1934年的陕北红军独立第3团。去年12月，已升格为装甲旅。其“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魂，一直成为我“三进三出”该团，先后12年战斗、工作、生活的精神源动力，并激励影响了我40年军旅生涯的成长。之后，我进入湖滨军休所退休的22年里，又不间断地继续保持与红军团联系交往，把关心国防建设爱护红军团成长，当作夕阳红、老有所为的侧重点，作为发挥余热、促进军民共建的事来做。

1990年退休到地方后，我与红军团一直有挥不去割不断的情怀，心里总是惦记着红军团的成长和发展。为了沟通新老战友的战斗情谊，关心爱护红军团的成长历程，我用了五年的时间，节约抽出零花钱，克服信息闭塞的困难，想方设法到处打听，通过写信、电话、走访、约会等不同形式联络了武汉及其孝感、鄂州、黄陂、汉川、黄石、随州、襄樊、大悟、应山、信阳、驻马店等周边地区，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战友170余人，积极召集开展了不定期的战友联谊活动，并于1994年在武汉组织了红军团成立60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诚邀了红军团整编为坦克团的第一任团长——老红军战士陈万举亲临会场作报告，使我们曾经在那里战斗、工作、生活过的新老战友，有了相识、凝聚、集结的平台。大家畅谈了不同时期发扬革命

传统、开创建军新局面的喜讯和风范，珍惜以往岁月，依恋战友情谊，来共同献出一份爱，把爱的纽带永远系在红军团的怀抱中，至今还难以忘怀。在活动中的全体战友合影照，还被红军团选中，作为团史“铁甲雄风”画册的封面照片。

到2000年红军团移驻孝昌县后，我在每年春节前后，都组织战友代表去走访慰问红军团，送去真挚的战友情谊，看部队的英姿风貌，带回部队建功立业的喜讯，以鼓励战友在地方搞好各行各业的工作。部队也委派领导，带着慰问品，多次来武汉看望转业的战友，送来了关怀和真情，促进了战友情谊，与军民共建的互动。部队还三次邀请我到营区，给全团年度训练开训作动员讲话，受到部队广泛好评。2004年9月陕北榆林市委、政府还邀请我出席陕北红军独立第三团成立7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现场亲眼目睹了纪念活动的盛况，和劳动人民热爱军队、亲如一家的热情，深受教育和启迪。2007年3月，部队又邀请我作“新时期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发言，与全团官兵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得到了济南军区《前卫报》记者的采访报道。

2007年5月，乘红军团新团史馆落成典礼之际，我又将心爱保存六十年见证红军团成长发展的史料、实物及个人获得的证件、奖品、教案、教材及朝鲜赠送的慰问品，共计近百件实物，无偿的赠送交给红军团有关部门，作为团史馆存列的物品，推动了每年组织新兵传统教育形象教学的效果。

2008年3月下旬，我一个多年期待的愿望实现了。带着子女孙辈5人，实地到访红军团，使全家三代人，通过介绍团史、参观营区、观摩装备、实弹射击、乒乓球比赛等活动，领略了红军团的风采，实地分享了红军团的荣誉，从感性实际交流中得到了教育意义，使子女后代深感军缘在和谐中延续，实际增强了全民的国防意识，同时又构筑了一道亮丽的军地双拥活动的风景线。儿女说：“我们从小在军营里长大，时隔25年，又到访红军团，看到的变化真是太大了。整齐划一的营区，宽敞平坦的道路，绿色环抱的行树，着装良好的军容，威武活泼的士兵，丰功伟绩的军史，都见证了今非昔比的变化。真是教育的好课堂。今天，过得特别有意义。”一天的实访，使我们一家对红军团产生深深的敬意和浓浓的情怀。

2011年年底，根据中央军委、总部的命令，红军团升格为装甲旅。该团党委决定，邀请历届担任过团领导正职的老战友回团看望，进一步参观装步三连、团史馆和营区面貌，与团常委合影留念，赠送纪念品，使我感到再一次回到“娘家”，终生难忘。

退休之后，情系红军团，永铸国防魂，成为我有生之年老有所为的重重一笔。我一定永远珍惜，将这笔来之不易的精神财富交给子孙后代传承下去。热爱红军团，热爱人民子弟兵！

吴家湾湖滨军休所

2012年4月10日

从神话中走出来的神府“红三团”

——为纪念“神府红军”成立80周年而作

杨文岩

今年是神府红军成立80周年。今天的神府两县政强民富已经出现在眼前。以今比昔，往事流传，这里再来提叙，让今天的人多了解一下过去，更好地来了解今天。

一、神话红军的由来

1956年，我被分配到彩林小学任教，一百多里路，从神木县城沿着窟野河南行，要过18次大河。今天顺神盘公路，两小时就可到达的地方，那时候步行两天才走到这个黄河边上的小村庄。这里是神府革命老区，也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河防要地。

前来接待我的是两位老人，一个是牺牲在抗日前线的红军干部贺伟烈士的父亲，一个是被当地誉为“老秀才”的贺立本老先生。他们说：“不要看我们村地方小，可这里是‘藏龙卧虎’之地。”我初来乍到，眼前是3孔窑洞，据说有学生四、五十人，只有我一个教师。所以，我以为他们这样说是为安慰我。于是就回答他们：“不要紧，这比起当年红军闹革命的条件大概要好多了吧？”二老一听，哈哈大笑，当面夸我“有志气，像个年轻人”。接着“秀才”老先生就给我解释说：“我们这里在抗战年代曾经是八路军一二〇师的后勤部驻地，贺龙师长多次来过。这里也曾经是神府红军活动的主要区域，红三团的首任团长王兆相，人称‘黑狸虎’。所以，我们说的‘藏龙卧虎’，龙指贺龙，虎指王兆相，这个比方，不算凭空假说吧？”

说到“黑狸虎”的来历，这位“老秀才”更有一番高论，他言道：“天地三界人、神、鬼。玉皇大帝是神，在天上。在神话中他是咱们中国的上帝。”

据说玉帝身边有一支神仙武装。“黑狸虎”就是这支神兵的头。他们

是专为凡（人）间除恶、降妖、捉鬼怪、保平安的。凡间民众便称之为“天兵天将”。因此，神府区的老百姓认为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打土豪劣绅，惩赃官流氓，为民除害，他们就是“天兵天将”下凡。红军团长王兆相就是玉皇大帝派下来的“黑狸虎”神将。

听他们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这是当时当地在共产党领导下南乡“闹红”的穷苦百姓对子弟兵的赞誉。可是从这话中，引起我另一方面的不解是，我听说国民党那边也说“王兆相是黑狸虎”，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二位老前辈便把他们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陆陆续续告诉了我。

原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北方局就在陕北以绥德为中心，开始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经过李子洲、魏野畴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绥德四师、榆林中学便成了党培养人才的基地，陕北很快就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就神木县来说，像县城里的汪铭、王瀛、张友清、贾拓夫；南乡的王兆卿、贾怀智、贾怀光、王兆相、杨文谟、张秀山、武开章、王恩惠、毛风翔等都是在那个时期投身革命的，即因此而才有神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叛变，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四·一二大屠杀”。因此，在陕北，谢子长、刘志丹于10月间，便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打响了在中国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中共陕北特委成立，从此各县农民“闹红”如火如荼，迅猛发展，“闹红”的各县红军游击队相继产生。

1933年10月18日，神府红军游击队在神木县南乡尚家崾成立。开始才七个人，仅一个多月便很快发展为“三支队”。1934年9月18日，经陕北特委批准，神府红军三支队，被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后来府谷县韩峰带领的七支队也编入红三团。从此，“红三团”就成了神府红军的综合名称。

神府革命根据地的出现，神府红军的问世，震动了国民党坐镇榆林的头目井岳秀，接二连三地对神府红三团进行“围剿”。但是，由于红军受老百姓保护，所以接连打胜仗。红三团在国民党“围剿”和红军反“围剿”的战斗中不断壮大。

1935年4月27日，红军在群众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斗速度在毛家峁“吃掉了”前来“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队伍整整一个骑兵连。四五

十个敌人作了俘虏。类此，国民党来“围剿”红军的部队一次次损兵失将。他们除了对群众狠命地进行报复性的残杀之外，对红军的领导人更是恨之入骨，高额悬赏，要红军领导人的头。由于群众的掩护，王兆相虽多次遇险，总逢凶化吉，虽然临危，最终还是脱离险境。所以群众便认定红军是“天府的神兵”，王兆相是“天上的星宿黑狸虎临凡”。

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夏之交，驻守太和寨的国民党军队杨相枝营，无意中得到一封红三团写给一个地下党员的信。这信误入叛徒之手转到了杨相枝手中。杨相枝如获至宝，喜出望外。他将计就计，设了个搞“兵变”的假圈套，给红三团写了封信，约定了要王兆相前来接应的时间，并得意忘形地向他的上司罗德兴团长打了包票，说他在一个月之内，一定要活捉王兆相，消灭红三团。罗德兴也向榆林的井岳秀夸下了海口，立了军令状，说他一定要在近期捉到神府红军头子王兆相，夺取井大人 5000 块大洋的悬赏。可是结果，王兆相虽然按约定如期来到太和寨的山梁上，在中秋的明月下，和假来“投奔红军”的杨相枝的一个排长握住了手。王兆相凭战斗经验，立刻发现情况不对。于是他当即甩开面前这个冒牌地下党员的手，采取断然措施，先发制人，给敌人以猛烈的回击，打乱了敌人精心的布阵，转危为安，再一次脱离险境。这事过后，杨相枝痛斥他那个排长，问他为什么已经抓住红军头子的手，还让跑掉？就是这个国民党的排长，跪在地上，绝望地对杨相枝说：“我以往只听到别人说红军是天兵，红军头子王兆相是天将黑狸虎，自己还不太相信。可这一次被我亲手抓住了王兆相的手。可是我刚一举枪，眼前便一闪出现了一团黑影，只见一条老虎腾空而起，霎时再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全都用上了，可就是打不着人家……”杨相枝听了气急败坏地骂这个笨蛋排长“放屁”，说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会变成老虎？可是，当他的上司罗德兴团长追问他打下的包票“活捉到王兆相”时，他又实在没个好说法，也只好把这个排长的话原样上呈。罗德兴同样把杨相枝大骂一顿之后，无可奈何地在他给立下军令状的榆林井岳秀面前，也就是用这话进行报告。井岳秀愤怒之下，不久便撤销了罗德兴的团长，并由刘润民接替了他在神府地区“剿共指挥官”的职务。可是这“红军是天兵天将，红军的头子是黑狸虎下凡”的神话，却成了一条谁都想听的“绝密”新闻，在国民党那边，并不公开而实际公开地

一传十、十传百，致使他们党政军的上层“谈虎色变”，迅速地传到了民间的千家万户，作奇闻美谈。

历史就是这样地让神府红军在神话中起家。正是这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引发了当时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闹红”劲头，鼓舞了那个时代人们抗暴的斗志，从而凝聚了共产党、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党通过群众的艰苦奋斗，创建起神府革命根据地，党通过人民群众的绝对支持组建起了神府红军。我有幸初出社会就来到当年神府革命的中心区，又首先接触到亲身经过那个时代的两位老人。正是他们把神府革命的许多故事和实情传递给我，让我这一生与神府革命的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神府红军最艰难的时期

本来在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和掩护下，神府红军不断打胜仗，部队继续壮大，根据地一直在扩展。至1934年春夏之交神府革命根据地北边已经发展到府谷县的庙沟门和黄甫一带，南边直抵佳县的高起家堀和朱官寨，东边跨过黄河还有山西那面的3个区，西边可以活动到榆林的建安堡以西。这块红色区已经发展到共23个区，14万人口。而且，党的组织已经深入到临近的白区。可就在如此大好形势之下，由于党中央出现了王明错误路线，陕北地区同样未免其难。当时上边给神府调来个“特派员”独断专横，使好多同志和群众死于不明之冤，致使神府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应对失策，接连受挫。新寨子一战，本不该打，结果打了，红军和赤卫队牺牲了百余人。红三团的参谋长刘鸿飞同志阵亡，红军损失十分惨重。最后，甚至团长王兆相也被迫离开部队。如此种种，诸多事实都是敌人想干而干不到的事。所以，不到一年，根据地迅速缩小。敌人乘机四面来攻，根据地面临危境之时，这个“特派员”才觉不妙，自言他的“货卖完了”，便鞋底抹油，逃命而去。从两位老人对那个“特派员”所作所为的评述中，我看到他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特派员”是代表共产党的。所以，二老一直不肯把那个特派员的名字告诉我。可我已经明白，王明的错误路线，也给神府革命带来过灾难。之后在好长一段时间内，根据地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神府红军处在了最艰难的岁月中。

然而，尽管如此，神府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仍在人民群众保护下，艰难地坚持着。在此期间，有一位跟随红军烧火做饭的农民刘宗荣，他既不是红军，也不是共产党员，可当敌人逼问他，要他说出红军是谁时，他大喊一声说，“老子就是红军，老子就是共产党员，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直到慷慨就义，连一个人也没说出来。共产党员刘如邦被敌人搜捕到，敌人费尽心机软硬皆施，对他劝降引诱，以死威胁，都没管用，气得敌人怒吼起来问他“你现在还有什么没做够？”他立即回答说“红军没当够，共产党没做够！”第二天就义时，敌人要他跪下，他却愤怒地说：“老子不兴跪！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临终，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根据地的妇女干部黄云爱遇到了敌人骑兵追赶群众，为了掩护群众逃离，她与自己的两个弟媳，故意暴露了自己，引开了敌人，让一大批群众顺利脱险。当敌人把她三妯娌追上山头，步步逼近的时候，她们视死如归，断然一齐跳下悬崖壮烈牺牲。因此，这个悬崖被群众称为“红军崖”。红军一支小分队在天台山，敌人一个连来追。三个农民守住山门，硬是用石块砸向敌人，坚持一个多小时，两人牺牲。当敌人攻上山头时，红军小分队早已安全撤离。诸如此类的事，在两位老人的口中，随便可言。显然，老区人民的内心天地，就是储存红军往事的宝库。在他们的心中为每一位革命先辈立着一块“无字碑”。一提起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秋红军的艰难岁月，他们就会有讲不完的故事。他们说：“那个特派员走后，神府的同志经受了更大的艰难，可他们终于还是坚持下来了。”

1935年的9月12日神府工委在王寿梁恢复，书记张晨钟，委员有贾怀光、乔钟灵、毛风翔、刘长亮等同志。红三团也把兵力集合起来，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下属3个连，一百二三十人，百十条枪。也就是在这一年党中央来到陕北，在中央的关怀下，神府区的同志接到了刘志丹以西北军委的名义给神府区同志的来信^①。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一年之久的联系，神府的同志如失去母亲的孩子又听到了娘的呼唤声。他们含着眼泪，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大家听了一次又一次还想听。从此，神府区又开始振奋起来。

党中央一到陕北，就对神府革命根据地特别重视。毛主席说：“神府区虽不大，但这个区很重要。”^②周恩来副主席也说：“神府地区，不论在

政治上军事上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打国民党它是前方，我们打日本它是后方”^③。于是，不久就把杨和亭、张江全、张汉武等同志派来神府加强了根据地的组织和领导，并按中央决定，神府工委改为神府特委。特区党政军机构都经整顿，迅速健全。神府红军因此而很快恢复了“元气”。红三团随即出击，先后在申家塬、乔岔滩接连打垮了前来“围剿”的国民党部队，俘敌好几十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马，然后转移到温家川去休整。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见到王兆相将军时，曾采访这事，老将军感慨地对我说：“是啊，中央红军来到陕北，神府红军的腰杆就硬起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我们连打胜仗之后轻松地度过了1936年的春节”^④。

过罢年二月初，中央又派张秀山、刘明山等同志来到神府，并传达了中央文件。听了张秀山同志传达文件后，神府特区的同志心情更加激动。“这可是党中央的声音啊！”王兆相将军回忆说，当时大家一致表示：“毛主席要我们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接着神府区的喜事便一桩接着一桩。没多久刘志丹就带红二十八军上来了。

三、为刘志丹东渡造船

听到刘志丹上来，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与红三团政委毛凤翔连夜去迎接。特委机关马上忙活起来。这时担任特委军事部副部长的王兆相更是兴奋不已。因为他当红军是由他的亲哥哥王兆卿^⑤送去陕甘红军里的。那时他曾是谢长子、刘志丹带领的陕甘红二十六军骑兵连的警卫队长，在刘志丹身边干过。因为他是刘志丹亲手带出来的兵，所以他今天是与“老领导”久别重逢^⑥。也正由于他人熟地熟，二十八军首长刘志丹军长和宋任穷政委向神府特委提名，要王兆相协助军部在神府期间搞接应方面的工作。杨和亭马上同意，并给王兆相配了王道三为助手。但由于二十八军任务紧急，所以从3月20日进入神府，接连在桃柳沟、杨家塬、沙峁川打了几个胜仗之后，就准备渡河过山西与那边的红十五兵团会合。因此，渡船成了要事。为了阻止红军过黄河，黄河上原有船只，都被对岸罗峪口国民党的驻军全都收禁了。所以王兆相和王道三对造船的事，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先

选定彩林村为造船的主要工地。

然而，造一只大木船，对一个小山村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平日里，工料齐全，要造好一支大船，少说也得半月二十天。现在要把这么多人渡过河，即便造好一支半艘，也不济事。可要同时造出许多支船，就是工料齐备，也得足够的时间。可是现在的任务是只给七天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王兆相、王道三他们走了一村又一村，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于是召开群众大会，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动员群众。群众对给二十八军造船，意气风发，深感荣幸，就是时间不多，工料全无，实在想不来个好办法。最后在彩林村召开了党员大会，凭党的凝聚力量，会上全体党员一致认为：“这是给咱自己的队伍造船。二十八军过河是刘志丹军长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所以，我们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完成任务！”有了这个共同意志，又经过大家反复讨论，充分发挥了群众是真正英雄的作用。党员会最后议定：时间不够，采取昼夜施工，换人换班工不停，要把7天变成14天；要求一匠带多个帮工，一人一天要干出两天的活儿来，要把这14天再变成一个月。工料没有，采取挨家挨户总动员，从山坡沟抓便于加工和搬运的成材活树，到群众家存的可用木料，从各家各户每天烧火做饭用的火剪火柱（暂时可用木棍代使）到凡可以加工成船钉的零星碎废铁件，都拿出来。同时，按船体各部位，分组、分工、包进度，一直落实到工匠和每一个人。分门别类扛死肩，定任务，只可提前不能掉队落后。这一下，十分见效。最后，连农家院的大门扇和老年人备用的棺材板也争相出献，并自个儿抢着往工地上送。人民群众就是用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这个不同寻常的艰巨任务，让红二十八军如期于四月一日在神府红三团的配合下，顺利地渡过了黄河，解放了罗峪口镇。

红二十八军的到来，敌人纷纷逃奔，根据地迅速恢复和扩大，神府区出现了空前的革命大好形势。趁此机遇，特委书记杨和亭让新的三支队由王兆相带着随二十八军过河，去山西那边开辟新区。三支队过河很短几天时间，人员、装备发生了极大改观。当他们再返河西时，特区便把他们编为神府区红军第四团，团长王兆相、政委贺伟。此时，神府特区，2个红军团，3个独立营，还有好几个地方游击支队。特委为了统一领导，成立了统一指挥部，由王兆相和刘明山任正副总指挥，并于7月间特委在陈家坪召

开了会议，将神府红军各武装部队汇编为一个独立师，报请中央批准，命名为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第一师（后改为第二师）。1936年8月1日，在花石崖，特委召开了隆重的独立师成立大会，任命王兆相为师长，政委张秀山，参谋长李子洲，秘书长王恩惠。师直属警卫、侦察、骑兵3个连。师属一、二两个红军团，即主要是原红三团和红四团。全师一千多人，成为一支强劲的战斗部队。

根据地的扩大，红军的发展，都是红二十八军给神府区带来的变化。然而就在人们兴高采烈的时候，噩耗传来，陕北人民敬爱的革命领袖刘志丹将军在南下打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以身殉国！简直是晴天霹雳，神府区的党政军民无不十分悲痛。多少年过去了，彩林村的两位老人还说：“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刘军长过神府才走后不多时间，竟跟我们永别了！”二位老人回忆的泪花告诉我，刘志丹同志在神府革命根据地群众的心目中留下了永远也忘不了的英雄形象。他在陕北人心目中的地位跟我们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一样，都是顶天立地、至高无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英雄。多少年过去了，今天神木人民在刘军长当年登上过的天台山^⑦为他修了一座纪念馆，并为他竖起刻有当年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悼念词的高大纪念碑。人民群众对他的怀念更是永存的，在纪念馆的游客中有人写下：“天台未忘红军旗，志丹东渡不见回……”高山永在，大河长存，至今仍然有人说，“神府红军是共产党刘志丹在神府区扶持起来的一支‘天兵天将’。所以，国民党多少次来‘围剿’也消灭不了他们”。

四、勇往直前“红三团”

往事悠悠，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是豆腐或脓包，井岳秀对神府红军的动态一直在关注。神府红军独立师的出现，国民党榆林的《上郡日报》^⑧立即惊呼：“王兆相死灰复燃，红三团改编成独立师。”同时，发动了晋、陕、蒙最大规模的一次联合“围剿”。可是由于独立师北上南下，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搞得敌人昏头转向，很快就打退了敌对神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使国民党榆林军方，最后不得不坐下来与红军谈判。这才实现了在神府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共合作”。

“卢沟桥事变”以后，神府红军奉党中央的命令，开赴抗日前线，归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师长指挥。部队经五寨改编为警备六团，驻军偏关。驻防定位以后，团长王兆相被调回延安学习。后来，他被调往山东敌后，警备六团由张达志政委和孙超群副团长带领。他们继续东进，智取右玉，奇袭左云，冒着敌人的炮火挺进绥南，开辟了绥南和雁北的抗日根据地；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他们进出长城内外；北进，三上大青山；南下，五返晋中、吕梁。抑制了鬼子西进的通道平绥铁路线；多次重创和打掉日军在同蒲铁路线上的重要道路口和据点。在跟鬼子拼杀的同时，培养和锻炼出许多优秀的抗日干部和战斗英雄。神府红军的“老干部”王恩惠、李登瀛、张志远、石生荣、王道三、王宝山、赵希贤等被派到地方上，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军政领导；更有老红军战士、战斗英雄黄进山，在日本鬼子面前，他九死一生地与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多次搏斗而名留团史。

在跟鬼子进行红沙坝的战斗中，警备六团一营营长贺伟牺牲。他是第一个牺牲在抗日前线的神府红军营级干部。在贺立本老先生给我讲这段抗日故事时，贺伟的父亲也在座。出我意料的是作为烈士的亲人，老人家还像往日一样，那么忍痛镇定。他为了不让眼泪掉下来，坚强地扬起头来看着窑顶说：“唉，打仗么，总会有人牺牲。咱的儿子当紧，别人家的儿子同样当紧，他们都是父母的血肉么。悲痛啊！悲痛不是一朝半载就可以过去的。不过一想到咱儿子是党的人，是死在抗日前线，我心里也就好受多了！”

革命烈士的亲人没有让悲痛压倒。老人代表了所有抗日烈士的亲人以爱国、爱共产党的情怀来自我宽慰。何为“化悲痛为力量”？这使我看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中华“四万万同胞”的对敌斗争心理。让我明白了，想当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尽管他们穷凶极恶，嚣张一时，可是从战争开始他们就陷入了注定要失败的命运。

随着时间推移，警备六团距家乡越来越远。从贺立本与贺伟父亲这两位老人回忆的叙事中，我知道当地群众对这个红军团后来的事不太清楚。好在解放后返回家乡的红军老干部，以及他们写下的革命回忆录，弥补了许多神府革命时期少为人知的事实短缺。只是还少一条完整的战斗路线图。可喜的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本《铁甲雄风》画册，用大量的资料 and

照片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了神府红三团过河后一直到今天的战斗历程。这本珍贵的画卷，正是由这个老红军团里走出来的又一位将军薛清池同志^⑤，历经数年辛苦，奔走了许多地方，调查研究，收集整理，才编辑出来的。

《铁甲雄风》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神府红军从八路军到解放军在祖国大地上为祖国为人民所走过的足印，同时详细地了解到这支部队东征西讨和建国后换装铁甲，成了坦克兵，并曾出国抗美援朝，以及返回祖国后，久驻中原大地完整系统的军史辑影。因而才有了十年前我与薛将军共著《神府红军团征战记》一书的完成。从“七人武装”到当时驻军中原，叙述了神府红军的全过程。

再从这个老红军团所经历过的战斗业绩来看，这支部队最大的特点就是“党指挥在哪，他们就战斗在哪”。前年在建党90周年时，春三月，我怀着敬仰心情，再次亲临这个部队采访，从他们的团史馆里我看到上级党委对这支英雄部队的评语是“六个特别”，即：“对党特别忠诚，打仗特别勇敢，作风特别顽强，守纪特别严格，爱民特别真情，创业特别勤奋”。上长江大堤抗洪抢险，在汶川地震中抗震救灾……他们都是先进集体。他们就是在人民群众危难的时刻，带着“红三团勇往直前”的胸章，出现在老百姓面前和抢险救灾现场的神府红军团。他们更没有忘记神府“老家”的人民，经常回来对老红军和烈士亲属进行探望。他们的英雄事迹，每每在老区人民的眼前回荡，形成广泛的众口流传。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领导人民克服千难万险由胜利走向胜利，最可靠的保证就是老百姓的拥护和人民武装勇往直前的战斗。所以人民群众爱护人民军队，才神话人民的武装是“天兵天将”。

[注释]

①③文见陕北党史资料丛书（十二）《神府革命根据地》一书，杨和亭回忆录《神府特委到特区苏维埃政府》。

②文见刘明山回忆录《神府特区红三团和红一团》。

④文见《王兆相回忆录》和《黑狸虎传奇》。

⑤王兆卿，1932—1933年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原为绥德四师学生，时李子洲任校长。1933年夏牺牲，即“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

⑥王兆相入陕甘红军，第一次见到了谢子长与刘志丹，任骑兵连的警卫队长。后随

刘志丹带领的红二十六军南下谓华南山，一直在刘志丹身边。此次相见，已过三年，故言“久别重逢”。

⑦红二十八军到神府时，在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同志陪同下，登上窟野河黄河交汇点上的天台山，察看黄河对岸山西罗峪口镇那边的敌情和地形。

⑧《上郡日报》时为国民党在榆林的官方报纸。

⑨薛清池，北京市丰台区，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原院长。

忆红色传统 建一流铁骑

——纪念红三团成立 70 周年

原装甲第十一师政治委员 王德山

红三团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神府特务队，1933 年 10 月 18 日诞生在神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1934 年 9 月 18 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改编为陕北工农红军第三团，后扩编为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成为陕北地区威震敌胆的一支武装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红三团开赴晋西北地区，归建八路军一二〇师指挥，先后为三五八旅警备六团、独三旅第九团。1949 年 2 月改编为陆军第八师二十四团，解放后改编为坦克自行火炮第二〇七团，正式进入装甲兵部队序列，成为我军早期成立的少数装甲兵部队之一。1968 年 8 月参加坦克第十一师组建，改番号为坦克第四十二团。1998 年 7 月随师转隶应急机动作战部队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改番号为装甲第四十二团，2001 年正式列编为军委战略预备队，成为我军重点建设部队之一。白诞生以来，这支部队的战斗足迹遍及西北、华北、华中等十个省（市、自治区）和朝鲜半岛，有 14 名将军和 31 名省部级以上领导在这个团队工作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神府革命根据地的 5 次“围剿”，保卫了红色政权，扩大了武装；抗日战争时期，转战于山西、内蒙古地区，三上大青山，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晋中、太原、兰州等九次重大战役，五连、六连、九连分别被授予“白家庄英雄连”、“聂家山英雄连”、“石柱沟英雄连”荣誉称号。建国后参加了祁连山剿匪和抗美援朝，装步三连在剿匪作战中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模范连”荣誉称号，团被志愿军总部表彰为“解放朝鲜三好团”。

进入和平时期，这支部队继续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团队建设面貌日新月异，部队战斗力逐年提高。部队连续 18 年被评为保密工作先进单位，连续 21 年无严重事故及案件，1994、1995 年分别被集团军、军区表彰为抓基层建设先进团。

1998 年 7 月，该团随师转隶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并从河南确山移防

至湖北孝昌县。全团官兵紧紧抓住部队转隶、移防和列编战略预备队这三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用红军传统凝聚军心，2002年被军区、集团军表彰为“学习成才先进单位”，共青团委员会分别受总政、军区表彰，2003年开展“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教育活动的经验被军区、集团军推广。坚持依法按纲施训，部队打赢能力有明显提高。2002年组织了建团以来规模最大的整团实兵实弹战术演习，被集团军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团”，去年军事训练总评全师第一。坚持全面建设、整体推进，部队全面建设取得明显进步，2001、2002年分别被集团军表彰为落实“五句话”先进团和“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涌现出了党的十六大代表赵正涛、共青团十五大代表牛强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典型。狠抓作风纪律建设，部队管理科学正规，多次被集团军、师评为“安全管理‘三无’团”和“安全工作先进单位”。注重改善环境，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所有建设工程均为优良，官兵住房被总部和军区评为优质工程一等奖，是全军区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团级单位。

70余年来，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在战斗洗礼中不断得到锤炼，在各种风雨考验中不断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了“对党特别忠诚，打仗特别勇猛，作风特别顽强，守纪特别严格，爱民特别真情，创业特别勤奋”的红军团精神。70余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告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住部队建设的政治方向，确保部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必须始终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磨练摔打部队，努力培养官兵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作风，确保实现“打赢”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积极为人民谋幸福，始终保持我军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红三团的精神代代相传。

回顾7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支部队之所以能由创建之初的一支地方武装，发展成为今天齐装满员，集坦克、装甲车、火炮等各类轻重装备于一体的装甲兵部队，是因为有无数革命前辈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有英雄的陕北人民舍生忘死，无私奉献。战争年代，是他们把亲人儿女送到前线，打鬼子、打白匪，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首壮

丽的诗篇；是他们无私地支援着子弟兵，部队打到哪里，支前民工就抬着担架，推着小车跟到哪里。没有被服，群众白发起来做鞋、做袜、做衣裳；没有粮食，群众宁愿自己挨饿，也全力保障；战士负了伤，群众当儿子一样照顾救护；敌人搞“围剿”，群众帮部队送情报、掩护伤员。在我们部队，至今仍然传颂着陕北黄云爱三妯娌为掩护红军，引开白匪壮烈跳崖的感人事迹。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望历史，我们心潮澎湃，豪情满怀；展望未来，我们无限憧憬，信心百倍。在今后的建设和发展中，我们一定进一步继承和发扬红三团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全面提高部队建设水平，以实际行动回报人民的关心和厚爱。

红色传统品豪气

装甲第十一旅原副政治委员 宋波

什么是豪气?豪,《新华字典》解释:自豪,豪迈,豪爽,豪情。豪气,《辞海》的解释:英雄的气概,豪迈的气势。但对我们旅来说,还要有“自豪的底气”。

知道了什么是豪气,我们又为什么把它作为第一种“气”在全旅官兵中大力培植呢?

老子有一个观点,补什么的时候就说明缺什么。我们现在提出培育豪气,也一样,就大部分官兵而言,我们现在骨子里缺这么一股豪气,这是最主要的。

我们缺豪气和部队建设有什么关系呢?豪气对我们就那么重要吗?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红军部队,是装甲兵部队唯一的一支红军部队,跟别人一说都挺自豪。原军委张万年副主席还亲笔给我们题了词:扬红军传统,振铁甲雄风。但对这段历史我们每个人都能说清吗?恐怕不好说。说不清楚还谈什么继承和发扬红军传统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考虑大力培育官兵的豪气,也想让同志们进一步学好旅史,清楚我们这支部队的辉煌过去,把这支部队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扬下去。

我们旅的前身是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亲自领导创建的神木红军特务队,成立于1933年10月18日。最初只有7个人、4条枪,后来发展成为红军团,再后来发展成独立师,成为陕北红军够紧紧依靠群众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这是很大的成绩。神府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党中央是满意的。”毛主席说这话是非常感慨的,中央红军进行了五次反“围剿”,最后被迫长征,大家都知道,我们也进行了五次,但全以胜利结束。

我们部队发展至今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的红军部队。1933年10月18日组建,参加了土地革命

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全军装甲兵序列中唯一的红军部队，有着 80 年的光辉历史。

二是始终坚持党委集体领导制。部队从成立之初，党的组织就很健全，始终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与中央红军不一样的是，我部从来没有实行政委最后决定权制，80 年来始终坚持党委集体领导。

三是一直成建制保留。从当初的 7 人特务队，到 20 人的红三支队，再到后来的红三团、独立师、警备六团、九团、二十四团、二。七团、四十二团，到今天的十一旅，80 年来我部共经历了 17 次整编、13 次转隶，但一直都是成建制保留。

四是创建的根据地从未丢失过。我部前身部队在陕西神木县创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活动于神（木县）府（谷县）佳（县）榆（林市）地区，创建了神府佳榆革命根据地，虽历经多次疯狂“围剿”，从来没有丢失过。

五是陕北红军部队中唯一东渡黄河到前线参加抗日的部队。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红军部队整编为延安留守兵团，共编为 8 个警备团，我部前身当时为警备六团（一二〇师三五八旅领导），也是陕北红军部队中唯一东渡黄河参加抗日的部队。

六是革命信念特别坚定。红军被迫长征后，党中央起初并未考虑过去陕北。首先想到的还是两广，后来想入川，但刘湘的部队太能打，湘江战役把江水染成了红色，几仗下来，长征前 8 万人剩下不到 3 万。军被逼无奈，只得继续北上，爬雪山、过草地，终于和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哪知，张国焘看看自己 7、8 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再看看中央红军的 1 万多人，想当头，最后竟然拉走了部队，分裂了党。中央红军又一次陷入危机，就在这时，警卫员给毛主席搞到了一份报纸，上面记载着阎锡山的一段话：“全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县不赤化……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毛泽东眼前一亮，到陕北去。就这样，1935 年 10 月，党中央率区区不到 7000 人，直奔陕北。漂泊了 1 年多，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陕北找到了家。与中央红军会合后，我们马上把部队交给了党中央指挥，坚决听从党中央领导。这一点与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要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集中体现了我们这支光荣部队坚定的革命信念！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充足的底气自豪？

去年是我们旅组建的第一年，也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累。

但作为军人，这应该是个常态。如果过去我们做得足够好，现在不会太累，我们突然感到现在紧张了，因为我们过去欠帐太多，好多落下的功课需要补起来，所以必须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往前赶，尤其是作为红军铁甲旅第一代奠基人，军区首长要求我们“高起点搞建设”，什么是高起点？一六二师、一二七师等兄弟部队的标准就是我们的起点。

如果不这么做，只能是被人家越落越远。如果这样，我们将愧对我们的红军前辈，愧对第一代创业人的称号。

换一个角度再想一想，我们现在比我们的前辈们还累吗？还苦吗？比他们那时强多了。我们只是比他们少了一股子气——战天斗地、无所畏惧的豪气。

抗美援朝时，我们国家刚刚起步，百废待兴，各种物资极度匮乏，面对强大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我们打胜了。

毛泽东在分析朝鲜战争形势时说过一句名言：中国军队气多钢少，美国军队钢多气少。正是靠这种豪气，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打出了中国人的血性，打出了中国人的尊严，打出了中国人的威势和豪迈。

这一晃 60 年过去了，现在是个什么形势呢？我们的对手还是钢多气少吗？

去年 8 月份，广州军区一个部队组织演习时，一位师长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他说：“决不能把对手当成钢多气少的软柿子。”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什么都在变，我们的老对手美军也在变。去年司令部给常委每人买了一本书，叫《跟着美军上战场》，是一位中国记者从阿富汗战场回来后写的，我认真看完了。

从书中那些真实的记载可以看出，无论从战术素养，还是战斗精神，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我们在变吗？应当说，变了，我们现在钢也多了。

但是，我们要防止另一个变化，千万不能气变少了，如果那样，我们

就失去了我们最大的资本！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旅的官兵是没有问题的！去年拉练时，我和孙副旅长带领桐柏的同志们行军，行军第一天，坦克四营营长刘东阳为大家探路，掉进河里，脚也扭伤了。那么冷的天，刘东阳衣服也没有换，让他上车不上，在寒风中一瘸一拐地走完了当天的路程。见到他的人没有不被他身上那种豪气打动的，四营拉练时被评为先进单位，去年其他工作完成也不错，我想，这和干部身上这种气势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拉练时，还让我和孙副旅长感动的是一名小战士，部队组织休息时，我发现一名战士背着背囊继续一瘸一瘸地在走，开始我以为他在赶队，可是后来他已经走到了最前边还是在走，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腿疼，走得慢，别人休息时他赶赶路，这样就不会掉队了。我不知道这名战士叫什么名字，我是真的被感动了，我们部队有这么多平凡而又充满豪气、藐视一切艰难困苦的士兵兄弟，我们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有什么任务完成不了！

从过去说到身边，只想说明一个道理，只要我们始终充满豪气，我们就会始终充满激情，我们就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吓倒，把旅建设成为全面过硬的战略预备力量拳头部队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作为新组建部队，无论同志们过去来自什么单位，现在我们都已经是这个光荣部队的一员了，所以对这个部队的优良传统要清楚，并且有责任让这种传统在营区蔚然成风，形成培养英雄的土壤。

我们旅有很多光辉的战例。

在右玉战斗中，二营被敌人包围在城内，为了突围，他们与敌人拼死战斗到底，全营无人生还，成为我旅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打太原、打临汾，我们首创的炸碉堡经验，被全军推广。

我们自豪地告诉别人，我们是红军传人，我们是“红军铁甲旅”的兵。

忆百岁将军王兆相

装甲第十一旅原政治部副主任 梅江新

我所在的部队是一支红军部队，1933年10月在陕北神木县成立，当时是共产党员王兆相领导的七人特务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的红军铁甲旅。所以，王兆相的名字一直被历代官兵所铭记，他的故事在这支部队广为流传，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官兵成长的精神动力源泉。

王兆相是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活了101岁，是陕北众多将军中的突出代表。在这支红军部队即将迎来成立80周年的前夕，作为红军部队的传人，我们更加怀念这位老前辈。

四位亲人的离去更加夯实了王兆相投身革命的坚定信念。王兆相1909年出生在陕北神木县，他的家乡是北宋名将杨业的故乡。比他大一岁的哥哥王兆卿，早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1933年8月，在一次召开发展红军游击队的会议时，被叛徒出卖，在米脂被国民党军枪杀。为了支持王兆相参加革命，其父亲于1933年惨遭杀害。当他得知亲人英勇就义后，强忍悲痛，找到陕北特委表示：“我哥哥他们牺牲了，我一定要接着干革命，替他们报仇，党组织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1943年，王兆相奉命从山东沂蒙赶往山东北部工作，两个已会走路的女儿鲁华、沂华留在老乡家中，从此永远失去联系。

革命就要有牺牲，现实就是很残酷。王兆相为了革命的事业，先后失去了4位亲人，这不但没有动摇他继续革命的意志，却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在王兆相的身上，足以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一个真正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革命者的本色，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胜的原因所在。王兆相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也是那个年代众多革命前辈的杰出代表，这种为了革命的事业宁愿牺牲一切的境界，应成为今天每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和学习榜样。

五次反“围剿”的最终胜利，王兆相带领的七人游击队发展成为抗日前线的正规军，同时，也展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王兆相将军一生带领部队打了无数次胜仗，其中，与国民党政府陕北军阀的五次反“围剿”

最为经典。

1934年9月，王兆相领导的游击队已发展成为红三团，王兆相任团长。国民党容不下他们的存在，先后五次集中精锐部队，对王兆相的红三团实施“围剿”，在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数倍于我，而我物资极度匮乏，经常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王兆相他们信念坚定、一心向党，经过艰苦奋斗，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王兆相领导的部队成功地与中央红军会合，被编入八路军的一二〇师序列，从此，这支部队走上了浩浩荡荡的抗日之路，并多次建立功勋。1938年3月，毛主席接见了王兆相，对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在硝烟散去的今天，反“围剿”的经过听起来像故事，可是在那个战火纷飞、血雨腥风的年代，王兆相和他的战友们却是经历生与死、存与亡的考验。他靠什么取得胜利？靠的是对党的特别忠诚、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靠的是与当地群众结下的鱼水之情，取得了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和保护；靠的是与战友之间结下的生死之情，在战斗中形成团结一致、坚不可摧的顽强集体；靠的是夜以继日研究战法，确保每次战斗万无一失。

7天的时间，王兆相带领军民造成了5条船，保证了红二十八军顺利渡河，体现了王兆相不怕艰难的吃苦精神。1936年早春，中央派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部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渡过黄河需要大量船只。经过研究，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王兆相。任务是7天时间要造5条大船，往日造1条船得半月二十天。怎么办？王兆相想，世界上的许多事，看起来十分难办，但是，只要横下一条心，困难总可迎刃而解。经过思考，最后认为，时间只有7天，可是白天晚上一起干，就成了14天，每个人都抓紧干，1个人顶2个人用，这又加进度。4月1日，5条大船硬是造出来了，红二十八军悄悄乘船渡河，河对岸的守军阎锡山的部队认为红军不可能这么快过河，等他们发现情况时，红军已顺利过河如神兵天降。

7天造5条船的任务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在王兆相手里却变成了现实，他们靠的是“一天当两天用、一人当两人干”的精神。其实，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总是按部就班，那可能就会一事无成，如果用“一天当两天用、一人当两人干”的精神来干事，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今天是和平时期，但是，我们是军人，军人有军人的使命，

我们是为打仗而存在的，革命前辈为我们留下的这种拼搏精神，是我们有效履行使命的宝贵经验，我们必须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只有这样，我们军人才能不辱使命。

千张老相片展现了王兆相历经坎坷、丰富多彩的百年人生。王兆相可算得上长寿将军，到 2009 年去逝时，已经走过了 101 年的人生，《王兆相画传》是对王兆相一生最直观生动的展现。

画册收集了王兆相近千张照片，每观看一张仿佛是在与老将军面对面交流，看过之后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有 3 张照片是王兆相十几岁时的照片，画册是他百岁时出版的，说明有些照片保存了近百年。有一张照片是他的全家福照，里面有 18 个人，却有 10 个人是穿军装的，充分体现了他对军队的执著热爱。有 8 幅反映他题词的书法作品，王兆相初中没毕业，虽说参加了正规院校学习，但更多的是靠个人的努力，练了一手好字，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勤奋的人。画册中有多张是王兆相和夫人刘静的合影，最早的一张是 1936 年结婚时在战地，每人挂了一支手枪的合影，最后一张是 2004 年，王兆相 95 岁生日时与夫人的合影，中间有多张不同场面的合影，从照片的表情中不难看出，他们夫妻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 70 多年的人生历程，是幸福的，也是我们现代夫妻的楷模。他们夫妻都很长寿，也说明王兆相将军是开朗的、健康的、懂生活的。

每次翻阅画册，都会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同时也有一种感叹，老将军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战争年代，到了老年社会的条件才得以改善。如此全的照片是如何拍摄和保存下来的，答案只有一个：老将军不但是个战争年代的战将，更是一个生活中的热爱者。生活在艰苦年代的王兆相将军总有无穷的智慧 and 满足，而生活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人们总有许多无奈和不满。我们是不是该从内心深处与老前辈作一下对比和反思，这样，我们对人生的态度可能会有一个较大的转变。

感谢王兆相前辈，在党的领导下，创建了我们这支红军部队；感谢王兆相将军，用毕生的心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牢记传统扬威名

原装甲第四十二团副政治委员 詹文星

核心提示：这是一支 75 年前从陕北神木走出的老红军劲旅，年初成为鄂北抗冰雪战场的主力，一等功臣、全国“抗雨雪冰冻灾害先进个人”朱应武就出自该团。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北纬 31 度、东经 103.4 度，一场强震撼动四川，数万生命顷刻陨落。该团官兵外训场上临危受命，1480 名红军传人发扬红军团对党特别忠诚、打仗特别勇猛、作风特别顽强、守纪特别严格、爱民特别真情、创业特别勤奋的“六个特别”团魂，跨三省，越千里，从鄂北挺进川蜀，奋战四川平武震区近 70 天，使平武 13 个乡镇 104 个行政村近 8 万灾区群众转危为安。

“湖北人民，红三团回来了！”肩扛“红三团”大旗，人人佩戴“红三团”胸标，7 月 25 日，孝昌县火车站，济南军区驻孝红三团首批近 700 名抗震救灾官兵凯旋。盛夏的孝昌街头，“欢迎英雄的子弟兵回家”、“子弟兵，你们辛苦了”的标语随处可见，红三团驻地附近路口，彩旗飘飘，锣鼓声声，孝昌县委、县政府领导和聚集在此的近 3000 名孝昌群众，以最隆重的礼仪，欢迎凯旋的亲人解放军。红三团四川震区英勇抗灾的事迹，经媒体的报道后，在当地群众中传为美谈。

8 小时救出 36 名九寨沟游客

36 名九寨沟撤离游客受困 30 公里外的木座藏族乡新驿村，急需救援！5 月 17 日 19 时 50 分，该团装甲步兵营刚到驻点，求援人员纷到来。

救人如同打仗。3 分钟后，进驻木座藏族乡的“战斗英雄模范连”连长张剑锋率 21 名党员突击队员紧急驰援。情势危急，他们只好边行动边汇报。“同意！”基本指挥所的回答就两个字。对于这支连续 6 年的集团军“基层建设标兵连队”、连续 9 年的“先进党支部”，哪个领导都很放心。

一路险隋不断。行至民族村自一里组，20 余米道路因山体滑坡被埋，不时滚落的百斤崩石和坡下被砸扁的汽车，夹着死亡的气息。“压倒一切

敌人和困难，决不被任何敌人和困难压倒！”的“连训”时刻激励着官兵们。张连长快步跑向断坡，突击队员迅速跟进。没有落脚点，队员们相互用背包绳绑着，攀着树根、匍匐着身子一步步往前挪，巧妙躲闪过滚落的崩石。越过滑坡，官兵已满身是泥、多处受伤。

“邓飞，没事吧？”行进途中，张剑峰突然发现二级士官邓飞背部有块血印。原来，一块鸡蛋大的碎石砸中了他的脊背。“不要管我，救人要紧！”在战友疼惜的目光中，邓飞大步跑到队首。其实，早被确定为军校考学苗子的他，完全有理由留守在后方，实现他的军官梦想。一纸血书，他申请到了救灾前线。

刚越路障，又遇河阻。深不可测的涪江沿山涧倾泻而下，两侧断崖震后仅剩两条碗口粗的铁链相通。天色已黑，奔腾的涪江河水考验着每名官兵。绑上应急灯，身体轻巧的张剑锋又带头倒附在铁索上向前攀援，党员们把背包绳绑在铁链上，5人一组迅速跟上。上等兵韩超有恐高症，突击队决定让他留下来接应。韩超急了：“每次行动我都上了，这次也不能落下！”60余米的铁索，韩超竟比其他人爬得更利索。“突击队就3把手电，要爬过去就得跟上微弱的灯光，哪有时间顾得上害怕！”韩超告诉笔者，过河后看到悬在空中攀援的战友，顿时冒出了冷汗。

攀悬崖、过绝壁、越断崖。13处滑坡、2条激流的生死跨越，突击队仅用了480分钟。5月18日3时50分，“战斗英雄模范连”突击队赶到了救援点。夜色中，被围塌方山谷32小时、已断粮一天多的36名游客看到解放军，顿时一片欢呼。22名官兵不约而同地掏出了身上仅有的干粮和水。而此时，他们也有数小时没有进食。当晚，36名受困游客悉数转移。

转移数千名藏族群众

7个藏族乡，7700多名受灾藏族群众，上百处塌方路段，2座被毁的铁索桥……5月20日，受困“孤区”的藏族群众牵动着红三团“一班人”的心。这天，8名一线救灾的常委分片包干，对各责任点的群众转移工作做了明确的分工，人人冲锋在前。23时许，在虎牙关口勘查地形的政委裴晓昌接到基本指挥所报告：“还有近1900名藏族群众急需转移！”

“部队化整为零，连夜深入藏区，务必迅速转移！”发出这道指令时，满眼血丝的裴晓昌刚刚咬着手电爬过仅剩五根铁索的涪江河架桥。此时，团长李世林正带领装甲步兵营紧急赶往白天徒手都难进入、通讯信号全无的白马藏族乡伊瓦代热村。那里，还有近 700 名藏族受困群众。在黄羊关藏族乡，海拔 2800 余米的山林，“抗洪抢险模范”副团长赵正涛和红一营骨干确定了“多设小组、缩小散布、定时喊话、集体推进”的搜救方法，在各重要路口派出了观察哨、游动哨，确保信息不通的情况下搜救不漏一户、转移不落一人。

21 日 5 时 40 分，“石柱沟英雄连”来到虎牙藏族乡高山堡村。看到连夜赶到的红三团官兵，藏族群众脚么阿林感动得直流眼泪：“路这么险，你们白天来不也一样吗？感谢你们，我们现在就下山！”76 岁的看芝茶老人担心儿子残疾跟不上转移队伍，急得直掉泪。“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带你母子出山！”正在该团蹲点的副师长王春杰，迅速带领两名干部靠上去，将母子俩背到队伍前头。在木皮藏族乡金丰村，“团结模范连”官兵紧急组织 380 余名藏族群众转移。14 名藏族群众超过 65 岁，行动极为不便，官兵只得背着他们下山。21 日 6 时 30 分许，走在队首的刘参谋长发现来时走过的路随山体塌陷，单人通过都困难，随即爬到断坡中间，边接应边清点人数，直至最后一名群众在战士的搀扶下顺利通过。为了不让背负的老人受伤，官兵面贴着断坡一步步往下滑。看到士官付向阳脸上渗出了血水，78 岁的木会珍老人哭了起来：“你们走吧，不要管我！”官兵们却执意轮流背负，任凭汗水和着血水往下滴。

转移中，不少群众不愿走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深山，炮兵营官兵将救灾物资搬运上山，就近选择安全地域搭建安置点。等在通车路段的“一江山岛英雄连”指导员高坤林带车连夜将受困群众向临时安置点转移。

在土城，在阔达，在木座……在平（武）北藏区 7 乡 40 村，戴有“红三团”胸标的 31 名校官，搀着穿着藏服的群众，定格成别样的风景。5 月 22 日 23 时，团基指传来消息：2763 名藏族群众悉数转移，无一人途中伤亡。

搭建 24 所藏族帐篷（板房）学校

“党叫干啥就干啥，闻令而动，勇往直前；人民利益高于天，济危解难，勇往直前；困难越大越不怕，敢打硬拼，勇往直前！”“勇往直前！”这是1991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将军为红三团的题词，成为平武第一所藏族活动板房学校——木座藏族乡中心小学第一堂课的内容。

特大震灾和连日余震，致使该团责任区的藏族学校全部停课，1392名藏族学生被迫辍学。“进村入户”活动中，当看到小学生零散在各村庄时，全团官兵的心深深被触动了。5月21日开始，他们就一边救灾救人，一边筹办“济南军区驻鄂红三团藏族帐篷学校”。

为了使学校尽快建成，全团官兵齐心协力。没有校舍，团长李世林、政委裴晓昌多次到平武县政府部门协调，并发动营连捐赠，一天就凑到57顶帐篷；没有教具，全团官兵竞相捐款购置，常士民等18名战士还发动家人捐助；教师缺乏，政治处突击培训了宋晓东、邓飞等27名高学历、有过教学经验的官兵。5月23日、6月1日、6月7日，23所藏族帐篷（板房）学校分阶段全部建成。6月5日，得知虎牙藏族乡高山堡村有3名藏族孩子因山路被毁无法上学，坦克八连四川彝族指导员阿达弥斯（汉名普鹏程）率领13名战士冒险爬上海拔3100多米的高山，为他们搭建了“红三团高山堡藏族小学”，实现了“赈灾学校无盲区”。为了丰富教学内容，团队又临时增派22名有文艺特长的官兵担任音乐、体育教师。

12岁的藏族小姑娘嘎里波是木座藏族乡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红三团官兵把她家人和其他藏族群众营救出来，转移到临时救助站，还送去粮食、蔬菜等生活用品，自己却舍不得喝一口“救命水”的场景，深深印刻在小姑娘脑海里。从5月18日开始，她坚持每天画一幅画，记录下红三团“叔叔们”的无私救助。从《解放军报》看到嘎里波的画，中央军委徐才厚副主席感动了。5月30日，他亲自给木座帐篷小学师生写信，并委托成都军区张海阳政委专程到平武慰问，带来了10万元现金和卫星电视机、收音机等价值5万元的慰问品。6月5日，徐副主席在绵阳市某野战兵站前亲切接见了嘎里波。

6月上旬，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帐篷内像蒸笼一样，各学校被迫调整作

息时间，有3所学校再次停课。“搭建藏族板房学校！”团长李世林、政委裴晓昌亲自与地方政府协调，7个藏族乡责任点、千余官兵迅速行动。截至7月中旬，已有近20所藏族活动板房学校建成。6月7日开始，该团官兵还陆续资助了28个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签订了《红三团爱心助学协议》，建立长期帮扶机制，确保28名家庭贫困的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业。

75小时打通“孤岛” 泗耳通信

唐家山堰塞湖使绵阳通往北川北部的唯一通信节点——北川漩坪乡深埋水底，北部通信通道切断。中国移动四川分公司紧急求援！

淹没区天然障碍无法逾越，改道泗耳，58公里光缆铺设任务中37公里原始森林无人区挑战重重。急难任务面前，上级把目光投向了红三团——75年前诞生于陕北神木的老红军部队。上级指示：绕开漩坪，7天打通从平武土城藏族乡到泗耳藏族乡的通信光缆，挺进北川北部1350名红军传人临危受命。

这天，川西北十几座海拔3600米大山组成的被当地人叫做“海梁子”的原始森林，在红军团官兵的地图上迅速标识。16时30分，该团6个红军连、4个授称连队的350名官兵背上背囊、冒雨出发。

为了节省体力，中国移动四川分公司联系了马帮，每匹马背着两盘总重600斤的通信光缆，在官兵的引导下前行。连日暴雨浸透路基，陡峭的山路上没膝的泥浆使电缆运输一开始就充满艰辛，前行不到6公里就有两匹马摔倒受伤。75分钟后，湍急的河流拦住了唯一道路。河流因汇聚了雪山冰水，冰凉刺骨，马的前脚踩进水中随即就往后缩。不得已，马帮全部撤回，留下60余公里的光缆。

“干部突击队集合！”团长李世林当即解下背囊，15名干部跟着解下背囊。5分钟后，一堵人墙手拉手，牵着用背囊连接的“长绳”，跳入水中。紧接着，30名老士官组成的党员突击队手拉手跳入水中，与干部突击队相向形成稳固的“人桥”。官兵找来枯树，架起300公斤重的光缆，30人一组靠着“人桥”将光缆一盘盘运过小河。站在水中，官兵们一个个打起了哆嗦。这时，不知是谁起了个头，随后《坚决打胜仗》的歌声在山谷回响……

走上岸，所有人嘴唇发紫，打着寒颤。时间紧迫，官兵顾不上烤火，15人一组背着拉散的电缆火速前进。10分钟后，所有人衣服冒出了“烟”。

18时20分，部队抵达无人区。没膝深的泥泞牵绊着官兵的脚步，一走一滑，每走几步就有人摔倒。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为了尽快接通至泗耳藏族乡的通信线路，团长李世林果断决定：扔下背包，急行军连夜铺设。原始森林荆棘遍布，十八、九岁的战士们背着近50斤重的光缆，在微弱的手电灯光中艰难迈步。老天爷似乎要考验红三团官兵，20分钟后下起了暴雨。干部牵头、党员收尾，每个小分队都紧挨着运线、布线。大家都明白，逼近体能极限时，稍停片刻，也许永远也跟不上，何况这还是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

饿了，就着雨水嚼口饼干；困了，倒在泥泞路上稍事休息。官兵们实在是太累了，嘴里吃着干粮都能睡着。听到集合号，他们又一骨碌爬起来，冒着余震、飞石继续挺进。为了保持体力，为了灾区指挥早日畅通，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在靠意志坚持、再坚持……

5月28日14时，先头部队走出无人区，将线路延伸至泗耳藏族乡基站，泗耳通信随后恢复，片口、青片、开坪、白坭等北川洪水淹没区以北的13个乡镇的28个基站也连通在望。奉命担任项目现场指挥的绵阳分公司副总经理朱泓感慨地说：跨越原始森林无人区，2天完成65公里山区光缆布放，在通信行业中，绝对是个奇迹！

5月29日19时30分许，踏入北川的移动工作人员传来消息：北川通信逐步恢复，群众已能与指挥部沟通信息！红军传人不仅通过了无人区，还将上级规定的7天时间改写为75小时！

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7月18日一大早，听到“一江山岛英雄连”官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平武县龙安镇王家山村的果农们纷纷出来迎接。这天，27名官兵再次来到硕果累累的王家山梨树林，帮助他们采摘、运输熟透的梨子。

“听到歌声，就知道你们红三团来了！”老支书王德林高兴地拉起了连

长张志云的手。知道该团坚持不接受群众物品，果农们就远远地迎接官兵来表达他们的谢意。在平武，红三团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铁的行为规范，赢得了各族各界的口碑。

说起红三团，平武县龙安寺的管理者、绵阳市伊斯兰教学会副会长马登清感慨万千。5月28日，建于明代的该县伊斯兰龙安寺因余震再次出现坍塌，3560余件伊斯兰珍贵文物面临危险。该团炮兵营接到求援后，迅速出动，不到一天就将3000余件文物悉数转移，无一损毁，而“一江山岛英雄连”指导员高坤林却因保护一幅国画，背部4处被砸伤。一个在藏族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故事，更让人为之感动。5月29日晚，打通土城至泗耳段通信线路、原路折回的八连26名官兵刚走出37公里原始森林无人区，就遇上了暴雨。方圆数公里内，青坪山一座黑赤老农庙是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此时，经常有藏族群众祭祀、祈福的寺庙大门虚掩着，只要进去就可以免受淋雨之苦，可所有人都站在庙外树林中。官兵们实在太困了，不到半个小时，所有人都在淌着水的地面上睡熟了。

在平武县炮兵营驻点，“概不接受馈赠”的牌子引人注目。6月20日，白马藏族乡达娃卓玛、尕绒次仁等13名藏族受助群众走了30余里山路，送来腊肉、牦牛肉等慰问品。官兵执意不收，她们就帮忙做起了饭菜。“这里的解放军实在是太辛苦了！”尕绒次仁说这话时眼圈红红的。原来，炮兵营150余名官兵承担了装卸全县救灾物资的任务。物资一到，官兵就得立即赶往卸载，没人能记得清，这群十八、九岁的年轻士兵已经多少个夜晚无眠。“他们无愧为红军传人！”平武县物资捐赠中心负责同志告诉笔者，两个多月来，炮兵营官兵转运粮食23800余吨，帐篷万余顶，方便食品、医疗器械、药品、衣服等近139000箱（件）……他们人均每天转运救灾物资3.7吨，却连一口救灾矿泉水都没喝过。为了表达对红军团官兵的感激之情，群众纷纷送来锦旗。该团政委裴晓昌告诉笔者，2个多月来，平武群众赠予红三团的锦旗竟达140余面之多。

梦开始的地方

原装甲第四十二团报道员 陈新文

一

2004年冬，夹着寒风，带着希望，我走进了济南军区“红三团”。

几年的军旅摔打，让我树立了信心，坚定了信念。离开部队已经三年，这三年里我收获了不少成功和喜悦，而在这支红军部队的几年使我受益匪浅。

高中毕业后，不想让家里承担过重的负担，我没有上大学。我像大部分农村青年那样待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一直到冬季征兵。那时，能到部队是我最大的愿望，我愿意把一生都埋在里面，也相信那里会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入伍后，我是战友们公认的“老黄牛”。我不认为老实憨厚是所谓的“迂腐”，这不仅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能给人以力量。我从农村走进部队，没有太多的见识，只想象着部队将是我的家，战友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把心里想的落实在生活和工作中，赢得了战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在和谐的集体氛围中，我真切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无论心力还是体力。

和绝大多数战友一样，我有过得意，也经历过挫折。在连队时，我干什么都冲在最前，毫无保留。在一次施工中，我的腰部损伤，个别战友笑话我傻。经过伤痛后，我还像以前那样积极，但学会了量力而行。我两次考军校，成绩不错，但机遇都和我擦肩而过。我遗憾自己错过了梦想，但我收获的，远超过遗憾。跨过了那道坎，我相信，面对任何困难，只要敢于从零起步，就一定会像春笋一样破土。

当指导员找我干文书时，我答应了，但心里却是对岗位的恐惧。我当时连简单的打字都不会，更不用说熟练地操作电脑了。我渴望学会新的技能，而这个岗位锻炼了我。慢慢地，我成了连长指导员的左膀右臂。我相信，只要从点滴做起，日积月累，就会收获成功。

后来，我又幸运地调进机关。初到机关，我每天“胆战心惊”。我不

会摄影，不会摄像，而我的职责就是搞报道，负责全团的摄影摄像。出不了稿子，不懂机关的办事程序，我接连挨批。在困难面前，我硬着头皮走了过来，学会了摄影，懂得了摄像，发表了一些稿子，也有了一点成绩。一年多时间，我又从团机关走到师机关。

进机关前，许多战友说像我这样老实的兵不适合在机关干。但机关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机关，机关是长见识、长才干的地方，是靠素质和作为立身的。在机关工作的日子，我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名普通战士，我有自己的岗位，有自己的职责，也有施展自己的舞台！

在适应期里，我曾因工作的失误懊悔过。但这里浓厚的学习氛围也使我更注重在学习中丰富自己，拓宽视野。周末、节假日等空闲时间除了跑步外，我都在办公室学习、看书。书籍点亮了我心中的希望，也教会了我独立思考。

2010年底，我抱着创业的饥渴愿望，利用休假，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走了走，在开阔视野看到希望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地方就业的压力和挑战。但我还是决心选择了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在压力中成长，在挑战中锻炼。将离开部队时，我收集了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发表的稿子，草草打印后装订了一本。

弹道无痕亦有痕。无论曾经付出与拥有，步入新的环境，一切都将从零开始。但在部队学到的一切，在红军团收获的一切，将陪伴我一生！

二

从部队退役到地方，离开家乡，南下来到深圳，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一家知名的传媒集团。我的想法是：一切从零开始，只要勤奋和努力，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相信一定能收获成功。

当安排我到上海做一名业务员时，我就暗自下决心，用三年时间，在上海开拓出一块市场出来。我深知，我不是在为别人打工，而是在打拼和创造自己的事业。

半年过去了，经历了太多的困难和辛酸，甚至危险，身上的钱也花了不少，但始终没有做出一点业绩。虽然没有做出业绩，但我始终觉得这些

经历是一笔宝贵财富，我能感受到自己每天都在不断的进步。到了年底，出了业绩之后，才被客户和同事认可。

离开部队的第一年，有付出，也有收获。我觉得最大的收获不是工资待遇的提升，也不是职务晋升，而是在工作中与同事结下了战友般的友谊。当生活在一个家庭般的团队里，在工作中就会感受到一股动力，这股动力激励着我为这个集体心甘情愿的努力着。我习惯了部队战友间相互帮助、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生活，我习惯了把身边同事当自己兄弟姐妹。

就像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一样，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不是把工作当事业来干，没有摸爬滚打，在社会上永远不会锻炼成长。我渴望成长，渴望去点燃内心的希望。

2012年8月，我开始以高层管理的角色带团队做项目。这一年多时间，几乎走完祖国版图各大角落，虽然很苦、很累，但成长很快，收获很大，看问题的高度也逐渐形成。我坚信，只要敢于从小事做起，从零起步，日积月累一定能收获成功。

人生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当你迈过一个山头时，迎来的会是更高的一个山峰。而脚踏实地，怀抱信念和勇气，才能走的更远。

军营是人生梦开始的地方，“红三团”是我理想放飞的地方，在军营的日子让我受益终生。

红旗，何以高擎 80 年

通信连战士 白丹

从旅组建之初，我就一直担任旅史馆讲解员，先后圆满完成了近 30 场 160 余人次的旅史讲解任务。在为首长和战友们讲解述说的台前，或者在我一个人翻书备课的幕后，始终都有一个问题在我脑海萦绕：我们这支部队南征北战，东讨西杀，有成功，也有失败；有英勇，更有悲壮。这一路走来，到底是怎样的感情、怎样的责任、怎样的精神和毅力，支撑我们走过 80 年的风风雨雨而历久弥坚，勇往直前？

因为我们始终坚守“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忠诚品格，是铁心跟党的中坚力量。神府红军特务队成立之初，全队共 7 人，只有长短枪 4 支，大刀、长矛数把，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就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才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陕北神府根据地也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一些无辜的党员和积极支持党的工作的同志，被冠以“反革命”罪而被杀害，其中就包括了队长王兆相、政委张秀山的父亲。但这丝毫没影响官兵对党的信任，仍矢志不渝地按党的要求开展武装斗争，毫不动摇地听党话、跟党走。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老前辈一度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始终坚持革命意志不动摇，在苏区三分之二被敌人占领、十分之九的村庄被敌人编了保甲的恶劣形势下，牢牢守住了神府这块前哨根据地，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肯定。从创立至今，我们先后经历 17 次整编、13 次转隶，仅建国后就有 4 次换防，每一次都高标准完成了任务，充分体现了对党特别忠诚的高尚品格。

对照先辈，我们也来试着拷问一下自己：如果党让冲锋陷阵，我们能不能指向哪里、打到哪里？如果党让抢险救灾，我们能不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如果党让刻苦训练，我们能不能自觉把训练场当战场？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能不能当一名领导愿意带、战友愿意跟的钢铁战士？面对拷问，不知道大家都有怎样的回答。应该说，在大项任务面前我们从来都是没有二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但在平时的训练任务中，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我们的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志们，如果因为素质不过硬打败仗，那是战士最大的耻辱！要知道，能打仗、打胜仗才是作为军人对党最大的忠诚！只有真正把“三实”作风、“四见”精神、“四打”要求落实到位了，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了，才是真正的铁心跟党走，才能保证红旗不变色，忠诚代代传。

因为我们时刻激荡“勇往直前能打仗”的昂扬斗志，是多方驰援的精锐力量。“没有攻不下的阵地，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是我们数十年征战历程、数千次大小战斗的真实写照。部队组建以来，我们战斗足迹遍及西北、华中 10 个省（市、自治区）和朝鲜半岛，产生了 11 个英雄连队、革命英烈 3000 多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和平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还记得血战右玉城，在敌十倍于我的情况下，二营营长黄光福带领 120 名官兵与敌战斗到底，无一投降，全部牺牲。永不忘战斗英雄史文珍，带领爆破组多次靠近碉堡，研究出集团装药、连续爆破的方法，摧毁碉堡，自己却中弹牺牲。可以讲，每一次战斗都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都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打仗意识和“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绝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战斗激情体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我们旅驻防军区最南端，既是区域内抢险救灾、平暴维稳的重要突击力量，也便于快速向东南、西南方向远程机动遂行支援任务，可以说平时是军区的代表队，战时就是靠前的桥头堡。特殊的驻防区域赋予了我们更重的责任，以往的优良传统要求我们有更大的作为！

但咱们有的同志却以各种借口来淡化甚至回避这种责任，比如讲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不会打、国家以经济建设为重不想打、我们是战略预备队轮不上打，等等。可现实真是这样吗？大家必须要清醒，战争离我们并不远！今天战斗意识的淡化，就意味着明天战场上的失败！大家一定要牢记，我们是预备队不假，但铁军的预备队也姓铁！红军的传人更不能丢人！作为全军装甲兵系统唯一的红军部队，我们装备可以差但精气神不能差，基础设施可以少但打赢的信心不能少，必须照着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标准建，瞄着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样子干；作为神府红军的传人，我们必须时刻燃烧尚武精武的战斗激情，自觉做到“剑不如人但剑法要高于人”，把自己练成小老虎，把连队铸成刀尖子，把红军铁甲旅打造成平时过得硬、战时打得

赢的钢铁集体。

因为我们一直秉承“困难越大越不怕”的顽强作风，是攻坚克难的骨干力量。1950年初，为捍卫解放战争胜利果实，红三团奉命进行剿匪。在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祁连山区，整整两夜一天时间，我们急行军240余里，奇袭土匪巢穴，一些战士被深至膝盖的积雪冻得失去了知觉，醒来后继续参加战斗，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1975年夏，豫南地区发生特大洪水，我们奉命开往西平县抗洪抢险。由于通讯不便，运输困难，部队缺水少食，许多战士患上了痢疾、红眼病，腿部浮肿、皮肤脱皮，但没有一人退缩，连续奋战6天6夜，救出群众6700余人，挽救直接经济损失100余万元。还有上世纪90年代的“西合”、“京九”国防光缆施工，1998年长江荆州段抗洪抢险，2008年抗雪救灾、抗震救灾，我们的前辈们人人当先锋、个个打头阵，不叫一声困难，不讲一点价钱，形成了“困难越大越不怕、任务越重越兴奋”的部队气质。

在我们神府儿女的词典里，写的是“生平铁石心，忘家思报国”的爱国情怀，写的是“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忧患意识，写的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献身精神。红旗，已在前辈手中高擎80年，也必将在我们手中接力传递，永远高高飘扬！

继承红色传统 立志军旅成才

高炮一连指导员 龚鹏程

说到传统，我忽然想到习主席在参观《复兴之路》讲的三句话，他说：“中华民族的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站在旅史馆看着一幅幅震撼的图片，我也想说三句话：“我旅的昨天是英雄辈出战功卓著，我旅的今天是不畏困难勇往直前，我旅的明天是高扬传统勇当先锋。”

昨天的红军铁甲旅英雄辈出战功卓著

首先请跟我一起走进历史精彩的瞬间：正是80年前陕西神木的一声枪响，让无数仁人志士从此聚集，从七人游击队到红三团，从陕西转战山西、内蒙，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从国际维和到抗震救灾，一代又一代的神府红军传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难以忘记百团大战的惊险壮观，难以忘记夺右玉城的英勇悲壮，难以忘记保卫延安的拼死一战，难以忘记攻占太原的艰辛困难，为了国家兴亡、民族解放，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历史的见证，只有英雄的中国人民不畏困难。80年，历尽沧桑，神府红军传人精神不倒，代代相传；80年，艰难探索，神府红军传人乘风破浪，勇往直前；80年，千锤百炼，神府红军传人牢记使命，不畏艰险。80年的历程，记载了我们神府红军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80年的历程，铸就了我们神府红军战无不胜的革命精神。

今天的红军铁甲旅不畏困难勇往直前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未来任重道远。回顾红军人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我们感慨万千。是啊，一支部队需要一种灵魂作支撑，一个连队需要一种精神作牵引。下面，请跟我一起看看今天我们在红军精神的指引下是怎样勇往直前的。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连队的“48勇士精神”。

来看看我们的勇士们吧。

首先请跟我来训练场：这是我们的一名第十二年老兵班长张鑫在和年轻同志比高低，最后一年，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带出更多的精兵强将；这是我们的一名年轻士官韩艳峰，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挑战着自己的极限，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跑到了终点线；这是我们的一名新兵张晋铭，他正在加班加点弥补差距，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我一定可行”。正是老班长永不服输模范带头的精神指引着大家往前冲，正是士官骨干挑战自我勇于争先的精神鼓舞着大家刻苦练，正是新兵同志不怕吃苦不甘落后的精神激励着大家全力拼。优秀的战士不是叫出来的，是战友们相互帮助相互鼓励比出来的；优秀的连队不是喊出来的，是全体官兵团结一心刻苦训练拼出来的。

下面再看看我们考核比武现场：“加油，跟着我跑；加油，马上到了，坚持住；加油，调整呼吸，超过他，挺住。”是啊，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累了，大家吼一吼叫一叫，战友的鼓励永远是最坚强的动力；痛了，大家扶一扶拉一拉，战友的双手永远是最温暖的慰藉。只要有舍得吃苦的骨气，只要有永不服输的志气，只要有誓夺第一的虎气，只要大家不抛弃不放弃，我们永远是第一。

明天的红军铁甲旅高扬传统勇当先锋

历史的火炬传承在我们手中，作为新一代红军传人，我想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用一心一意向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使命责任来书写我们忠诚的告白。汪国真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是的，既然选择了军旅，就应学会不再退却，绿色的军装给了我们坚持的勇气，有了它，生命的颜色不再空白；红军传人的称谓给了我们奋斗的骨气，有了它，成长的道路不再崎岖。此时，我们只有一个梦想，练精兵谋打赢，练精兵当先锋，用忠诚和责任书写红军铁甲旅辉煌的明天。

连队一个大学生新兵的成长日记这样记着：

12月25日，今天是到部队第3天，叠被子、练队列、跑步，没有来得及刷牙洗脸，难道这就是妈妈说的红军部队？这一夜我彻夜难眠，我讨厌这里枯燥无味，妈妈，你欺骗了我无知的心灵，我恨您！

1月23日，今天我们学习了旅史，还看了纪录片，电视里的那个红军真帅，长得真像我，我要刻苦训练，我要上战场，我要当小红军，我要做英雄。妈妈，我错怪您了，这里才是强者的世界，这里有红军的精神，我一定会努力的，我想您！

6月5日，翻开日历，才发现我入伍已经半年了。妈妈，今天是您的生日，我要把这张考核比武第一名的奖状送给您。半年来，从想家，到迷茫，再到成长，正是连队这种团结一心、永争第一的精神感化着我改变着我。我长大了，不再让您操心了，我爱您！

追寻历史的足迹，我们倍感自豪；亲历今天的崎岖，我们百炼成钢；踏上明天的征程，我们扬帆远航。平凡岗位乐奉献，立志军旅成英才！亲爱的战友们，让我们以一腔热血、青春年华和执着追求，在军队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在传统的激励下茁壮成长。

神府红军血性永恒

宣传科干事 杨森

血性，是中国军人打不垮的钢铁脊梁；血性，是人民军队磨不掉的精神底气。彭德怀曾说：堂堂七尺男儿，洒尽一腔热血，真乃人间快事！刘伯承曾说：自打从军时起，我就做好了准备，路死路埋，沟死沟埋，狗吃了得个肉棺材。如今，在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有这样一条土沟，它宽十余米，深四五米，它叫王老沟，田间地头抽烟喝水的耕作间歇，村民们还常常提起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战斗：“八路军真是英雄，用大刀砍下了敌人的大炮”。

1939年6月15日，我警备六团约三百官兵顺着王老沟，赶往右玉打鬼子。在山沟的另一侧，一支约五六百人的日军，抬着数挺重机枪和多门山炮，也在匆匆赶路。一公里，六百米，二百米，……眼看两支队伍就要走到一块儿，最前面的鬼子发现了我们，大喊着向上级报告。怎么办？边打边报告。一营一连长黄进山迅即拔出驳壳枪，将其击毙，战斗打响了。我警备六团团团长孙超群、政委张达志果断拿出作战方案，“一营留在沟口正面阻击敌人，二营、三营立即抢占王老沟左侧的山头制高点，压制火力！”一营官兵和敌人分别卧倒在相距30米的开阔地上，互相射击，场面异常惨烈，每消灭一个敌人，我们就倒下一名战友。二营、三营迅速驰援，以猛虎掏心之势向敌发起冲杀。山下的敌人用山炮猛轰我山头阵地，战友们的肢体落满了阵地，二营营长白兴元、教导员王金相等数十名官兵相继中弹身亡。待山头被削去了一层岩土，渐渐安静下来时，敌人发起了全面进攻。埋在泥土的官兵吐掉嘴里的泥巴，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搏杀，哪里有枪声就冲向哪里，哪里有敌人就战斗到哪里，干部倒下班长顶上去，班长牺牲战士顶上去。激战急骤间，我们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用枪头砸，枪头砸碎了就用大刀砍，大刀砍断了就用牙齿咬，直到杀光最后一个敌人。战斗结束时，我们300余人仅剩51人，26名干部仅剩6人。这一仗我们缴获了敌人所有机枪山炮，为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夺得了关键性胜利。

一场摄人心魄的胜利，一项永载史册的记录，一个傲视群雄的威名，

它们靠什么而来?我想,靠的就是这种临危不惧、勇猛顽强、威震敌胆的血性。可以说,她是流淌在我们历代官兵血液里的制胜密码。硝烟弥漫的运城解放战役,“战斗英雄”史文珍首创“连续爆破法”,先后两次冲入敌人阵地,炸毁敌9号顽碉,对攻占运城起了决定性作用;战事惨烈的右玉战斗,二营被敌人包围在城内,营长黄光福组织敢死队先后9次冒死突围,与敌人鏖战一昼夜,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谱写了一曲“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赞歌;态势胶着的聂家山战斗,“特等战斗英雄”王炳发,躯干、头部先后中弹仍然不下火线,硬是用手榴弹炸开了晋西北战场的一条通途。在我们旅,这些令人景仰的名字可以一直列下去,这些铮铮铁汉的胸膛里无不激荡着神府红军血性。这种血性,她是一种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锐气;是一种舍我其谁、势不可挡的霸气;是一种敢于涉险、勇于担当的胆气;更是一种壮士断腕、志在必成的豪气。可以说,她早已积淀为一种红色基因,浸润在我们历代官兵的灵魂深处,成为这支部队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绝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精神力量。

所以,有人这样说:神府红军不畏战、不惧死,战死沙场,便是重生;自己死,兄弟战友生;个人死,国家民族生;肉体死,血性光芒生!上战场前,美军士兵口袋里都揣着翻译成几国文字的投降书,在他们的条令条例里,也清晰地列举了可以投降的情况,但在我们的条令条例里,却从来都没有“投降”二字。深陷困境,我们一次又一次擦干身上的血迹,埋好战友的尸体,继续拼杀,靠得是什么?血性!冲锋号一响,我们就像一颗颗射出去的子弹,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如此杀气腾腾,靠得又是什么?是血性!这种血性,是用信仰浇铸的血性,它来源于对真理的无尚坚守,根植于对党的无限忠诚,彰显出对人民的无穷热爱,体现在对敌人的无比仇恨。神府红军血性,经过信仰的洗礼,就会在灵魂深处抽出新绿的萌芽,开出缤纷的花朵;就会传承不息,奔流不已,这就是血性的光芒,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神府红军血性征程已经远去,神府传人血性新篇还要续写。正如金一南将军在《苦难辉煌》一书的序言中所写,不是要你到历史中采摘耀眼的花朵,应该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先辈们历经苦难、不屈不挠,我们看到的是对血性的执着;告别了金戈铁马的

岁月，身处车水马龙的繁华喧嚣，我们更需要这种“不打则已，打则务必置人于死地”的铁血性格。习主席近来多次强调：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当前，我们面临的强敌牵制之忧、领土主权之争、分裂破坏之患、周边动荡之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复杂严峻。可有同志认为，现在国家实力在那摆着呢，谁敢打我们？有的同志讲，我就是想考个军校，学点技术，血性不血性不是我考虑的。听到这话，大家怎么看？军人就是一个打仗的职业，当兵不打仗，国家要我们干什么；不能打胜仗，人民养我们干什么，先辈们的丰碑还能见证什么，老区驻地人民还能企盼什么？作为神府红军传人，我们更是要时刻胸怀当兵打仗、练兵打仗的使命责任；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时刻练就战则已、战则必胜的杀敌本领；时刻砥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真正做到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

神府红军血性永远是我们的脊梁，永远是胜利的刀锋。战争年代她犹如一把钢刀，杀开一条血路，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和平时期她犹如一把利剑，冲破一切险阻，赢得一次又一次跨越。作为神府红军传人，我们要把这种血性植入骨髓传承不息，融入岗位自觉践行。请祖国点名，请党和人民检阅，请先辈们放心，只等一声令下，我们铁骑亮剑，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让精神火炬照亮打赢之路

——写在红军铁甲旅创建 80 周年之际

旅 长 杜清华

政治委员 裴晓昌

红军铁甲旅的前身要追溯到 1933 年 10 月 18 日在陕西神木成立的 7 人红军特务队，是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建和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是目前全军装甲兵系统唯一的红军部队。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孕育出灿烂的神府精神，成为部队攻坚克难、履行使命的传家宝。今年 10 月 18 日，这支部队即将迎来创建 80 周年纪念日。追忆历史，缅怀先烈，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忠诚履行使命，才能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红军铁甲劲旅。

—

在旅史馆的陈列室，泛黄的封皮纸上镌刻着老一辈革命英雄的名字，斑驳的字迹下面是他们淳朴的笑容。策马奔腾、扬沙万里的照片，把我们带到那个遍地血色狼烟的世界。

1933 年 8 月，在陕北佳县的无定河畔，王兆卿等六名中共陕北特委成员倒在国民党罪恶的子弹之下，山谷中回荡着烈士们最后的嘲笑：“陕北地区的党员你们杀不尽，今天你们犯下的罪行，将会成为这灰暗世界的葬礼……”

无定河六烈士牺牲不久，神府红军诞生了。1933 年 10 月，正被通缉的马文瑞冒险赶赴神木县，在那里布置了组建神府红军特务队的任务，队长李成兰，政治委员王兆相，共有 7 个人、4 条枪。队伍一经成立，便开始四处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红军政策，召唤民意觉醒。

陕北的革命到了这个时候，就像地狱里的一团烈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喷涌而出，一发而不可收拾。特务队在广大父老乡亲的支持下迅速改编为红三支队，再扩编为红三团，最后发展成为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

一师。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先后粉碎了陕北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开辟了神府革命根据地，并将它完好的保存下来交给党中央。

1937年9月，神府红军遵照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作为唯一的原陕北红军部队踏上了艰辛的抗日之旅。

一段段血染的历史，在神府红军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打下深刻的烙印。鲜血染红了王老沟，145名烈士为了保卫村民的生命安全与日本侵略者奋力拼杀，长眠于王老沟下；鲜血染红了右玉城，120名英雄被困城内，与敌人战斗到最后，誓死不屈；鲜血染红了太原东山的牛驼寨，600名勇士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的飞雷和子弹，掩护爆破组炸碉夺堡，攻坚克敌；历时15年的抗日、解放战争和剿匪斗争，神府红军用鲜血洗去旧社会的残渣污渍，为人民开辟了焕然一新的世界。赴朝参战归来，神府红军改编为某坦克团划入某坦克师序列，先后抢险西平、赴越参战、守卫长江、驰援汶川，继续为保卫祖国和人民奉献着热血和激情。

时光转到2011年12月9日，神府红军以原某装甲团为基础，结合原师机关、直属分队、原某装甲团部分单位在鄂北组建新的装甲旅，部队全面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80年来，神府红军作为一支历史悠久的红军部队，始终保持完整的建制，紧紧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逐渐形成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勇往直前打胜仗，困难越大越向前”的光荣传统，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作支撑。毛泽东同志讲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是一种灵魂的凝聚，是一种理想的追求，是一种力量的注入，它像一把火炬给人以指引，照亮人们前进的方向，让人们获得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无穷力量。概言之，它是部队的“精、气、神”，是“灵魂”与“血脉”。有了这样的精神力量，革命先烈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就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在艰难险阻面前，就义无反顾、无往不胜。

历史走到今天，神府红军成长为共和国军队序列当中的一支铁甲劲旅，不断以她特有的精神和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红军铁甲旅官兵，这是无数

革命前辈给后人留下的精神遗产。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红军铁甲旅逐步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的神府精神。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像一棵参天大树庞大的根系，源源不断为我们输送着红色血脉，时刻指导和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不懈进取。

正是在神府精神的哺育下，装甲旅才有了部队建设的枝繁叶茂和累累硕果。可以说，部队每一项任务的完成，都是精神的一次展示、一次锤炼、一次洗礼，而这种精神传承，已经熔铸于每名官兵的生命之中，体现在他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当中，成为部队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精神支柱。这让我们更加坚信，神府精神对于砥砺官兵斗志、引领部队发展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从而激励着我们更加自觉地去探寻和继承，并不断将它们发扬光大。

三

历代装甲旅官兵百倍珍视本部队的光荣历史，从未间断过对革命前辈战斗足迹的探寻和革命精神的发扬。原装甲兵工程学院老院长薛清池曾是二十四团（原神府红军团）作战股长。自1988年退休后，他就着手整理团史，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沿着战争年代红军团的足迹重走了一遍，走访了100多位老红军、老首长、老八路，他所搜集到的资料、素材放满了4个大书柜，并且自筹资金为团队建立了团史馆、编写出版了《神府红军团征战记》和《铁甲雄风》画册。

长期以来，继承和发扬神府精神成为每一名神府红军传人的自觉行动。部队曾3次派人赴神木、榆林、西安等地重温革命前辈悲壮的战斗历程；对每一个荣誉连队、功勋战将、英模人物和战斗故事进行挖掘完善；编撰了《红军铁甲旅光荣传统丛书》，拍摄了“辉煌80年”旅史纪录片，修缮了旅史馆……那些尘封多年的记忆，又生动而清晰的展现在人们面前。

今年10月18日，部队即将迎来创建80周年，这对于每一名装甲旅官兵来说，无疑又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为了把这次活动筹办好，我们提前筹划、精细准备，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下设旅史办公室，负责对旅史进行专项收集和整理；在全旅范围内广泛宣传80周年庆典活动，先后组织

官兵制作“旅史如画”文化长廊，举办“我与神府红军同行”歌咏会，在官兵中营造“继承神府精神、争当神府传人”的浓厚氛围。

四

部队的优良传统蕴涵着战斗精神的丰富营养，对激励官兵在军事斗争准备中当先锋、做模范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深知，如果不了解我军优良传统，特别是本部队的历史荣誉，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部队建设发展特点规律，也难以激发官兵建设部队的热情，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装甲旅党委始终注重深挖红色资源，传承红色根脉，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兴军，为建设全面过硬战略预备力量拳头部队、促进各项任务圆满完成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在全旅范围内广泛开展弘扬红军传统系列活动，用神府红军的精神引领官兵，用神府红军的故事感召官兵，用神府红军的英模激励官兵，不断激发广大官兵学习传统、发扬传统、争做英雄传人的热情。积极利用橱窗、板报、营区广播、局域网等有效载体大力宣传部队，把“学旅史、唱旅歌、铸旅魂”当作一种文化，让它熔铸于训练、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官兵的一

经过长期的教育熏陶，神府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如今，在官兵的演讲、授课、动员还有各种文体活动中，处处都能听到“神府红军”的词汇。今年上半年，部队为11个荣誉连队举行挂匾活动，再一次掀起了学传统、当尖兵的热潮，部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五

培育和弘扬部队特色传统精神，是一项铸魂励志、强根固本的基础工程。每一名神府红军传人都牢记神圣使命重托，自觉继承和弘扬光荣传统，不断推进部队建设迈上新台阶。

新的历史时期，部队坚决铸牢“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思想根基，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严格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努力实现领导干部作风的进一步转变。不断强化“勇往直前打胜仗”的战斗品质，持续兴起大抓军事训练的热潮。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努力提高部队信息化条件下的实战能力。积极适应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推动军事训练内容、方式和手段的创新发展，确保部队成为一声令下、一锤定音的决胜力量。大力弘扬“困难越大越向前”的顽强作风，培植官兵敢为人先的干云豪气、威震一方的凛凛虎气、朝气蓬勃的盎然灵气、敢于亮剑的昂扬锐气。紧贴形势任务的新变化，对部队建设中的各种矛盾问题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积极破除陈旧观念的束缚，用发展的眼光、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寻求解决矛盾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新的起点上推进部队建设科学发展。

神府精神从血与火的战争中走来，传统厚重，博大精深，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作为新时期党领导下的铁甲劲旅，一定会高举革命精神的火炬，不断赋予优良传统新的时代内涵，照亮建设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过硬部队的广阔征程。